



## 目 录

### 欧亚政治思想

- 3 张广翔 李振文 / 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 23 张昊琦 /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 60 荆宗杰 / 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

### 欧亚文明·文化·法律

- 91 潘光 / 欧亚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断裂带”研究——兼论“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
- 109 凌霞 / 苏联意识形态转向中的美国文化渗透因素及反思——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
- 149 杜晓梅 王亚民 / 文艺文献文学：俄罗斯纪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
- 168 王志亮 袁胜育 / 国际反恐法律机制视域下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

### 东北亚能源

- 185 富景筠 /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东北亚能源关系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姜 睿、阎德学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 年 12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6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Чжан Гуансян, Ли Чжэньвэнь***

Сущность 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рус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Ричардом Пайпсом ..... (3)

#### ***Чжан Хаоци***

Предопределение и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знач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 (23)

#### ***Цзин Цзунцзе***

Анализ нео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Дугина-- На примере дугин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60)

#### ***Пань Гуан***

Изучение «пояс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аскол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 Двойственность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91)

#### ***Лин Ся***

Факторы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отраже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изменениях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 На примере диссидентов..... (109)

#### ***Ду Сяомэй, Ван Яминь***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след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На пример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молитвы. Хроники будущего» ..... (149)

#### ***Ван Чжилян, Юань Шэнюй***

Созд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ШОС в услов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168)

#### ***Фу Цзинюнь***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арадигм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ей..... (185)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6年第6期(双月刊)

## Contents

### **Zhang Guangxiang, Li Zhenwen**

Essence and Evolution of Russian Conservatism: Studies on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3)

### **Zhang Haoqi**

Destiny and Beyond: Significance of Geopolitics for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23)

### **Jing Zongjie**

Analysis of Dugin's Neo-Eurasianism Geopolitical Thought: A Case Study of Dugin's "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 (60)

### **Pan Guang**

Exploring "Civilian Fault Zones" along the Land Silk Road in Eurasia: also on the Duality of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91)

### **Ling Xia**

American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Ideological Chang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elections: Studies Centered on Dissidents..... (109)

### **Du Xiaomei, Wang Yamin**

Documentary Fiction Literature a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Alexievich's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 (149)

### **Wang Zhiliang, Yuan Shengyu**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of Anti-terrorism Legal Mechanisms: a Global Perspective..... (168)

### **Fu Jingyun**

The Paradigm Shift of Russian Energy Policy and Energy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185)

**欧亚政治思想**

## 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 ——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张广翔 李振文\*

**【内容提要】**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总结之作，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拥护专制制度，而俄国专制制度的性质是君主的家长制统治，即国家与君主一体，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君主，国家机构只是君主的私人机构，而未发展成为公共机构。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数百年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变迁，认为它是俄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俄国1861年改革后，民族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则演变成独特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导致政权与社会的鸿沟加深，自由派与保守派无法合作，帝制最终倾覆。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太弱，是导致专制主义强化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对俄国专制制度在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太过简化。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学者们还需更进一步地理解与阐释。

**【关键词】**理查德·派普斯 俄国 保守主义 专制制度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D751.2; D09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 (2016)06-0003(20)

\* 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李振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关注迅速增长，帝俄时期和俄侨中的保守思想家的著作纷纷出版并且多次重印。特别是普京当政之后，不少政界人士和政党都开始从俄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品中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思想资源。在这种背景下，保守主义研究在俄罗斯逐渐热络，其标志便是 2004 年圣彼得堡大学保守主义研究中心的成立和一批有分量的著作的问世<sup>①</sup>。

著名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 (Richard Edgar Pipes, 1923-) 撰写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政治文化研究》<sup>②</sup>一书，显然与当今俄罗斯国内保守主义的升温有密切关系。作者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像 1917 年那样迅速放弃民主制度，转而屈服于“强人之手”以寻求保护，让他再次关注俄国的保守主义传统<sup>③</sup>。但追溯起来，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1959 年，他翻译出版了 19 世纪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 Н.М. 卡拉姆津关于俄国保守主义的经典宣言——《俄国古代近代史报告》<sup>④</sup>。这份奏折在促使亚历山大一世放弃自由主义政策、罢免 М. 斯佩兰斯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派普斯历时十余年，为著名思想家彼得·司徒卢威撰写了两卷本的传记，研究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经自由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历程<sup>⑤</sup>。1970 年，派普斯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是《19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

---

① 近年来研究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有：Гросул В.Я., Итенберг Г.С., Твардовская В.А., Щацилло К.Ф., Эймонтова Р.Г.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XIX столетия.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 Традиция, 2000; Христофоров И.А. «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еликим реформам (конец 1850 – середина 1870-х гг.). М. ООО. «ТИД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 РС"», 2002; Минаков А.Ю.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Воронеж: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ронеж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отв. ред. В.В. Шелохаев. М. РОССПЭН, 2010.

② Pipes Richard,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俄文版见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8.

③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7, 12.

④ R. Pipes, *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1959.

⑤ R. 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ruve, 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保守主义》<sup>①</sup>，引起了较大反响。该文虽然名为论述 19 世纪下半期，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莫斯科公国时期至 20 世纪初俄国政治形势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大致变迁。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并为 35 年后出版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所继承。它的缺点是太过简略粗糙，而且，将俄国保守主义按时间顺序分为教会保守主义、贵族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保守主义和官僚保守主义四大类，则显得过于机械和武断。1974 年，派普斯发表了研究俄国政治史的专著——《旧制度下的俄国》<sup>②</sup>，认为俄国从未发展出私有财产的传统和国家与社会相互协作的传统。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派普斯的学术兴趣转向苏联史，撰写了大量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2007 年，派普斯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是作者历经数十年的学术积累而对俄国保守主义从 16 世纪初到斯托雷平时代数百年历史的总结。而何为保守主义？在派普斯看来，“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而正是这种文化决定着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什么。在俄国，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是专制制度，它是得到政府高层和主流舆论坚决支持的基本管理思想。“保守主义，即坚决要求不受法律和议会限制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俄国政治思想史的主导方向”<sup>③</sup>。这样，本书的任务就成了揭示俄国选择专制统治的历史原因和保守主义思想家们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依据。本书中，专制制度的“批评者”，指的是以某种方式企图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家或国务活动家，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主义者。因此，派普斯将本书界定为结合思想史与具体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著作。

## 一、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要理解俄国保守主义，必须分析俄国专制制度的特点。保守主义是对俄国政治制度的逻辑回应。理查德·派普斯在本书俄文版序言中说，他一直在

---

①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lavic Review*, 1971, Vol.30, №.1, pp.121-128.

②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2-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 1995.

③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7.

思考，为何俄国人会拒绝民主、公民自由和法律至上？为何俄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国务活动家都断言，俄国必须臣服于专制权力，否则就会灭亡？为何俄国人在面临自由和秩序的选择时大多会选择秩序，而将自由视为混乱和犯罪？还有，自从彼得改革以来，俄国的文化、艺术、经济、军事都开始西方化，为何政治却没有这种改变？派普斯相信，俄国支持专制统治的保守观念在政治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他认为，要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回溯到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初的情况，并考察东正教和蒙古人统治对俄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 （一）俄国专制制度形成的条件及其与西方的差异

在论述俄国专制制度之前，派普斯首先概括了西欧政治制度的特征，并且将二者进行比较。

派普斯认为，欧洲君主制的形成得益于三种因素的综合：罗马帝国的遗产、蛮族占领者的文化和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已经区分，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作的局面。在蛮族部落，首领没有无限的权力，而是实行集体议事制度；在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土地私有权，成为无限王权唯一无法逾越的障碍；国王的权力不仅属于他本人，他也有自己的义务。天主教会则要求按照教义统治。除此之外，欧洲政治传统因为封建主义和城市公社的出现而得到巩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后来演变成为立宪统治制度，而城市自治保护了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形成公民权利制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西欧专制王权，虽然剥夺了民众的政治权利，但不会侵犯基本的民事权利和财产。而且国家管理的不是原子化的单个的人，而是由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等级组成的社会。这样，西欧王权在出现之初就受到思想和制度的许多限制。西欧的君主专制是与封建割据相对立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主义和暴政。西欧的民主革命只不过是传统原则——“涉及所有人的事，应该由所有人讨论并得到所有人同意”——的恢复和扩大<sup>①</sup>。

但是俄罗斯国家形成的条件却与此不同。首先，派普斯认为，国家的稳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6.

定和自由与国家的规模和外部安全成反比，俄国广袤的领土和易受侵犯的边境产生了中央集权管理的趋势。在外部威胁之下，国家驱使除了贵族以外的所有阶层为国服役，这样就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团结合作的社会，其结果是俄国全民皆被奴化。

其次，俄国没有形成作为公民权利基础的土地私有财产。在农村，农民在广阔的土地上迁徙无常，没有土地财产的概念，认为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上帝所赐，由大家共同使用。在城市，市场关系发育程度低，大多数市民从事农业劳动，被固定在城市，禁止迁徙，也没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贵族虽然拥有领地，但领地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君主为换取贵族的服役而赏给他们的报酬，贵族只能临时掌握它们。随着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莫斯科公国吞并，那里的私有财产也随之消失。

再次，俄国未能形成西方那样能够限制君权的贵族。从起源上看，西方贵族起源于占领者，而俄国贵族则由被莫斯科公国占领的其他公国的统治者和王公卫队组成，他们要听命于莫斯科沙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民的迁徙，贵族的土地缺少劳动力，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开始了农奴化进程，农奴制将贵族与君主联系起来，迫使贵族不得不放弃政治野心。贵族机构——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都没有立法权，其成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沙皇召集的，参加会议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民众的代表，不如说是沙皇官僚机构的附属物<sup>①</sup>。1722年《官秩表》的实施，让所有贵族无论出身都要供职服役，废除了大贵族的概念，各类贵族开始融合。

派普斯还批评说，俄国贵族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因此未能对君主制造成任何威胁。在1730年因彼得二世突患天花病逝而造成的皇位继承危机中，以Д.М·戈利岑为首的密委员会提请安娜登上皇位，并提出一系列限制君权、加强贵族参政的条件。但是大多数贵族仍然支持绝对君主制，反对密委员会，结果他们获得胜利，大贵族派被镇压。派普斯认同司徒卢威的看法——1730年危机是决定俄国的政治命运的关键事件，它促使君主与贵族达成妥协：君主给贵族特权，贵族则远离政治。到1785年，唯一有能力限制

---

<sup>①</sup>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39-40.

君权的等级——贵族就被君主一步步地收买了<sup>①</sup>。

最后，与西方天主教会不同，俄国的东正教会完全依附于国家。东正教会本来拥有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强大经济实力。蒙古人在统治罗斯的 240 年间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免除了修道院的赋税，而将负担转移到其他阶层身上。因此寺院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僧侣们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耕地。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开始腐败，他们依靠剥削农民维持奢侈的生活，作风腐化。因此，围绕寺院土地所有制和基督教原则，在 1500 年前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沙皇瓦西里三世支持了官方教会的利益诉求，而官方教会则在瓦西里三世离婚案中全力支持沙皇。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和教会形成联合，俄国的神权政治愈加发展。为了依靠政权保护自身利益，官方教会宣扬政权的神圣来源，支持沙皇权力无限，主张教会依附于王权。派普斯总结道，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中期，俄国出现了两种政治思想，一是承认外在权威，二是追求内在使命和精神。结果外在权威战胜了内在精神，这决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教会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sup>②</sup>。

尼康改革是将教会置于国家之上的一次尝试。他主张沙皇不是宗教首领，无权干涉教会事务，相反，牧首有权干涉沙皇。改革的失败造成教会的分裂，到彼得一世时期教会已经丧失了残存的独立性。随着牧首制的废除和正教院的设立，俄国的政教关系得到彻底解决——教会成为国家行政部门的一部分。

## （二）俄国专制制度的特点

从俄国统治者的三个名号可以看出，俄国专制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无限王权，二是“家长制统治”（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1480 年，伊凡三世登基时接受了“专制君主”（самодержавец）的称号。它的本义是与“封臣”相对的、独立于任何外部权力的统治者，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有“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含义。1547 年伊凡四世正式自称“沙皇”（царь），代表着俄国统治者开始追求帝国权力。按照拜占庭的理论，世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8.

② Там же. С.64.

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皇帝。伊凡四世接受沙皇称号表明，俄国统治者至少企图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

不过派普斯看重的是俄国君主制性质的另一面，即家长制统治。而要理解这种家长制（或曰父权制），则需追溯到俄国君主权力的起源。以往，俄国统治者使用的是“君主”（государь）一词。它出现于1470年，起源于与“奴仆、奴隶”相对的“老爷、主人”（господин, господарь, государь）等称呼。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государь”显示了“自由民个人对非自由民（即奴隶）的统治权……因此，领主所有制近似普通的个人所有制……封建领主与其说是领主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倒不如说是他领地上的民事治理者”<sup>①</sup>。派普斯认为，这种定义是理解俄国专制主义的家长制性质的关键。

在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之前，罗斯大公只有私人权力而没有国家权力。在他的封邑范围内，大公不是政治统治者，而是私人所有者。在此之后，他们继续将领地视为继承而来的私产，大公对它的控制就像对待其他的财产一样。“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词也由“主人”（государь）演变而来，表明公国只是大公的私有财产。因此领地既是封地，又是公国，也是私产。在社会关系上，大公将公国的一切视为自己的财产，不允许社会特权和私人财产的存在；所有人都是大公的奴仆，他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直到莫斯科公国时期，最高权力仍然是私有的。大公按照私法继承国家，国家财产与大公的私人财产之间没有区别，国家的总体政策完全体现了私人领地关系。“在宫廷管理中，大公是拥有君主权力的领主；而在地区管理中，他是拥有领主习惯的君主”<sup>②</sup>。

派普斯认为，俄罗斯国家的家长制特征，使俄国统治者不仅像西方的国王一样负责立法和征税，而且还阻挠私有产权的出现和等级的形成，以防止对君权的威胁。沙皇和官员们不会将社会视为独立于国家、拥有自身利益和愿望的组织，也不会对其承担起责任。在他们眼中，“人民”是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服务于国家。

---

① В.О.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许昌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7-58页。

②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43.

在西方，作为制度的国家和作为人的统治者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区分开了，但是在俄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俄罗斯国家从未独立于君主本人而单独存在。Ю·萨马林曾经批评尼古拉一世政府在波罗的海省份的民族政策，沙皇告诉他：“您既是向政府进攻，也是向我进攻，因为政府就是我，我就是政府，这都是一体的。尽管我听说您将我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我不承认这一点。”<sup>①</sup>在俄国，国家与君主密不可分，社会与国家密不可分，君主本人就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他，他就是唯一的政治现实。除了最高政权之外，沙皇不承认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沙皇不会关心臣民的需求和愿望，也不可能让他们干涉国家事务和参与国家管理。派普斯说，“这种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它经历了莫斯科公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帝国和苏联时代。”<sup>②</sup>任何人都无权关心国家整体利益，这是沙皇的特权。派普斯认为，由于统治者不需要甚至拒绝民众的支持，他们经常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又促使他们和保守思想家将专制制度作为保障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唯一手段。

## 二、18-19 世纪中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

派普斯认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于 15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期。在伊凡四世时期，出现了主张扩大王权、维护专制制度的思想家。而伊凡雷帝也坚称，俄国君主有独裁的传统，权力分散必然导致毁灭。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彼得虽然是行动家而非理论家，但他也提出“共同幸福”的理念，并由此引出包括沙皇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为国服务的思想。不过在实践上，彼得一世仍然按照传统的个人继承原则来治理国家。直到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 年）运用政权与社会的契约理论为彼得一世撰写《君主确定国家继承人自由法典》，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维护沙皇专制合理性的政治理论。而且普罗科波维奇还是第一个运用历史依据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家。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本性是只有通过专制统治才能保护自己，如果采用了某种其他统治方式，它就不可能维护自身的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7.

② Там же. С.44.

完整和幸福。”<sup>①</sup>

18 世纪下半期启蒙思想大量传入俄国，促进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出现了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Н·帕宁（1718-1783 年）。他支持宪法体制和保障公民权利，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提出建立帝国委员会，主张扩大贵族的政治参与来限制君权，但是遭到贵族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当时大贵族的代表是М·谢尔巴托夫（1733-1790 年），他坚决捍卫大贵族的利益，批判《官秩表》，认为世袭贵族应该垄断对农奴、土地和外贸的特权，最高统治者应该与他们共治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非常推崇孟德斯鸠，但她也只是选择性地对待他的著作，她颁布的《圣谕》明确表示，“俄国君主是专制君主，因为其他任何权力形式都不可能管理如此巨大的国家……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对俄国来说不仅是有害的，而且会最终毁灭它”<sup>②</sup>。

虽然亚历山大一世宣称继承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方针，但派普斯认为他并不坚定。亚历山大一世坚持启蒙理想，但不愿割舍权力。他成立了秘密委员会，企图扩大参政院的权力，但没有成功。他的自由主义理想无法落实，没有任何结果，到统治的后期愈加反动。起初亚历山大一世重用М·斯佩兰斯基（1772-1839 年），支持他主持改革。斯佩兰斯基继承帕宁的思想，提出政府要获得舆论的支持，要符合时代精神。他认定沙皇专制必将衰落，未来将走向共和；认为必须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使其从独裁转向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真正的君主制。限制皇权的手段就是法律，皇权名义上仍然是无限的，但只保留立法权，而将执法权和司法权剥离出来。他提出成立国家杜马以商讨所有法律，国务会议制定条例，各部负责执行，参政院负责司法。他的改革方案只得到了部分实施，而且他无力触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沙皇专制和农奴制。与斯佩兰斯基同时代的保守主义者Н·卡拉姆津虽然认同共和制是更好的统治方式，但断言它不适合俄国。他的《俄国古代近代史报告》是一份经典的保守主义宣言。他依照历史经验，认为俄国适合绝对君主制，他警告亚历山大一世，削弱专制对俄国是致命的危险，而每当专制遭到破坏的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1.

② Там же. С.99.

时候，国家就陷入混乱；他反对将法律置于沙皇之上，认为法律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员制定的，他们根本无权限制皇帝；沙皇就应该大权独揽，不能将权柄交诸他人，否则便会招致内斗；多灾多难的俄国只能适合专制制度，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沙皇也无权改变。卡拉姆津的思想后来被亚历山大一世所认同。1818-1819年亚历山大政府制定了立宪方案，宣称“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它集中于君主本人。君主是帝国内民事、政治、法律和军事权力的唯一来源”<sup>①</sup>。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的保守主义更加强化。原先接近十二月党人的普希金（1799-1837年）也由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保守主义者。派普斯认为，普希金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认同专制制度，支持高级贵族，支持书刊检查和强化思想控制。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政府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官方民族性”三原则，С·乌瓦罗夫最初提出它作为教育原则，但它成为尼古拉一世政府在革命形势下加强统治的思想基础。此时出现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按照派普斯的说法，П·恰达耶夫（1794-1856年）在后来已经改变了对俄国的负面看法，成为君主主义者，要求政治稳定。而斯拉夫派主张专制制度不应该干涉个人生活，而给其完全自由，这就启发了后来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将专制制度与公民权利思想结合起来。派普斯认为，支持专制制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者果戈理与激进的别林斯基之间的争论，是俄国社会分裂的开始。

总而言之，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支持专制的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1730年的皇位继承危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初期的立宪协商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俄国的臣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不存在平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只有一些争权夺利的帮派，他们互相攻击，无法联合，因此对自由和人身权利的追求只限于思想领域，无法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派普斯认为，只有掌握财富的有产者的联合才能限制政府权力，而俄国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财富，商人阶层弱小，地主和农民互相争斗，都需要得到君主制的支持，因此给了政府无限的权力。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11.

### 三、改革后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实行了一系列涉及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举措，国内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处于“辩证关系”之中，它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对方，不理解这种相互关系便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

#### （一）保守主义

对于保守主义来说，改革后的专制制度不再仅仅依靠贵族和官员，其统治基础扩展到全民，于是保守主义思想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民族主义。派普斯认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俄国保守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而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保守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旧的保守主义者不会反对西方，他们认为他们本身就属于欧洲，他们只是想与欧洲大国平起平坐。而在斯拉夫主义的影响下，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比西方更优越，西方反而是有害的。他们坚持反西方主义，认为俄国的弊病来源于欧洲和欧洲化的俄国人。

其次，专制制度开始依靠民众，不再把贵族视为主要支撑力量，因此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保守主义者大多成了反贵族主义者。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保守主义者遵从孟德斯鸠的说法，认为“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主张君主与贵族联合。但是农奴制废除以后的新保守主义者，除了卡特科夫、法捷耶夫、列昂季耶夫等人之外，都是反贵族主义的，因为他们将贵族视为最西方化的，认为最高政权应该依靠广大民众，应该与农民而非精英联合。

复次，激进主义对保守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侵染了年轻人的头脑，被保守派称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认为，一切思考与活动的最终意义就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其他的一切文学艺术都一文不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价值和制度，于是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和恐怖主义。改革后，革命者的恐怖活动接连不断，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大多数人转而反对恐怖灾难，支持专制制度。对此，保守主义者指责虚无主义割裂理论和生活，脱离现实土壤，认为虚无

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化运动割裂了受教育阶层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他们将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视为知识分子的特征，反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

1863年波兰起义被保守主义者视为西方对俄国的进攻，激起了俄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专制制度的支持。М·卡特科夫（1818-1887年）是民族主义社会舆论的代表，波兰起义也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转折点。卡特科夫原本是个自由主义者，60年代初成为最早反驳虚无主义的人，在1878年查苏利奇案件之后，卡特科夫彻底转为右派，认为知识分子是俄国灾难的根源。为此他号召专制制度不必迎合社会舆论，而是要加强专制力量，并且批评政府在与异见思想的斗争中不够坚决。对他来说，专制制度就是俄国历史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现实的现实”<sup>①</sup>。

坚决反对虚无主义的还有著名作家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派普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首先是政治小说，探讨道德原则和虚无主义的后果，他的伟大不在于政治分析，而在于思考激进主义暗藏的心理实质。陀氏认为虚无主义是知识分子脱离民众、信仰缺失的后果，宗教的衰落导致了恐怖主义活动，“在丧失信仰的心灵，对人类的爱只会生出对人类的恨”<sup>②</sup>。他是坚定的专制制度支持者，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要求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在于人的内心。这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典型立场。

改革后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Ю·萨马林（1819-1876年）和А·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萨马林在废除农奴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的强盛在于社会的活力。在改革后的立宪提议之争中，萨马林认为俄国只存在两种正面的历史力量：民众和专制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的传统，是适合俄国的统治方式，其他的任何形式都会导致暴政。在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时候，宪法包含的多数原则只能依靠贵族施行，必将导致欺世盗名的“伪宪法”<sup>③</sup>。他反对贵族特权，认为应该在专制制度范围内施行地方自治，让农民参与政治，为未来的立宪做准备。阿克萨科夫是与卡特科夫齐名的政论家，也跟萨马林一样支持反贵族的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大改革期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64.

② Там же. С.178.

③ Там же. С.169.

间，他提出俄国只有无知的人民，而不存在社会，因此国家要发展民族文化，倡导言论自由，同时国家还不应干涉社会的活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阿克萨科夫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后来他越发激烈，成为公开的反犹主义者和热情的泛斯拉夫主义者。

K·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年）作为亚历山大三世的老师和正教院总监，对政府的影响无人能及。他坚决要求政府不应该向社会舆论让步，而应该实施毫不妥协的反动。在M.T·洛里斯-梅里科夫主政的时候，以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卡特科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为例，反对召开国民代表机构。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后，波别多诺斯采夫促使沙皇否决了洛里斯-梅里科夫提案，并且为沙皇起草了即位诏书，要求厉行专制，巩固皇权。他不仅为沙皇提供反动原则，而且还提出具体建议，他笼罩俄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结果为1905年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sup>①</sup>。

K·列昂季耶夫（1831-1891年）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思想家。他可以称为斯拉夫派，但与真正的斯拉夫派有所不同。他反对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但也不是西方派。他是突厥主义者，用拜占庭主义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号召重建拜占庭帝国。他认为，文明的实质在于其丰富的多样性，只有专制统治才能保证这一点，而自由民主只会带来整齐划一。在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影响下，列昂季耶夫提出文明发展的三段论，认为社会主义将会带来暴政，只有专制制度才能让俄国免于欧洲的命运，只有使用暴力才会让国家免遭分裂。总之他不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影响有限。

## （二）自由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要求改变现状，但前者希望通过革命摧毁现存制度，后者希望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良。俄国的自由主义出自西方，其支持者大多为西方主义者，尽管有的也认同斯拉夫主义的某些观点。因此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外来的、次生的，缺乏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那样的深厚基础。派普斯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1855-1895年，自由主义遵循温和的保守主义路线，通过牺牲民

---

<sup>①</sup>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80.

主来换取公民权利；1895-1917年，认识到公民权利与专制制度无法共存，于是开始政治行动<sup>①</sup>。

派普斯认为，罗曼诺夫王朝的最高政权是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源泉。历史上彼得一世、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进行过深入的改革，而亚历山大二世一纸命令，就让上千万农奴获得自由，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专制制度在自由派中的威望。由此出现了独一无二的“自由保守主义”学派，他们拒绝政治民主，并希望专制君主奠定自由制度的基础，并期待进而会催生出立宪制度。而广泛传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自由是中央集权国家取得胜利和教育得到普及的结果”<sup>②</sup>。俄国自由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К·卡维林（1818-1885年）和Б·齐切林（1828-1904年）。

卡维林的政治观点在大改革期间非常流行。他是“国家学派”的创始人，强调国家在俄国历史中起主导作用，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在西欧则依靠社会团体和个人。俄国的一切发展是自上而下的，而欧洲则是自下而上的。专制制度是俄国管理的天然形式，在历史紧急关头俄国人都会依靠它。卡维林相信，俄国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是有意义的，它会导致人的解放。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专制国家。因此，他反对通过立宪制度削弱皇权，他认为立宪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在民间缺乏坚实的基础”<sup>③</sup>。

齐切林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自由保守主义学派的领导人。他的理论将自由原则、权力原则和法律原则结合起来。他支持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和公民权利，同时也支持专制制度。他认为自己的“保守自由主义”与所谓的“反对派自由主义”不同，他反对后者不承认任何权力、将必要的国家机构和官员视为专政的看法。他反对放纵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极端发展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因此需要强大的政权。他一方面不同意俄国社会主义者对农民的理想化和对欧洲文明的诅咒，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造成残酷的暴政。不过在亚历山大三世开启反改革时代之后，齐切林转而否认专制制度能够推动自由，并断言改革后的俄国无法在未改革的政权之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7.

② Там же. С.201.

③ Там же. С.203.

下生存，无限的皇权带来灾难，唯一的道路就是限制皇权。

派普斯认为，俄国的自由保守主义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学说。他们希望不受限制的君主制会尊重公民权利，这是脱离现实的。专制政府不可能促进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反而将其视为障碍。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开始激进化，其领导权也转移到了地方自治局手中。

### （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19 世纪下半期，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日渐兴盛，官僚制度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并引发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

发起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城市杜马改革，准备并不充分，政府希望自治机构协助管理教育、医疗等非政治类事务。不过，自治机构的活动方式与官僚机构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被后者视为异己，双方陷入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之中。正如 C.Ю·维特所言，“官僚机构与自治机构之间存在着全面的根本性的矛盾”：“在专制国家中，地方自治与政府或者说最高当局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府权力的基础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君主意志，是人民代表的无限的自主的活动。而地方自治遵循另一种原则——它是受君主及其所信赖之人监管的民选代表的活动。”<sup>①</sup>专制政府担心自治机构的联合会有反政府倾向，便加紧控制。1890 年的地方自治反改革，使其附属于官僚机构。这让地方自治局认识到，与官僚机构的合作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并且寻求全国性联合。这让沙皇政府如芒在背。

保守派大臣 C.Ю·维特（1849-1915 年）对地方自治局颇为反感，他认为，没有高效的官僚机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维持的，而地方自治局的存在扰乱了行政部门的活动，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管理和控制俄国，才能维持其大国地位。1895 年，面对地方自治机构的参政请求，登基不久的尼古拉二世宣布，他将继承乃父遗志，维护专制制度，不允许地方自治局参与国内管理。在派普斯看来，沙皇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在向俄国社会的温和派宣战，这是一次致命的失误，将温和派推到了激进派一边。从此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分裂，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09.

大多数人强调只有立宪才能救国，小部分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自由保守主义立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 П·司徒卢威（1870-1944 年），后者的代表人物是 Д.Н·希波夫（1851-1920 年）。前者认为不彻底的改革就会出现革命，因此组织成立解放同盟拥护立宪；后者为了维护君主制而反对立宪，主张成立谘议性的代表机构，而非立法机构。到 1905 年，自由主义运动正式分裂成两派，大多数跟随立宪派成立立宪民主党，少数人成立 10 月 17 日联盟。

维特坚决反对立宪运动，他在 1904 年说，“如果在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下最高政权考虑给俄国一部宪法，那这就意味着俄国的终结。俄国承受不起欧洲意义上的宪法。带有议会和普选的宪法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并毁灭俄国。”<sup>①</sup>但是 1905 年革命让他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他知道没有别的选择——他在尼古拉二世签署十月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俄国开始有了宪法和议会。但是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拒绝了他的入阁邀请。这表明，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鸿沟太大了，已经无法合作。

П.А·斯托雷平是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位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但认为君主制是不断发展的。他一方面用暴力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实施改革以铲除革命的“深层原因”。他的改革纲领是让权利和私有财产成为国家的基础，他希望通过废除村社、培育农场主，为专制制度再造根基。但是他的活动得不到君主的支持，同时他的强硬镇压措施也招来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敌对。斯托雷平的行动遭到杜马的掣肘，使他不止一次遭遇组阁难题，不过他也将杜马视为政府的执行机构而非真正的议会。他的改革方案，除了农业改革之外都失败了，而他本人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敌意。这说明，政权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已经无法消除，俄国已经不能找到平衡点，只能在红与黑的两极之间摇摆。

#### 四、总结与评价

笔者认为，派普斯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是一部简明而深刻的俄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它虽然主要研究俄国保守主义的思想与根源，但实际

---

①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4.

上涉及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形势的演变，还展现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关系。因此，这部作品的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作者在勾勒、引用和评论时常有独到的新鲜见解，令人眼前一亮。

要描绘五百年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众多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和变迁轨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派普斯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资料，但并不掉书袋，而是行文简洁，观点明了。他旁征博引，但又引用得恰到好处，这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强大功力。他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历史叙述之中，既不拖泥带水，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更重要的是，派普斯将思想文化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展示了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和历史变迁，针对为什么在俄国盛行支持专制制度的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有深度的解释。他指出了俄国政权的性质——源自于中世纪的家长式统治，即君主认为国家主权与自己的财产是一体的，而从未将俄罗斯国家从私人机构变为公共机构。而且这种统治方式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农民的好沙皇观念便是明证。农民将沙皇视为国家的主人，不反沙皇，而是借沙皇的名义反对地主。派普斯认为，要实现广义的自由、政治民主和公民权利，需要民众之间相互信任，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俄国社会缺乏这些条件。民众指望政权保护自己，赋予其不受限制的权力，为了安全稳定而拒绝自由。因此，“只要实际中的沙皇、皇帝、总书记、总统等等没有破坏他在民众意识中‘真正的君主’的形象……他就可以安枕无忧”<sup>①</sup>。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俄国社会发展程度太弱，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主义强化。这就是俄国的命运。

不过，笔者也认为，本书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派普斯对俄罗斯历史的阐释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而是按照“西方标准”看待俄国。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有存在的权利，因为俄国文化（特别是在彼得改革之后）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标准的极端化就会造成对体制的不正确认识。作者武断地将西方文化作为自由主义的典型，同时分析俄国的现实与这一模式是否相符，最终导致他对俄国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例如，派普斯将西欧中世纪与莫斯科公国对立起来，以寻

---

<sup>①</sup>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8.

找俄国与西方发展路径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这种差异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像派普斯所描述的那样形成了对立面。莫斯科沙皇并非像派普斯所言那样不关心民瘼；东正教会虽然主张神化王权，但同样主张王权也要受到东正教规的制约，沙皇也将维护东正教作为首要任务。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如果君王违背了基督教义务，教会便有权指责王权。这种习俗连君王也得尊重。

第二，派普斯对俄国历史的认识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作者难以避免地夸大了作为对立面的俄国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例如，他对莫斯科公国时期专制王权的描述是明显夸大的了。首先，作者选择了性格暴虐的伊凡四世作为专制君主的代表，并没有选择 17 世纪经由选举或者缙绅会议推荐的沙皇，这是具有误导性的。其次，作者仅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王权的“无限”，并没有考虑莫斯科沙皇的权力在实际中受到的限制。这种限制也许不是明文规定的，但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一些制度性和习惯上的约束，这种约束甚至比法律的约束力更强。再次，作者粗率地否定了贵族机构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制约王权的作用。实际上，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有波雅尔杜马的参与，只有一般性的事件才由沙皇自主决断。波雅尔杜马是仅次于沙皇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案件都由其全权审议。因此波雅尔杜马是一个限制皇权的非官僚机构，这种限制贯穿于整个 17 世纪。缙绅会议的职权范围很广，负责审议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尽管缙绅会议同西方国家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议事机构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它仍不失为限制皇权的代议机构<sup>①</sup>。

第三，派普斯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首先，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在本书中，他基本上将保守主义等同于支持专制制度的思想，以此串联起众多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实际上，俄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要丰富得多，例如：俄国要走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自主之路，俄国要追求强大而完整的国家，加强东正教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承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等<sup>②</sup>。这也就导致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他方面的思想认识不足，

---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②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17.

例如斯拉夫派。对于这一重要思想流派的叙述薄弱，也是本书的一个缺点。其次，对于改革后的国家与社会，派普斯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力量开始崛起，公民社会开始形成。而且作者对专制制度的适应性和活力估计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重要进步，也并非像作者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还需学者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与阐释。

---

**【 Abstract 】** American historian Richard Pipes' study on Russian conservatism is a summary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lso an important revelation for Russia studies in China. In his view, the essence of Russian conservatism is to support the Russian autocracy, and the nature of the Russian autocracy lies in the monarch's patrimonial ruling, that is: the state and the monarch were an organic whole, the monarch represented all, everyone was attached to the monarch, state institutions were only the monarch's private sectors, but not public institutions. Richard Pipes analyzed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s of Russian conservatism, regarded it as Russia's dominant political ideology. After reform of 1861, nationalism and anti-nihilism become important parts of Russian conservatism, liberalism evolved into a unique liberal conservatism, but intense political struggles made the social gap an unbridgeable chasm, the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could not cooperate, and finally the monarchy was overthrown. Pipes deeply analyzed the Russian conservatism, considered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Russian society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strengthened despotism. But he did not get rid of the stereotype of the Western-centrism, understood the Russian conservatism too narrowly, and recognized the Russian autocrac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oo simplified. We ne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Russian conservatism.

**【 Key Words 】** Richard Pipes, Russia, conservatism, autocracy, liberal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сторика Ричарда Пайпса

на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резюм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традиций,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откровение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сущность рус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ддержке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и характер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лежит в 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ом правлении монарха, то е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ь были органическим целым, государь представлял все, каждый был привязан к государ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были только частным секторам государя, а н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Пайпс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историю измен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считал ее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ей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реформы 1861 г.,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анти-нигилизм стал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ми частями рус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либерализм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уникальный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но интенсив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орьбы сделали социальный разрыв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м, либералы и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 не могли бы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и, наконец, монархия была свергнута. Пайпс глубок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читает слаб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причины усиленного деспотизма. Но он не избавился от стереотипа Западно-центризма, понимал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лишком узко, понимал 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его связь с обществом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лишком упрощенно. Мы должны глубже понять и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историю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оссия,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либерализм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 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张昊琦\*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

\* 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地缘综合征 地缘话语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751.2 **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6-0023(37)

## 引言

国家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它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干扰。从共时性层面来说，虽然全球化的势头有所减缓和消退，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但网络社会的形成以及碎片化图景的呈现，依然消解着国家认同的塑造。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和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复杂关系，严重制约了国家认同的构建，俄罗斯需要在一个动态的互动结构中认识自己并确立认同。从历时性层面来看，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存在着顽固的“路径依赖”，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国家认同构建的方式和内容，影响着新认同的塑造方向。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使得俄罗斯在应对不断变动的世界时往往本能地回归传统，从既有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建立新认同的“参照”。

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涉及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地域、社会等诸多层面。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这些层面虽然并非截然可分，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它们对国家认同的塑造作用存在差异，作为构建认同主体的国家对它们的选择亦有不同。例如，民族主义是构建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但由于它与帝国的原则相排斥，从而在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并没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帝俄时期的认同一开始基于王朝认同，拒斥民族主义，不论是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作为主体的俄罗斯民族，其民族认同都是压制的对象。乌瓦洛夫早在 1832 年就提出了“专制、东正教和人民性”三原则，但因为最后一项（“人民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被搁置了半个多世纪。<sup>①</sup>对于在俄国社会蔓延的泛斯拉夫运动，尼古拉一世始终不为所动。他在И.阿克萨科夫呈递的报告上批示道：“如果事态发展导致（所

---

① [美]本·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4 页。

有斯拉夫民族)统一,对俄国来说那将是毁灭。”<sup>①</sup>同样,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构建国家认同时也排斥民族主义,最终以阶级取代民族,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代宗教和传统文化,建立了“苏联人民”这个新型的共同体。

苏联解体以后,由于维系国家认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抽离,俄罗斯的国家认同至今没有得到确立。从叶利钦时期寻找“民族思想”,到普京时期提出“主权民主”和“新保守主义”,俄罗斯当局一直致力塑造的新国家认同,由于共识的缺乏而处于虚置状态。在主题为国家认同的2013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也只是为国家认同划定了一条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触犯的底线而已<sup>②</sup>,俄罗斯社会和知识层所寻找的凝聚国家向前发展的“民族思想”依然“原地踏步”<sup>③</sup>。

在“民族思想”虚悬的情况下,地缘政治思想乘虚而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促进和加强了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柯林·格雷曾说:“地缘政治学成为一个无所不装的思想篮子,可以随时被不负责任地滥用。”<sup>④</sup>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尤为突出。“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亚·杜金在其《地缘政治基础》第三版中增加了“通过空间进行思考”这一部分,将地缘政治学与种族、文化、宗教、历史和哲学语境结合起来,试图赋予地缘政治学以基础人文科学性质,它“不仅包括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而且也包括社会和世界观念层面”,因此可以成为“解释当今俄罗斯和世界所处复杂情势的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工具”<sup>⑤</sup>。

不独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说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地缘政治论,以及自民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以地缘政治演说蛊惑人心的政治纲领,都使地缘政治学超出了传统的范畴,具有了鲜明的俄罗斯特点;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俄罗斯大部分地缘政治教

---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Изд-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С.64.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news/19243>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С.5. [http://vid-1.rian.ru/ig/valdai/Identity\\_rus.pdf](http://vid-1.rian.ru/ig/valdai/Identity_rus.pdf)

④ Colin S.Gray, “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Orbis*, Spring, 1996, p.247.

⑤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Мысли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 Изд. 3-е, дополн., Москва,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1999. С.3.

科书中也都得到了强调<sup>①</sup>。

由于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及其之前与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论”和“人种优越论”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声名受到严重污损，以致二战结束以后其研究在西方走向衰落，而在苏联则完全受到限制。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打开了巨大空间，“地缘政治”很快成为俄罗斯政治话语中最流行的一个术语<sup>②</sup>。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来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理论失去了垄断地位，作为学术禁区的地缘政治学自然获得了“报复式”的反弹。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以及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俄罗斯精英寻求一种更为宏大、更为深刻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而具有某种“神秘性”和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契合了这种需要，从而成为俄罗斯社会理解世界变化的工具。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苏联解体首先是地理疆域的变化，俄罗斯帝国数百年来开疆拓土以及苏联时期对其事业的发扬光大，由于帝国的崩解而前功尽弃，在俄罗斯的社会记忆中嵌入了一道深刻的印痕。作为一剂随时可能激活伤口的兴奋剂，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的作用<sup>③</sup>；“重新裁定边界”的渴望与“大国”怀旧情绪紧密联系，在社会意识中寻找到了坚实的土壤<sup>④</sup>。苏联解体以来的地缘叙事，如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俄格战争以及尚未得到平息的乌克兰危机，都强化了俄罗斯社会中的地缘政治对抗观念，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地缘政治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俄罗斯社会处于全面转型、国家认同尚在塑造以及与西方世界的角逐不断展开的背景下，地缘政

---

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版了大量地缘政治学教科书，如Нартов Н.А., Нартов В.Н.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М.: ЮНИТИ-ДАНА: Единство, 2007; Тихонравов Ю.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ИНФРА-М, 2000; Гаджиев К.С. Введение в геополитику.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2000; Алехин Э.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ЕНЗА, 2005; Бурлаков В.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ВГУЭС, 2008; Маринченко А.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М.:ИНФРА-М, 2009; Сорокин К.Э.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гео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М., 1996. 在涉及地缘政治学的功能时，大部分教科书都强调其认知功能、预测功能、管理（咨询）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

② Гаджиев К.С. Введение в геополитику.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2000. С.3.

③ Цыганков П.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 последнее прибежище разум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4. №.7-8.

④ Оболонский А.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к фантом лож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5. №.1.

治以及在其基础上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凝聚国内社会的有效工具。法国学者莫伊西以恐惧、羞辱和希望三种文化来阐述她的“情感地缘政治学”，认为羞辱释放出的被剥夺感与挫折感，往往与历史上的衰落感相互交织并得到强化，“光荣的历史并不令人安心，它是挫折感的深刻根源”<sup>①</sup>。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高傲姿态、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以及俄罗斯融入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俄罗斯自感遭受羞辱的原因；俄罗斯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倾泄这种被剥夺和遭受挫折所导致的愤怒。俄罗斯回归地缘政治以及国内地缘政治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羞辱文化”。

本文拟通过对俄罗斯地理认同观念的梳理以及对当代俄罗斯地缘叙事和地缘政治话语的分析，阐述地缘政治对俄罗斯国家认同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梳理地理作为俄罗斯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第二部分分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地缘综合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话语，分析地缘政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对俄罗斯构建认同的意义，第四部分是结论。

## 一、地理观念作为俄罗斯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

在构成国家认同的诸要素中，地理环境因素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地理认同或者说地域认同也是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在“层累地造成的历史”中，地理环境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形成具有持久和独特的影响。从俄罗斯早期的乡土观念到后来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张所形成的帝国叙事，以及作为其载体的俄罗斯文学和史学，为地域认同发展到地缘政治认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共同构成了国家认同的知识基础。

依恋故土乃是人类的天性，埃德蒙·伯克将“热爱故乡”看作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sup>②</sup>。但是，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及其认同，并非仅仅因为土地是人

---

①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② 转引自[美]丹尼尔·德德尼：“土地上认同：民族主义中的自然、地方和距离”，载[美]约瑟夫·拉彼德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焯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类的“栖居”之处和物质之源，还因为它是形成人类共同体的自然纽带，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来源。不能定居，就意味着没有“道德之根”<sup>①</sup>。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时强调其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人民和土地是通过共享的地形与统一经济的生态基础连结起来的，这种连结是对欢乐与痛苦共同体验与记忆的历史结果”，正是在这些具有历史印痕的土地上，“‘我们的人民’诞生了，得到了养育和繁衍；民族的地形限定了人们的认同内涵，决定认同的特征。”<sup>②</sup>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作为意义的本源，地理能够同时指涉全部历史实在，涉及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国家等整体的各组成部分。<sup>③</sup>因此，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往往与具体的地域联系在一起，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往往从地域认同开始。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众所周知，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④</sup>。在他看来，这四个“共同的”特征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成其为民族。虽然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经常受到批评<sup>⑤</sup>，但对于个体和社会构成某个具有一致性、凝聚性和连续性的“命运共同体”来说，地理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俄罗斯国家的地域认同观念，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在11-12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时期逐渐产生了“全国土感”（*общеземское чувство*），

---

① Цимбаев Н.И. До горизонта – земл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7. №.1. С.18-42.

②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5页。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民族起源时区分了两种民族模式，即近代西欧的“公民的‘民族’模式”和亚洲及东欧地区由外力催生的“族群的‘民族’模式”，前者强调政治认同，后者强调文化认同，虽然两者有别，但前者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是历史形成的领土，后者则是本土文化。参见 Smith D. Anthony,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③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时间》（第三卷），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⑤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如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并不是世上的唯一标准，符合这一定义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不管在何时都可被称之为“民族”，例外情形反倒不时可见。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5页。

俄罗斯国土（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这个术语，经常出现在当时王公的口中和编年史作者的笔下。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全社会对俄罗斯国土这种观念的觉醒是根本的、最深刻的时代因素，但是民族的统一感当时还只是表现在共同的乡土这个层面，还没有表现为民族性格与历史使命的共同意识，因为在构成一个国家的一切因素之中，领土这个因素最容易为人理解。<sup>①</sup>随着莫斯科公国不断兼并其他公国，大俄罗斯逐渐统一于莫斯科政权之下，王朝利益与民族利益逐渐融合为一，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也应运而生。但是统一起来的大俄罗斯并没有确定疆界，它的疆界随着莫斯科武力的胜利以及大俄罗斯移民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sup>②</sup>

领土的扩张是俄罗斯从地域认同向地缘政治认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俄罗斯帝国的记忆首先是围绕扩张而形成的。俄罗斯扩张的驱动力离不开地理这个最基本的因素。20世纪初，麦金德从地理环境中追寻历史的足迹，认为“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sup>③</sup>俄国历史学家的解释也往往从地理环境展开。С.М. 索洛维约夫发展了乃师波戈金关于古罗斯人民“漫游”（бродяжничество）的说法，将俄罗斯视为不同于西欧扩张的“自我殖民”的国家（страна, которая колонизируется）。对于西欧国家的人民来说，自然环境是母亲，而对于东欧国家尤其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来说，严酷的自然环境则是后母，“历史的后母”（мачеха-история）迫使东斯拉夫人自西向东拓展。<sup>④</sup>但是，这种扩张并不总是一种自然的地理殖民过程。随着扩张的展开，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越来越突出。俄国的历史学家们早就区分了修道院及农民的殖民与国家的扩张，据此而将俄罗斯的国家扩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扩张持续到

---

①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1-203页。

②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张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4-116页。

③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51页。

④ Цимбаев Н.И. До горизонта – земл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俄罗斯自我殖民这一观点也被С.М. 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所沿用。

17 世纪末，规模空前，确定了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历史存在，其边界为北部和东部的自然边界，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俄罗斯最安全的边界。第二阶段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 80 年代，俄罗斯借助于军事实力确立了它的欧洲强国地位。第三阶段延续到今天，俄罗斯耗尽了扩张的潜力，企图守住以前的成果，但国家政治体制的变更（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使其丧失了明确的帝国目标。<sup>①</sup>

对于俄罗斯扩张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已经从政治、经济等理性因素一直到非理性的历史心理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解释。<sup>②</sup>以赛亚·伯林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中，将世界上的民族主义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为特征的进攻型民族主义，一种是以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为标准的防御型民族主义。<sup>③</sup>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两种民族主义兼而有之。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既是侵略性的，也是防卫性的，依据侵略的模式，它转化为帝国胃口，寻求直面占领与俄罗斯人居住的俄国土地连接的地域。”<sup>④</sup>据此推衍，也可以将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划分为扩张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扩张性认同是将本民族的认同强加于帝国所占领的其他民族的土地上，而防御性认同则是防止本民族的认同被外来的力量破坏。正如历史所呈现的，俄罗斯既有防御性认同，也有扩张性认同，而扩张性认同则是主要的基调。

俄罗斯对于领土的追求、对外扩张不知“适可而止”的态势令人惊讶<sup>⑤</sup>。阿伦特在论述扩张的时候，曾引用英国殖民者罗德斯的学说：“扩张即是一切”。罗德斯仰望苍穹，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星辰……这广大无涯的世界，

---

① Цимбаев Н.И. До горизонта – земл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② 关于俄罗斯的扩张，有地理环境、殖民、贸易、宗教、王朝野心、意识形态、历史心理等因素的解释，可参见[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92页；[俄]Б.Н·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

③ 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211页。

④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⑤ [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均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并吞的；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的星辰。”<sup>①</sup>俄罗斯的扩张在许多时候与现实的目标脱离，似乎是为扩张而扩张；帝国是没有边界的，它的扩张不是总可以用常理来忖度。1865年，俄国内务部长瓦卢耶夫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塔什干已经被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攻下，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sup>②</sup>这句话在当今的俄罗斯学界被广为引用。

扩张是俄罗斯历史的主题，对疆域的感受保留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中<sup>③</sup>。这种记忆可以从一些最初的观念中得以发现。例如，俄罗斯的地理认同观念，可以从“祖国”的表达中寻找语义学的来源。对俄语中“祖国”词汇的探讨，亦可揭示出俄罗斯的地理认同有异于其他民族。在汉语中，“祖国”是所谓的“祖居之地”，“父母之邦”。英语中，表示祖国含义的父亲之地（fatherland）和母亲之地（motherland）完全等值。但是在俄语中，表示祖国之义的“父国”（отечество）和“母国”（родина）则有很大的差异。“母国”来自于对“潮湿的大地母亲”（мать сыра земля）的信仰，代表的是俄罗斯生活中仁慈、团结、忍耐的一面，而“父国”则强调俄罗斯国家力量、威严、专制的一面，甚至染上了帝国的色彩。<sup>④</sup>俄罗斯人在表达“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这一术语时，用的是“父国”一词，在撰写“国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时也无一例外地使用“父国”一词。

对于帝国扩张的回忆亦可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去寻找。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极度繁荣与所达到的高度令世人震惊，但是俄罗斯文学向世人展现俄罗斯自然和社会风貌的同时，也显示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底色。埃娃·汤普逊将萨义德的概念用于斯拉夫人的地域，专注于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意识，揭示俄国文学起到了为帝国代言的作用，把

---

① [美]汉娜·鄂兰（阿伦特）：《帝国主义》，蔡英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2-3页。

② Валуев П.А. Дневник. Т.2. М., 1961. С.60.

③ 2016年11月24日，普京在莫斯科参加地理知识颁奖活动时，问获奖的9岁男生“俄罗斯边界在哪里”，男生说是白令海峡，普京说“俄罗斯的边界无止境”，获得了在场观众的欢呼，普京随即说这是“戏言”。不管有意无意，俄罗斯人对领土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Татьяна Замахина. Путин: Граница России нигде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ноября 2016 г.

④ 参见[美]詹姆斯·比灵顿：《俄罗斯寻找自己》，杨恕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59页。

一种对俄罗斯占据局面的叙事强加给了被征服的地区，排挤本地的要事和本地的故事。<sup>①</sup>

俄罗斯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书写，其地理和疆域观念也与俄罗斯的历史编纂传统紧密相关。从俄罗斯通史的写作中可以发现，由地理环境入手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俄罗斯的历史书写可以追溯到修道士撰写编年史的 11 世纪，其中 12 世纪由洞窟修道院修士涅斯托尔编写的《往年纪事》被认为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史。<sup>②</sup>《往年纪事》开篇即明确指出，此书记载的是“罗斯民族从何而来，谁是基辅开国大公，罗斯国家如何形成”。作为职业僧侣，涅斯托尔以《圣经·创世纪》的大洪水之后的地理分布着手，进而逐渐聚焦于斯拉夫民族的足迹以及罗斯国家的起源。可以认为，以地理环境展开叙述的俄国通史始于中世纪的《往年纪事》。作为俄罗斯第一部通史著作，塔季歇夫的《俄国史》虽然没有从地理切入，但仍有专门的一章用来论述俄国的地理。<sup>③</sup>而索洛维约夫撰写俄国通史时，正式奠定了从地理说历史的传统，他在《远古至今的俄罗斯史》第一章中，即以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俄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的。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同样将地理环境安排在他的通史著作之首，强调自然环境对于俄罗斯民族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的塑造作用。德顿指出，“自索洛维约夫以后，几乎所有俄国史都以地理章节开始”<sup>④</sup>。此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无法消除。其后的普罗托诺夫虽然在他的通史著作中不再以地理开头，认为没有必要再列出自然环境对风俗民情的影响，但还是建议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去阅读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著作，他仍然认同地理环境的巨大影响。<sup>⑤</sup>

苏联时期的俄国通史著作彻底放弃了从地理说历史的传统。20 世纪 50

---

①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② 关于《往年纪事》的编著者现在还存有争议。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米洛夫认为：“《往年纪事》的编著者问题是最复杂的史科学问题之一，迄今尚无满意的解答。学术界就此问题已经讨论了两百年之久。” Милов Л.В.(ред.) От Нестора до Фоновизина. Новые методы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авторства. М., «Прогресс», 1994. С.40.

③ Татищев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Т.1.М.: АСТ: Ермак, 2005. С.455-467.

④ Edward C.Thade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175.

⑤ 这一段的梳理参考了陈仁姮的研究，参见陈仁姮：“《往年纪事》在近代俄国通史编著的意义”，《台大历史学报》，2009 年第 43 期。

年代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所和历史所等编撰的大型多卷本《苏联历史概要》，其第一卷直接从原始社会入手。<sup>①</sup>由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编的《苏联通史》也是如此的处理办法。<sup>②</sup>这种变化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史学观念的改变，不如说反映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批评索洛维约夫的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只能通过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一起来实现。<sup>③</sup>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曾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他在此书的导言中指出，自然界对人的支配力不是无限的，“人能够左右自然界，所以自然界不是经济的基础。自然界只是经济所需要的材料。人的劳动才是经济的基础。”<sup>④</sup>苏联史学对俄国历史中地理因素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对传统地理观念的超越。但是从地理入手的历史编纂传统并没有丧失，定居国外的俄裔史家如维尔纳茨基、梁赞诺夫斯基等，依然将地理置于其编撰的俄国史之首，作为欧亚主义者的维尔纳茨基更是以地理为基础来阐述其理念。而俄罗斯境外的俄国史著作，如《剑桥俄国史》，也几乎是清一色地从地理说起。苏联解体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景象，但这一编撰传统仍然被一些学者继承下来。<sup>⑤</sup>

历史是民族和国家认同塑造的基础，历史书写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认同的形成。1884年，圣彼得堡神学院历史学教授科亚洛维奇在其著作中写道，塔季歇夫、罗蒙诺索夫、诺维科夫、卡拉姆津、卡切诺夫斯基、波戈金、柯斯托马洛夫、索洛维约夫、扎别林、克柳切夫斯基等人的历史著作展示了俄罗斯历史科学的传承性，它们可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生成的重要阶段，因为这些著作的出现，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不再仅仅依赖于民间

---

①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Т.1.// Под ред. Н.Н.Третьяков, А.Л.Монгайт.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6.

② [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三卷），张蓉初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

③ [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页。

④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页。

⑤ 如 Б.Н·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中首先论述地理环境和领土扩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的情感，也依赖于科学的基础”。<sup>①</sup>

## 二、后帝国时代的“地缘综合征”

“地缘综合征”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地缘政治焦虑，它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这一概念系由“帝国综合征”和“后帝国综合征”这两个概念延伸而来，<sup>②</sup>它主要是由于帝国崩溃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变化而形成的，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结构，也是一系列表现于外的行为。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涉及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说，地缘综合征是一种因危机而造就的“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在讨论历史意识的时候将危机划分为“普通”、“关键性”和“灾难性”三种，“普通”危机可以通过历史意识中已有的文化可能性来克服，“关键性”危机只有在加入新元素、超越已有的历史文化的诠释潜能时才能得到解决，而在“灾难性”危机下，代表历史叙述的关联性意义形成的基本原则受到了挑战，这样的危机是创伤性的。一个事件的创伤性特征并不是客观性的，它要看人们使用了怎样的诠释潜能。<sup>③</sup>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帝国的崩溃，它最直观地体现在帝国地理版图的大规模缩减，以及作为宗主国居民的大量俄罗斯人一夜之间成为异国居民这两个事实

---

① Коялович М.О.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амятникам и научным сочинениям. СПб., 1884.С.591. Цит. по Карлов Н.В. Честь имени, или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амосознан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7.№4.

② “地缘综合征”（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这个术语在俄文中虽偶有一见，但其讨论较为泛化，涵义相当于地缘政治野心。本文使用的“地缘综合征”源自于“后帝国综合征”（постимперский синдром）与“帝国综合征”（имперский синдром），这两个概念在俄罗斯学界中经常出现，借医学术语“综合征”来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因帝国崩溃而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状态和行为，如怀旧心理、帝国意识、激进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帝国野心等等。可参见 Паин Э. Империя в себе. О возрождении имперского синдрома в России.//После империи / под общ.ред.А.М.Клямкина.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07; Тихонова Н. Постимперский синдром или пои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Там же.

③ [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蔡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49-150页。

上。俄罗斯历史上虽然有过类似的经验，如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崩溃，但它很快被布尔什维克加入新元素并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但是苏联解体在地缘政治方面所形成的创伤，经过二十余年仍无平复的迹象，反而更加深刻。

另一方面，在地缘综合症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传统的帝国意识。如果说“创伤”是偶然事件所造成的，那么帝国意识则是俄罗斯民族长期的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它包括一些固有的心理模式，如帝国的扩张冲动、期待“明君”和“铁腕人物”的臣民意识、对“超级大国”和“帝国秩序”的记忆和想象，等等。这种心理结构很难改变，尤其是在“宗主国”的版图仍然足够庞大、政治秩序和结构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帝国意识与处于同一阵营的那些东欧国家急于逃避帝国、摆脱“老大哥”控制的心态形成对比，也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后的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俄罗斯虽然向联盟中央发难，并且是推动联盟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但作为历史上“自我殖民”的帝国，其“宗主国”地位没有改变；苏联解体之后，它依然是帝国的继承者，其领土规模、民族构成和政治体制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依然使其具有成为帝国的潜质。苏联解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俄罗斯作为“反帝国的帝国”所推动的，但深植于民族心理的帝国意识，使得俄罗斯的未来归宿依然不明。

俄罗斯的地缘综合症在苏联解体之后就初露端倪，但它的兴盛却要到普京执政之后。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即开始复兴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到 90 年代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地缘政治学的教材大量出版，地缘政治研究机构也大量成立，地缘政治学说开始泛滥。更为突出的是，俄罗斯各个政党，特别是左、右激进派别，都不同程度地将地缘政治主张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自民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到处宣扬民粹主义地缘政治，而久加诺夫则用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和“俄罗斯思想”来填充俄共的政纲。作为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者，新欧亚主义依然将地缘政治作为自己思想的基石。但是即便如此，地缘综合症还没有在民众中蔓延开来，民众的心理还没有被地缘综合症所左右。全俄民意研究中心（ВЦИОМ）199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少数人（25.5%）赞同恢复苏联，而大部分人（51.5%）赞成俄罗斯独立发展，应该

专注于国内问题。<sup>①</sup> 2000年，在一项回顾20世纪俄罗斯最大成就的民意调查中（14项选3项），只有28%的人提及苏联的建立以及成为超级大国。<sup>②</sup>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夹杂着激进民族主义的后帝国综合征并没有立即兴盛，而是在更晚一些时候出现。<sup>③</sup> 俄罗斯领导层对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公开表述是在2005年，当时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sup>④</sup>。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表述，被许多学者解读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回归。这也意味着，在苏联解体十余年后，俄罗斯官方开始反省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

苏联解体与地缘综合征出现的“时间差”，既反映了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反映了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变化，这两种变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蓄积过程。盖达尔认为，民众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忙于生计，根本顾不上考虑帝国的伟业；只有在衣食安稳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心回顾并评价并不久远的历史。<sup>⑤</sup>但派因认为，这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在危机笼罩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民众的政治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很高，而在生活水平提高、政治逐渐稳定下来以后，民众的政治热情反而下降了。<sup>⑥</sup>总体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众淡然面对苏联解体，地缘综合征并没有全面兴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俄罗斯的战略扩张和收缩具有周期性，“苏联人比较有效地从其多次过度扩张和自我围困中学会收缩自己的力量”<sup>⑦</sup>，不论精英还是民众对此都有一个理性的适应过程。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过度扩张战略进行了本能的调整，从地缘政治聚焦到国内政治，致力于内部的改革，此举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心理；相反，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并没

---

① Паин Э. Империя в себе. О возрождении имперского синдрома в России. С.107.

② Тихонова Н. Постимперский синдром или пои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162.

③ [俄]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另可参见 После империи / под общ.ред.А.М.Клямкина.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07.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Ф. 25 апреля 2005 г. <http://www.kremlin.ru>

⑤ [俄]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第10页。

⑥ Паин Э. Империя в себе. О возрождении имперского синдрома в России. С.107-108.

⑦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有激发国内的爱国热情，反而使社会上产生了厌战心理。虽然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引发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动，但这种变动主要是从内部发生的，而非外来力量强加的，因此民众并不认为是敌人“打败了”他们，反而认为苏联解体是俄罗斯的涅槃重生。俄罗斯联邦通过全民公决而独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东西方和解气氛，以及西方向俄罗斯民众所展现的“榜样”作用，令俄罗斯民众充满期待。意识形态障碍的消除似乎填实了俄罗斯民众中的“我们共同的大厦”的心理，作为几十年对手的西方逐渐褪去了“敌人”的形象，成为一个可以和平共处、相互依赖并且提供帮助的对象。

后帝国综合症的兴盛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90 年代初俄罗斯开启的大规模转型，它所产生的两极分化和失序现象在社会中积累了严重的不满情绪，使得民众的“怀旧”心理不断增强。不过这种怀旧心理主要是与苏联时期的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的成就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回到苏联。但是在“休克疗法”的根本性伤害之后，1998 年的金融危机给了俄罗斯最沉重的一击。社会的不满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释放，精英的任务则是为之寻找“出口”。这个“出口”有两个：寻找内部的“替罪羊”和寻找外部的“敌人”。就前者来看，“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社会把矛头指向执政精英，尤其是自由派精英。许多论者从精英品质的角度出发，将俄罗斯的执政精英视为“伪精英”（псевдоэлита）<sup>①</sup>，更有一些论者出于“阴谋论”的思维，认为俄罗斯自由派禀受美国的战略使命，从内部摧毁了苏联，而且现在仍然企图搞垮俄罗斯。<sup>②</sup>当时叶利钦出于政治需要，不停地更换政府总理，当意识到已经无力把握俄罗斯的发展进程，无从改变俄罗斯的现状，无法消除人民的痛苦时，只能

---

① 如 Панарин А.С. Народ без элиты: между отчаянием и надеждой//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1. №.11; Эдуард Попов. «Элита» против «элит».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качестве вла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perspektivy.info>; Шкараган О.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севдоэлита и ее идентикация в мирово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тология. 2011.№.4.

② 参见 Делягин М.Г. Светочи тьмы. Физиология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клана: от Гайдара и Березовского до Собчак и Навального.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6. (Коллекция Изборского клуба)

提前下台，充当自己的“替罪羊”。从寻找外部“敌人”这个出口看，俄罗斯当局当时还没有将西方世界明确地树为敌人，而是从企图脱离俄联邦的车臣入手。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二次车臣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车臣分离主义者所制造的恐怖袭击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重新恢复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效性、重振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的声誉、有针对性地转移普通民众的视线，使得车臣战争成为一个必要条件。<sup>①</sup>因此，与第一次车臣战争相比，第二次车臣战争在俄罗斯国内获得了高度的共识。它的胜利也为叶利钦向普京交接权力奠定了基础。

经过第二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一次较大的释放。普京执政伊始即发布了宣言性的“俄罗斯新思想”，其中“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价值观构成了宣言的核心内容，而其指向则是大国的复兴。在许多论者看来，富有历史含义的“爱国”和“强国”传统中，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不言而喻。但是普京第一任期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国内秩序，从第二任期开始，地缘政治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被列入其议事日程中。

莫伊西用以构建其“情感地缘政治学”的三种文化也可以说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心路历程。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社会被“希望文化”所主导。引发剧烈地缘政治变动的苏联解体，以一种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完成，并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它被民众平静地接受，是因为民众愿意放弃帝国的“包袱”，轻装前进。俄罗斯的“希望”之源，一是借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使国家重新焕发生机；二是重新融入西方文明的大家庭，完成其新身份的最终确定。在“希望文化”的主导下，俄罗斯自动修正了以权力竞争、大国均势和势力范围等为特征的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希望以全面合作、相互依赖、共同协商的新型平等伙伴关系来取代。但这种“希望文化”逐渐被一系列地缘叙事所打破，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乌克兰“橙色革命”等具有鲜明地缘政治色彩的事件，彻底埋藏了俄罗斯的“希望文化”，俄罗斯被“恐惧文化”和“屈辱文化”所笼罩，地缘综合征全面体现出来了。

---

<sup>①</sup> Гудков Л. 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 «Враги» как массовый синдром и механиз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Образ врага / сост. Л. Гудков; ред. Н. Конрадова. М.: ОГИ, 2005. С.9.

在俄罗斯看来，俄罗斯放弃传统地缘政治、专注于内部改革的举措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积极回应。相反，西方国家不但没有履行其帮助俄罗斯进行内部改革的承诺，反而利用俄罗斯的衰败和虚弱以及战略上的收缩，在自命为“赢得冷战”的胜利下，继续进行地缘政治扩张。还在叶利钦时期，1993年，北约进行了首轮东扩，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纳入其中。此举虽然是西方的“外围”行动，大体上还能为俄罗斯接受，但已经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陷入信任危机。科索沃战争将这种信任危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普京执政之后，虽然尽力修复同西方之间的关系，并且利用“9·11”恐怖袭击事件为美国提供了道义和具体行动的支持，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美国不仅没有以任何方式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地位，而且伊拉克战争显示了美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风格，根本没有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平等协商的伙伴。2004年北约第二轮东扩计划除了继续吸收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还将后苏联空间的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进来。在战略挤压的同时，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几乎触及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底线，“像是一扇大门，在设法理解对方的俄罗斯和西方中间砰然关闭，很难想象出对任何一个事件能做出如此对立的解释”<sup>①</sup>。“橙色革命”对俄罗斯来说已经不是来自外部的战略挤压问题，而是被视为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侵蚀，同时是内部可能发生颠覆的信号。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顾问帕夫洛夫斯基写道：“基辅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为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技术做好准备，政治体制的内部虚弱加上外部的压力和挑衅，有可能使我们卷入一场新的革命，而在俄罗斯发生一场全球革命绝非小事。”<sup>②</sup>

一系列侵蚀俄罗斯利益的地缘叙事对俄罗斯形成了屈辱性的伤害，使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它迫使俄罗斯重新评估它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构成了普京2005年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至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回归已经不可避免。在国内，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反西方主义情绪借由政府的动员得到了尽情的宣泄，“敌人”形象

---

① [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强人治国：普京传》，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②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время не дали в морду. Интервью Глеба Павловск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7 декабря 2004 г.

得以确立。在对外政策上，俄罗斯越来越趋于强硬。在 2007 年 2 月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普京公开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再一次申明俄罗斯的诉求，但是西方除了领受其严厉的言辞外，依然无动于衷。奥巴马上台后，俄美之间所开启的“重启”政策只是昙花一现。美国领导人的更替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重启”的背景，但它已经无法改变备受挫折的俄罗斯对美国 and 西方的看法，随后而来的政治僵局并没有出乎人的意料。2008 年的俄格战争和始于 2013 年的乌克兰危机，是总结二十多年来后苏联空间地缘叙事的两个“节点”性事件，它们反映了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无法化解、逐渐集聚到临界点的过程。俄格战争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消化，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似乎并没有可以预见之期。目前，“后克里米亚共识”依然弥漫于俄罗斯社会，地缘综合征的克服也许并不是可以由时间来决定的。

在莫伊西的“情感地缘政治学”中，俄罗斯是一个同时拥有恐惧、羞辱和希望的混合体，在这三种相互竞争的情感中，羞辱感是最容易理解的。<sup>①</sup> 从上面的述说来看，俄罗斯经历了由希望到恐惧和屈辱的过程，同时又在屈辱和恐惧的反弹下重新寻找希望。其实，这三种心理都是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积淀，它们只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被激发出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不同的放大。俄罗斯的恐惧来自于传统的“不安全”心理，它的希望来自于久远的帝国传统以及与之俱来的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意识，它的屈辱来自于大起大落的历史轨迹。苏联解体以及新俄罗斯所经历的地缘政治变化，强化了它的恐惧与屈辱心理，后帝国综合征和地缘综合征只不过是恐惧和屈辱心理的反映而已。

### 三、后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话语与俄罗斯国家的三重身份

目前俄罗斯国内所弥漫的地缘综合征，突出地体现为对地缘政治目标以及地缘对手和敌人的认知和定位，它主要来自于俄罗斯对美国 and 西方的地缘

---

<sup>①</sup>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第 134-139 页。

政治扩张的回应以及所形成的地缘政治僵局。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它来自于俄罗斯的国家身份焦虑。苏联解体以及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局，对俄罗斯来说是一道深刻的创伤，这种创伤的克服有赖于构建新的国家身份认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寻找到新的统一，需要建立新的诠释模式，用以弥合时间的裂缝。约恩·吕森认为，认同是人与他者的关系中和与自我的关系中的关联性，具有共时和历时维度。在共时性方面，认同将自我与他者的各种关系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方面，认同涉及自我在历史长河中的改变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是在回忆和期待的对立中所形成的变革中的自我观念。<sup>①</sup> 因此，当前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既需要全面地审视自身和他者，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重新定位，又需要审视历史和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新的观念。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国家身份一直模糊不清，而且处于变动之中。苏联时期，它的身份是明确的，首先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其次是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最后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多民族共同体是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视角而言，超级大国系就地缘政治而言，而“老大哥”则指向其意识形态。苏联解体彻底改变了这三重身份，因此它们都需要重新塑造：是重建帝国，还是走民族国家之路？是重新成为“大国”和“强国”，还是做一个普通国家或者区域性大国？是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还是坚持“独特性”的发展道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摇摆，虽说是在大的文明框架下进行选择，实则是这三重身份的重新定位。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特点最为突出，在历史与传统的观照下，以地缘政治身份的定位为基点，可以剖析俄罗斯另外两种身份的塑造趋向和困境。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概念，其中许多都与地缘政治相关，亦可被视为地缘政治话语。这些话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涉及国家和主权，如“国家性”“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主权民主”等；另外一类涉及后苏联空间的欧亚地区，如“独联体”“近邻国家”“后苏联空间”和“欧亚联盟”等；最后一类涉及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

---

<sup>①</sup> [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52页。

如“国际新秩序”和“多极化”等。这三类话语分别指向俄罗斯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次中的定位。从这些话语中可以考察俄罗斯对其国家身份的关切、对地区身份的考量，以及对其世界政治身份的追求和定位。

### （一）国家身份

**国家性。**“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中最常见的一个概念。对这一概念解释较多，很多时候往往将其与“国家”通用，但在俄罗斯的语境里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在英文里用“statehood”一词与之对应。目前俄罗斯学界对它的释义一般有下列几种：（1）处于发展中的国家；（2）以社会的精神状态、历史发展特征、社会共同生活和国家治理的一定形式为特征的国家质性状态（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3）与社会相对而言的国家；（4）“最高权力与民众联盟”之间的关系。<sup>①</sup>从这几种内涵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界对“国家性”的理解，一是将其视为社会的特殊形式，不仅是一种法的现象，也是一种理念现象；二是将其视为国家与外在现实的互动。

俄罗斯的“国家性”概念显示了它与西方对国家理解的巨大差异。俄罗斯学者认为，以往对国家的解释都是基于欧洲的经验，以欧洲国家的形成作为标准模式，忽视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特点。在欧洲的政治传统中，国家是一个“利维坦”式的存在，因此人民竭力限制它的权力，将其置于社会力量的监督之下。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往往被视为一个发展不充分、落后于西方的专制国家。因此，他们认为，理解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必须要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出发。<sup>②</sup>俄罗斯国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习惯上所称的国家”具有很大的不同，<sup>③</sup>“俄罗斯社会”、“俄罗斯政权”和“俄罗斯国家”这些概念反映了俄罗斯人在历史长河中认同的独特经验。在俄罗斯的政治传

---

①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Отв. ред. А.О. Чубарьян. М., 2014. С. 81-82.

② Пастухов В.Б.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к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я//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4. №.2; Динес 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Власть. 2008. №.2.

③ Пивоваров Ю.С. Русская власть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ее осмыс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 2001. С.6.

统中，国家被视为文化发展的有机形式，国家和社会不存在对立，国家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意志，“国家的目的与社会的整个目的一样也是包罗万象、完全统一的”<sup>①</sup>。因此，俄罗斯在当今国家的转型发展中，必须要遵循历史的经验，不能忽视自身的特点。

在叶利钦时代，“国家性”就开始得到强调，但是其内涵与俄罗斯传统的“国家性”并不相同，而是有所变化的。叶利钦在追忆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写道：“新的国家性理念不是在今天诞生的，也不是在我或者舒什科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头脑中形成的。”<sup>②</sup>接下来他提到了 1917-1918 年各民族的独立进程被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措施所中断的历史，以及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他辩解说，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并不是为了跟戈尔巴乔夫争权，而是让俄罗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进行军事对抗，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sup>③</sup>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叶利钦当时强调的“国家性”即是从国际法角度所考虑的国家对外主权，是不受其他权力支配的权力。这是别洛韦日协定的理念基础，也意味着叶利钦抛弃了俄罗斯“国家性”概念中的传统内涵，重新回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俄罗斯的独立虽是由政治精英们所作出的决定，但它的形式则是人民主权，是全民公决的结果；1993 年通过的新宪法也是由全民公决所确立的。在 1994 年的国情咨文中，叶利钦提出了“巩固俄罗斯国家”（укреп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的任务。<sup>④</sup>1995 年 6 月 12 日，叶利钦在独立日庆祝会上依然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国家地位是人民赋予的，俄罗斯的政治架构是新宪法确定的。这也是为了防止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上台执政，重新回到原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失序以及意识形态真空，促使叶利钦的“国家性”概念开始向传统靠拢，这便是叶利钦授

---

① [俄]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78 页。

② [俄]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31 页。原文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在中文版本中被译成“国家”，此处引文改用“国家性”，其他一仍其旧。

③ [俄]叶利钦：《总统笔记》，第 132 页。

④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февраля 1994 г.

命萨哈罗夫动员全社会寻找“民族思想”的举动。传统的“国家性”概念中，基于俄罗斯历史经验的“理念”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意识到，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必须汲取历史的养分。“民族思想”的寻找在叶利钦时代并没有结果，它一直延续到普京时期。普京巩固“国家性”的举措，在“主权民主”这个政治概念中体现出来了。

**主权民主。**普京对“国家性”的巩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造政治架构，建立“垂直权力”体系，整顿社会秩序，回归传统价值，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恢复对内主权的方面。二是从对外主权方面来看，坚决回击来自外部的干涉和指责，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俄罗斯精英与社会对“主权”有一种矛盾，即轻视与珍视并存：珍视俄罗斯独立于苏联的主权，但对俄罗斯国内的主权有所放任。叶利钦那句“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可以拿走多少主权”的口号，虽然是为了争取地方精英的支持，但也反映了将主权作为工具的心态。这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有关。苏联解体恰逢全球重大变革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基于人口和领土的主权不再发挥关键作用，而通过控制经济和提供军事政治保护的方式让位于对主权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sup>①</sup>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精英们将主权视为负担。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之后的一段混沌时期，尤其是在地方分立主义盛行以及境外势力干预俄罗斯内政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主权”概念有了一种更深切的认识。

“主权民主”的提出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这一概念由“可控民主”发展而来。用“主权”代替“可控”，可以说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俄罗斯国内政治话语向国际政治话语的转变。“可控民主”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所导致的社会失序，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拨乱反正。随着普京对金融寡头的整肃、对媒体的管控，以及“垂直权力”体系的建立，“可控”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普京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举措被西方视为“民主的倒退”，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严厉指责；而美国介入乌克兰内政所导致的“橙色革命”，将主权问题摆到了俄罗斯当局的面

---

<sup>①</sup> Ростислав Ищенко. Беловежский путч: кто выиграл от распада Союза. <http://ru.sputniknews-uz.com/analytics/20161208/4333300.html>

前。按照齐姆布尔斯基的观点，主权包含“事实与承认”（факт и признание）两方面，据此可分为“事实的主权”（суверенитет факта）与“承认的主权”（суверенитет признани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主权主要是来自外部承认的主权，“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当局觉察到这种主权面临的危机，因此要把“承认的主权”变为“事实的主权”，防止俄罗斯国家的合法政权被颠覆。<sup>①</sup>因此，“主权民主”的提出适应了这种需要。在俄罗斯高层的讨论中，梅德韦杰夫认为，“主权民主”将主权与民主这两个不相干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有生拼硬接之嫌。但这种解释并非是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的本义。从字面上来看，“主权民主”即是主权下的民主。实际上，“主权民主”中的主权不是修饰词，而是中心词。苏尔科夫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他的主权民主模式与欧洲的民主模式究竟有何区别？他回答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见，“主权民主”不是关于民主的争论，而是关于主权的争论。<sup>②</sup>它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作为传统帝国继承者对于主权的敏感和执着，尤其是反映了对苏联解体以来国家对内行使主权不畅、对外主权受到侵蚀的屈辱和焦虑。用苏尔科夫的话来说，“主权民主”的内涵不在于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它的实质，它追求的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尊严。<sup>③</sup>

全球化在冷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超越和消解了传统的主权观念，从而对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形成了冲击。但完全脱离主权来看待全球化，不仅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有相当的距离，也忽视了主权历史由来中的隐秘线索。一些学者在研究帝国之间的互动时提出了“主权想象”，认为主权思维和国际法的兴起不能仅仅归结为欧美法律传统自身的发展，主权想象是国家建构和帝国扩张过程所留下的重要的知识传承。<sup>④</sup>作为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对主权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俄罗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是不足为奇的，这也是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遭遇所导致的后果。

---

① Идея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ветском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го семинара. Выпуск №4(13). М.: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08. С.65.

② Там же. С.66.

③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Концепция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апеллирует к достоинств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http://viperson.ru>

④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20 世纪 90 年代是“俄罗斯的噩梦”<sup>①</sup>，民主化进程中所呈现的乱象使俄罗斯的精英深感痛心。索尔仁尼琴所提出的“保全人民”（сбережение народа）的呼吁，被吸纳到“主权民主”中。索氏的“保全人民”不仅意味着保全和增加俄罗斯的人口，为其提供生存的物质条件，还要保全他们的纯洁精神。<sup>②</sup> 苏尔科夫将“保全人民”视为一整套哲学和民主的基础，他认为物质条件会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而“主权民主”正是为此而提出的。他强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话语”<sup>③</sup>。“主权民主”的提出虽然受到一些质疑，但总体上大受俄罗斯精英的欢迎。在 2013 年苏尔科夫去职时，体制内的人对他的政绩恭维有加，“纳什”运动的领导人 В·亚克缅科认为，他的思想和措施“在十年的时间里使贫穷屈辱、一盘散沙的俄罗斯变成了主权国家”<sup>④</sup>。

**爱国主义与强国主义。**在俄罗斯，爱国主义是与强国主义相伴生的。爱国主义由热爱家乡延伸而来，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国家的天然热爱、自豪感和归属感。爱国主义是俄罗斯引以为豪的传统，也是俄罗斯认同的一根主线。但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除了前述的朴素的地域认同情感外，它与对其他民族的“胜利”紧密相关。这既是俄罗斯民族抵御外来入侵的自豪感，也是它对外扩张的优越感。战争与胜利是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民族是在与外族的频繁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的建立是与战争相伴的，帝国的版图也是通过战争得以扩大的。18 世纪的俄国史学家卡拉姆津曾写道：“我们不需要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去寻找神话和传说，以提升我们起源的优越感：光荣是俄罗斯民族的摇篮，而胜利则是它的信使。”<sup>⑤</sup> 作为一项传统价值，当代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依然与“胜利”

---

① [美] 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2 页。

② Кондрашов А.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я мечтал о другой России. <http://vesti7.ru/2007.12.09>

③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Концепция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апеллирует к достоинств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Прямая речь. 30 августа 2006. <http://viperson.ru/>

④ Якеменко: Володин — выдающийся аппаратчик, а Сурков — бог. [http://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13/05/15/n\\_2910513.shtml](http://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13/05/15/n_2910513.shtml)

⑤ Карамзин Н.М. О любви к Отечеству и народной гордости / Отв. Ред. О.А.Платон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3. С.197-198.

密切相关。2003 年列瓦达中心在民意测验中设置了“你认为我们历史中最自豪的是什么”的问题，87%的受访者表示，是卫国战争的胜利。<sup>①</sup>可见，在乏善可陈的今天，爱国主义是熨平“创伤”的一剂良药，也是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的动员工具。

从上述的话语来看，俄罗斯在国家层面上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的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拒绝外部力量干涉其内政，拒绝完全效仿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珍视传统政治文化对社会的聚合性作用。

## （二）地区身份

**独联体。**独联体既是一个国际组织实体，也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的精英看待后苏联空间的一种观念。这个概念与后面要说的“欧亚”比较，更能突出它的内在属性。“欧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与之相比，“独联体”（“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既无地理涵义，也无民族和文化涵义，更无历史涵义，它只是一个较为单纯的政治概念。在这一点上，它与“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类似，但没有“苏联”这个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涵义。<sup>②</sup>

独联体是一个仓促成立的邦联式组织，主要为了应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斯拉夫兄弟国家关系的协商和调整，后来扩及其他原加盟共和国。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步步推进，逐渐使苏联的存在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共产党执政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统合苏联的核心支撑。在此情况下，寻找新的联盟方案、防止苏联解体，成为执政上层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戈尔巴乔夫历尽艰辛所设置的“主权国家联盟”（Союз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条约的签署被“8·19”事件搅乱后，苏联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根据别洛韦日协定所建立的独联体，与“主权国家联盟”毫无共同之处，它只是一个政府间和议会间组织，不具

---

<sup>①</sup> Гудков Л. “Память” о войне и массов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ян// Память о войне 60 лет спустя. Россия, Германия, Европа.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5. С.89.

<sup>②</sup> 关于“苏联”的符号意义，参见张昊琦：《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第 146-147 页。

有国家地位。

因此，独联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安排苏联后事的“聚议堂”，一开始是为了处理苏联遗留问题以及加强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传统联系而设置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一体化框架。但后来随着独联体进程的加快及其在“后苏联空间”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它被赋予了“重新一体化”（реинтеграция）的功能。作为苏联国际法继承者的俄罗斯自然承担了主导者角色，试图通过独联体加强“后苏联空间”的统一性，组成新的经济、军事和货币联盟。<sup>①</sup>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这一愿望没有达成，独联体始终处于离心和向心的张力之中。因此，独联体中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其他的一体化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992）、“俄白联盟”（1996–2000）、“欧亚经济共同体”（2000），来共同搭建多层次的一体化平台，独联体的功能被逐渐弱化。不过实践证明，这些一体化组织也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当初的愿景。

除了独联体这个实体组织外，俄罗斯还有其他指涉这个空间的概念，如“近邻国家”和“后苏联空间”。相较于独联体来说，“后苏联空间”、“近邻国家”的地缘政治色彩尤其突出。事实上，独联体在地缘政治方面根本不能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后苏联空间”和“近邻国家”概念的背后才显露出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观念。从外延来看，“近邻国家”指称所有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波罗的海三国。<sup>②</sup>这个概念实际上意味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家的边界没有最后定型，总统委员会成员А·米格拉尼扬、国防部副部长А·科科申以及政府其他要员都曾作过这样的公开表述。<sup>③</sup>“后苏联空间”与“近邻国家”吻合，也是指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由于苏联解体至今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个空间在现实和愿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它具有明显的“弹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仍然将这一空间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观

---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19 марта 2014 г. <http://www.kremlin.ru>

② Тавадов Г.Т. Этн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М., 2011. С.122-123.

③ Гасан Гусейнов. Карт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и «граница на замке»: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деологемы. [http://www.indepsocres.spb.ru/gusein\\_r.htm](http://www.indepsocres.spb.ru/gusein_r.htm)

念。<sup>①</sup>俄罗斯贴上“后苏联”以及“近邻”的标签，潜意识里限制了这些独立国家的独立性，它不会允许“近邻国家”（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外国”（зарубежье）。

俄罗斯在开始落实欧亚联盟的时候曾经表示不会取消独联体，事实上，历来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将独联体置于俄罗斯外交优先的首位。毕竟独联体是一个实体存在，它的形式和内容比欧亚联盟那种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一体化组织有着更强的包容性和适宜性。除非未来欧亚联盟的成员国覆盖且超过独联体的成员国，否则它不会消失。

**欧亚。**与“欧亚”一词组合的概念很多，如“欧亚主义”、“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大欧亚”，等等。由于“欧亚主义”所赋予“欧亚”的传统的地缘政治涵义，欧亚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标签。对于“欧亚”的认知，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sup>②</sup>综合起来，它具有三方面的矛盾和统一，俄罗斯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的折衷与选择中决定着它的地缘政治走向：首先，地理版图上的明确性和模糊性。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指的是“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sup>③</sup>，这一区域先前被蒙古帝国占据，后来被俄国取代。显然这里是一个大致的概念。同样，对于欧亚主义来说，这也不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所指，它是一个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独立所在，在边缘地区仍可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的情况下，它的界限是不那么严格的。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来说，它虽然也是模糊的，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变动后这一地区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局面下，但是无论如何，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中，欧亚还是有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范围，即原苏联的版图空间，也可以说是“后苏联空间”或者是俄罗斯与“近邻国家”构成的整体。

第二，“欧亚”在政治上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特列宁认为，苏联解体已

---

① 国内学者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后苏联空间”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参见王志远：“‘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分析框架”，《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参见万青松：“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0页。

经使“欧亚”的地缘政治涵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sup>①</sup>将欧亚地区视为开放空间的观点，其实预设了各个新独立国家处于完全自主状态的隐含条件。从形式上看，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主权，能够决定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但是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和内在联系，不是仅仅可以用传统的主权可以说明的。或者说，这只是俄罗斯“承认”的主权，而不是“事实”的主权。<sup>②</sup>只有在俄罗斯首肯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才能决定那些与俄罗斯有着相关性的事项。因此，在俄罗斯事实上的“影响力”之下，这个地区处于半开放性或者半封闭性的状态。在世界大国在这一地区展开博弈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乌克兰危机只是这一现象的极端反映。

第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与缓和性。在传统的陆权和海权的对立中，欧亚地区是陆权的基础和象征。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念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也是文明之争，即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之间的对抗的外在表现。<sup>③</sup>在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谱系中，丹尼列夫斯基同时也是作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先驱的面目出现的，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中所阐述的俄罗斯与西方的文明对抗，使得任何一本俄国地缘政治教科书都不会漏掉他的名字。冷战时期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意识形态是其底色，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对抗都因意识形态而起。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浮现。亨廷顿所展示的文明冲突的图景，其实是传统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构化体现，也是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构想的基础：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布局，防止深具帝国思想的俄罗斯重新挑战其霸权。对此，不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有着内在的共识，俄罗斯为遏制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多元

---

① D.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Wash.: Carnegie Center, 2003.

② 例如针对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和主权问题，俄罗斯包括普京在内的许多人士都有乌克兰“不像一个国家”的表示，参见 Оксана Пахлёвска, Неоевразизм,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Украина (часть 2)// 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2011. № 2. <http://www1.ku-eichstaett.de/ZIMOS/forum/inhaltruss16.html>

③ [俄]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化”的状况，试图以“欧亚联盟”的形式统合这一地区的力量，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则竭力破坏这一进程。

欧亚地区的这三种特点，其实昭示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身份的塑造：放弃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至少以对待主权国家的方式来对待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不仅是各种一体化的主导者，也是地缘政治的主导者。当今俄罗斯人的地缘扩张热情已经非常微弱，主要是守成和控制。这种主导者身份，要求它不能通过武力扩张的方式兼并他国领土，而是通过其他各种软性因素将其圈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加以牵制。

### （三）世界身份

“多极化”与“国际秩序”。在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中，苏联是“半个地球的统治者”，对全球事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冷战后俄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苏联时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除了是冷战的“落败者”之外，它还被贴上了“虚弱”、“沉沦”、“失败”、“二流”等标签，也往往被赋予“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敌视外界”、“恃强凌弱”和“好斗”等人格化形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孱弱，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衰落的国家，其实力不仅不能支撑起昔日的全球地位，甚至还难以维持在地区层面的显要地位。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俄罗斯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但其能力与愿望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它的能力往往通过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依然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幅员、丰裕的能源资源、与美国相匹敌的战略力量，以及承继自苏联的大国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可以说是俄罗斯实力结构中的常量。但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等现代强国所需要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将俄罗斯排除在世界大国之外。列昂·阿伦认为，一个全球行为体首先应该是“区域超级大国”<sup>①</sup>，能够主导地区内所有国家。在这一点上，俄

---

<sup>①</sup> Leon Aron, “The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Its Domestic Context”,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8, p.3. 转引自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

罗斯的作用毫无疑问。它可以利用多种方式进行主导，或者是用利益来“羁縻”，如在能源等经济领域施以优惠；或者用“楔子”来牵制，纳卡、德左、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等存在争端的热点区域就是这样的“楔子”。利用这些方式确可慑服邻国，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对后苏联空间的新独立国家来说并无吸引力，尽管这些国家大多是与俄罗斯相同的威权体制。因此，它的主导方式和效果令人质疑。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羞辱性地将俄罗斯归为“威胁一些近邻的区域强国”，认为这并不是由于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虚弱；受到俄罗斯威胁的主要是它的邻国，而不是美国。<sup>①</sup>

国家综合实力是世界格局构成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经济实力并没有为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加分，俄罗斯受到的轻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因为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将中国而不是把俄罗斯视为其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挑战者。俄罗斯强调冷战后的世界是多极世界，并且承认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俄罗斯明了自己的实力短板，因此在事实上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追求“承认的实力”，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承认并尊重它的核心利益，以及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区域一体化及合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在这两方面的实力追求中，俄罗斯都不成功。美国和西方不仅没有给予俄罗斯“承认的实力”，而且还试图阻遏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所主导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使用了强烈的否定性手段，在不惜以武力惩罚那些企图脱离其势力范围的邻国的同时，也敢于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其目的，一是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二是表达自己作为一支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的存在，三是以此作为与西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在俄罗斯的认知世界中，尽管其综合实力远逊于苏联，但它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力量。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的举动也旨在向世界表明，没有俄罗斯的参与，许多国际事务是西方无法单独处理的。

在实力变化消长、世界权势自西向东转移的大格局中，俄罗斯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领袖地位有所下降，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

---

<sup>①</sup> “奥巴马讽刺俄为区域强国，承诺出兵保护北约盟国”，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26/5996612.shtml>

呈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而欧盟由于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问题，也显露了败落的趋势。西方世界的衰落使俄罗斯更有理由将多极化的到来视为当然，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对“多极化”加以明确的定义。普京在 2007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严厉指斥美国的单边主义。2012 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俄罗斯是新的多中心世界中的一个中心，其军事、地理和经济实力以及文化和人力资源决定了它拥有这样的地位。<sup>①</sup>不过，正如特列宁所指出的，中俄两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就认为多极化是理想的国际秩序结构，但在 2014 年前，俄罗斯一直通过参加“八国集团”以及与欧盟、北约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单方面追求在西方体系中的位置，希望身跨西方和非西方阵营来获得好处。<sup>②</sup>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俄罗斯的幻想，俄罗斯对多极化的追求更为紧迫。在关于“极”的概念中，俄罗斯学界提出了种种设想，如格拉济耶夫的“三极世界”、卢基扬诺夫的俄中“伙伴关系”、卡拉加诺夫的“大欧亚”、特列宁的“俄中协约国”，等等。<sup>③</sup>卢基扬诺夫的看法也许更符合俄罗斯的心理：“现在俄罗斯对参与国际机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回到了苏联时期，——或者是我们成为一个中心，作为一极（当然这是最佳的），或者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从零开始，共同制定规则。”<sup>④</sup>

对于俄罗斯语境下的多极化理念，许多论者认为，这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不如说是要复兴旧的秩序，即类似 1815 年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欧洲协调。<sup>⑤</sup>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久拖不决，欧洲协调之类的论调也越来越多。2015 年瓦尔代俱乐部起草的一份报告肯定了欧洲协调的作用，认为维也纳会议各方“寻求建立一个能够管控大国冲突、避免大国正面碰撞或者将破坏控制到最小的国际关系体系”，否则国际关系将会进入“霍布斯时刻”，即

---

①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силы XXI век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7 декабря 2012 г.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От Большой Европы к Большой Аз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ая Анганта. 14 мая 2015. <http://globalaffairs.ru/>

③ 参见盛世良：“俄罗斯国家定位和发展前景之争”，李凤林主编：《欧亚发展研究 2016》，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年，第 1-13 页。

④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Россия и не-Запад//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6411 (139). 25 июня 2014 г.

⑤ [英]萨克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2 期；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没有规则的战争”。因此，1815年的国际机制充满了智慧，而1919年和1991年的国际机制则缺乏远见。<sup>①</sup>这份报告指出，地理上将形成两大集团，一方包括美国、欧盟及其同盟者，另一方则是中国、俄罗斯及相关国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分别构成这两者的经济基础。这种秩序不是来自以前的战争废墟，而是从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的“辩证混乱”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在这种未来的结构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这是一种新型的力量平衡，但是没有冷战时期的痕迹；“大西洋共同体因统一的价值观念联合在一起，非西方国家则因强调多元的重要性而走到一起，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帖上统一的标签；这是与多极世界的现实状况更为契合的理念。”<sup>②</sup>

权力政治与大国协调是俄罗斯熟悉的套路，俄罗斯更谙熟其中的法则。从俄罗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它还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并不奉行彻底的修正主义，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它所需要的是得到别人的尊重，在世界政治中有表达自己话语的一席之地。

### 结语：“地理的诅咒”与俄罗斯的宿命

作为一种单一的非演进的国际政治理论，传统地缘政治学历来饱受诟病。地缘政治思想的潜在假设是环境决定论，“作为土地和命定的空间等概念，其内在的基础含义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中。本质上而言是空间而不是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sup>③</sup>在地缘政治论者看来，历史的规律是各民族必须通过“征服空间”来扩张，否则就会灭亡；在法西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那里，地缘政治学充当了服务国家欲望的意识形态

---

① Война и мир XXI ве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аланс нового типа. 21.1.2016. <http://ru.valdaiclub.com/a/reports/voyna-i-mir-xxi-veka-mezhdunarodnaya-stabilnost-i-/>

② Там же.

③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态工具。因此，汉斯·摩根索将地缘政治学斥为“伪科学”。<sup>①</sup>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兴起了所谓的“新地缘政治学”，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假设已经陈旧过时，<sup>②</sup>但是新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却将传统地缘政治重新推向了前台。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政治图景中，乐观者看到了自由和民主将一统天下的“历史的终结”，悲观者看到了基于种族、文化和宗教对立的“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的重构，特别是“9·11”事件、世界金融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的发生，似乎显示世界朝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悲观预期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全球政治重构的推动性力量，以技术革命为基础、受市场逻辑驱动的全球化，“在反常的交替之中孕育了地缘政治的回归”，它“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关系”，并使得“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sup>③</sup>，而传统地缘政治中的对抗观念和零和博弈思维也越来越显露出来。

在传统地缘政治回归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兴起并不是一个独立或独特的现象。俄罗斯社会所呈现的地缘焦虑，只不过是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下的体现。一方面，俄罗斯庞大的地理规模以及统合这个庞大躯体是它的历史宿命。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依靠不断扩张而兴起的帝国，围绕着扩张的地缘政治观念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迷恋早已镌刻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詹姆斯·比灵顿在《圣像与斧头》中说，“地理，而不是历史”，一直主导着俄罗斯人的思想。<sup>④</sup>这种说法虽不十分确切，但道出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卡普兰认为，不管是谁统治俄罗斯，都不得不对其领土过于庞大、与周边邻国缺乏自然分界这个令人头痛

---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6-197页。

② 参见许勤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倪世雄、潜旭明：“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 [法]罗朗·柯恩-达努奇：《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吴波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26-27页。

④ 转引自[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3页。

的事实；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提供，他们所拥有的、上帝施与他们的，也就是地理。<sup>①</sup>

另一方面，俄罗斯庞大的地理存在不仅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观念，它是观念与事实的重合之地。俄罗斯所处的欧亚大陆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中最有权力潜质的地方。在这种观念中，不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占据这个权力中心地带，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正如摩根索所评说的，“地缘政治学只告诉我们哪一块空间由于它相对于其他空间的位置而注定孕育着世界的主宰”，但“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主宰将诞生在哪个特定的国家”。<sup>②</sup>因此，为了防止这种主宰性力量的出现，对其进行遏制是题中应有之义；布热津斯基将防止苏联解体后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视为美国的长期任务<sup>③</sup>，也不足为奇。而与此相对应，反击外来力量的地缘政治围剿成了俄罗斯“保全自己”的使命，似乎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内在动力。

因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热的兴起，以及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回归，既是源于外部压力的刺激，也是俄罗斯传统地理观念的一种体现。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情感发泄口，往往成为一个政权获得内部支持、增强合法性、转移国内其他矛盾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强认同的一个最直接、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工具。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政坛上政党林立，不断分化组合，左中右三派基本上阵线分明，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奇特的黏合剂，将政治精英尤其是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团结起来。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罗斯将克里米亚重新并入自己的版图，激发了俄罗斯狂热的“领土民族主义”，形成了所谓的“后克里米亚共识”。

在研究认同的构建时，论者经常从“他者”的视角出发，突出自身与他者的差异化以强化自身的同一性。而在俄罗斯这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者”往往即是外部的“敌人”。通过“敌人”的树立来构建认同，不论

---

① 转引自[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第184、192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196—197页。

③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已经有很多的例子。历史上，英法两国存在着长达150年之久的恩恩怨怨，两国的国家认同都是通过自己的敌人而相互塑造出来的。在20世纪，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sup>①</sup>

然而，通过树立“敌人”来进行对抗所维系的认同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它是一种“消极的认同”<sup>②</sup>，往往忽视了国家内部“积极认同”的建设。某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迷失在地缘政治中是一种社会病态，这种病态是社会—国家的缺陷和对变化恐惧的综合体。<sup>③</sup>另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前景都是在“伟大强国模式”（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下设定的，但它反映的是一种虚拟的图景，而最现实的未来图景是维持现有的边界，安于地区强国的地位，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良好的福利，但这种图景在俄罗斯的公共讨论中是根本缺席的。<sup>④</sup>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热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会有消退的时候，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走出地缘政治对俄罗斯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

**【Abstract】**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roblems haunted Russia in its national identity. Synchronically, Russia needs to form internal unity when dynamically interacting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estern countries. Diachronically, Russia needs to overcome its traditional “path dependence” and reconstruct concepts of history. The reason why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arose mainly lied in that its national ideology was pulled away, but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filled this gap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ne hand,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as knowledge tradi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separable with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 Geographic-based territorial expan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Russia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opolitical upheavals caused

---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② См.: Гудков Л.К. проблеме нега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ониторинг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00. №.5.

③ Оболенский А.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к фантом лож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④ Урнов М.Ю. Россия: виртуальные и ре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4. №.4-5.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ntinuous erosio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led to the spread of geopolitical syndrome in Russian society,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s experienced a great deal of geopolitical discourse, reflecting its position and pursuit of self-identity at three levels, namely, state-level, region-level and world-level. At the state level, Russia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identity of a unique state with full sovereign through traditional values of cohesion. Regionally speaking, Russia has no longer pursued the previous “dominant” role but instead has tried to involve the post-Soviet space into its spheres of influences. Globally, Russia hope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ordina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t has not challenge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needs to get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by others. A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mobilization tool to strengthen identity, geopolitic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rontation and zero-sum game and its negative effect is obvious.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he contemporary reality, Russia can not get rid of “the geographical curse”. Lost in geopolitics may be the destiny of Russia.

**【 Key Words 】** Geopolitics, Geopolitical Syndrome, Geopolitical Discourse, National Ident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синхронного и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На синхронном уровне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нутреннее единство в интеракти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собенно с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а на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одоле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пу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Кризи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из-за отме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однак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восполнила данный пробел.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и традици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тделены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географии,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вёл к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отрясениям, вызванным постоянной эрозие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Запада, и привёл к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дром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тем самым способствуя подъёму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С момента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лся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который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отражал само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и устрем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Россия стремилась утвердить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и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олностью сувер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больше не стремилась к прежней роли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ния над природой», а попыталась создать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позицию «лидера», включи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свою сферу влияния; в стремлении к созда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играть важную роль координирующей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она не ставит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а требует признания и уважения. Являясь прямым и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обладает таки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ка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и игра с нулевой суммой, её негативный эффект очевиден.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радиций и реал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проклятия географии», затерянность в геополитике может также стать судьбой Росс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 ——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

荆宗杰\*

**【内容提要】**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源于多种思想流派，其中俄罗斯当代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不断从西方政治思想和俄罗斯传统思想中获取他所需要的反自由主义成分，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新欧亚主义，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杜金将其新欧亚主义赋予了“后现代”色彩。杜金的所谓“多极世界理论”，接续他的新欧亚主义大陆地缘政治思想的主旨，即“大陆-海洋”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设想。帝国模式是杜金给俄罗斯自我认同的定位，也是其“欧亚联盟”设想的组织模式和“多极世界”理论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谋求世界霸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

**【关键词】**新欧亚主义 多极世界理论 帝国模式 杜金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6-0060(31)

欧亚主义是“1921年产生于俄罗斯海外侨民中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哲学学说，是一种思想和学术运动的综合形式，该学说主张思想统治（Идеократия），其政治思想影响延续到了21世纪初”<sup>①</sup>。学术界通常把20世纪20-30年代的早期欧亚主义被称为古典欧亚主义。古典欧亚主义者们虽

\* 荆宗杰，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讲师，法学博士。

① Грицанов А.А.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н.: Интерпрессервис; Книжный Дом, 2002. С.346.

然在俄罗斯的历史哲学和俄罗斯自我认同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立场，比如从地理位置出发阐述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欧亚属性，强调俄罗斯文明的整体性、有机性、宗教性和反个人主义特点，将与沙俄领土大致相符的地区范围看作是斯拉夫—突厥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发展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也有分歧，特别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古典欧亚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最终导致了早期欧亚主义运动的瓦解。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面临各种危机，苏联时期沉寂了几十年的欧亚主义重新在俄罗斯兴起。这股思潮被称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新欧亚主义思想与古典欧亚主义思想一样具有地缘文明学说的特点，从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空间特点出发阐述俄罗斯文明的与众不同，认为这种独特文明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进而提出了俄罗斯在当今世界中的地缘政治任务和使命。新欧亚主义也是由众多思想汇集而成，当代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内部存在很多流派。比如，以 А.Г. 杜金（А.Г.Дугин）为代表的“右翼”激进流派把新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建立帝国的意识形态。而以 А.С. 帕纳林（А.С.Панарин）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流派具有“左翼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主张建立大众或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强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反对共产主义和“欧洲-大西洋主义”，不赞同古典欧亚主义的“思想统治”制度，也不认为俄罗斯的极权制度源于俄罗斯的传统。帕纳林也赞同将“帝国”作为欧亚主义的实现模式。还有 В.Я. 帕申科（В.Я. Пашенко）和 И.Б. 奥尔洛娃（И.Б. Орлова）为代表的一派，他们试图从文化哲学角度证明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类型，奥尔洛娃认为，当代地缘政治主体已经不是单独的国家，而是作为历史文化体系的文明，等等。虽然新欧亚主义各流派观点不尽相同，但各种新欧亚主义流派都主张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在未来世界地缘政治中应占据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大国地位，并积极支持独联体范围内的重新一体化，为此各流派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方案和设想。

在这些欧亚主义者中，А.Г. 杜金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他作为当代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想家，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上。与古典欧亚主义思想一样，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也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苏联

解体以来，杜金连续出版了许多地缘政治著作，宣扬自己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观点，他被称为“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sup>①</sup>。

俄罗斯国内外对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大多为负面评价。有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欧亚主义”，而是“伪欧亚主义”<sup>②</sup>。还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极右翼的意识形态”<sup>③</sup>。特别是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如：法国学者拉柳埃尔(Marlene Laruelle)、俄裔德国学者刘克斯(Leonid Luks)、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sup>④</sup>等，他们对杜金的评价极为负面，把杜金视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sup>⑤</sup>，称其为极端的右翼思想家，甚至是“新法西斯分子”。

事实上，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与古典欧亚主义思想家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古典欧亚主义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地缘文明观，并不建议在地缘政治上对抗欧洲，只是强调俄罗斯与欧洲不同，不能丧失俄罗斯的文明独特性。比如萨维茨基就曾提出，“和欧洲接近时，需要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要独立于它”，<sup>⑥</sup>而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则是彻底的反西方主义思想。围绕反西方主义这条主线，杜金在其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中结合了西方的和俄罗斯传统的、过去的和现代的、左派的和右派的各种不同立场和不同时期的思想，使其地缘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对抗色彩。

备受争议的杜金凭借其地缘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被当代俄罗斯地缘政

---

① См: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2; Дугин А.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арадигмы теори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М.: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3;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 М.: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② См: Иванов А.В., Попков Ю.В.,Тюгашев Е.А., Шишин М.Ю.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лючевые идеи, ц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иоритеты. Барнаул, 2007. С.56-73.

③ Колосов В.А, Мироненко Н.С.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М.:АСПЕНТ ПРЕСС, 2001. С.161.

④ Андреас Умланд. 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усском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е” О значении взле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угина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ие. 2009. №2.

⑤ Marlene Laruelle, “*Translated by Mischa Gabowitsch.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Савицкий П.Н. Континент Евразия. М.: Аграф, 1997. С.411.

治学者们视为“当代欧亚主义最鲜明的代表”<sup>①</sup>，“当代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的首要理论家”<sup>②</sup>。除了理论构建，杜金还积极参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运动，曾组建欧亚主义政党“欧亚党”（Партия“Евразия”），现为“国际欧亚主义运动”（МЕД）领导人，不断宣扬他的新欧亚主义。随着俄罗斯社会日益趋向保守主义，杜金的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2009–2014年杜金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担任负责人，并被聘为社会学系教授。特别是2011年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方案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杜金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界的“政治明星”。西方媒体也时常对杜金及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影响加以评论，土耳其媒体甚至将杜金直接比作美国地缘政治大师、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其为“俄罗斯的基辛格”<sup>③</sup>。

杜金自从创立他的“新欧亚主义”以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体系。2003年，杜金开始为自己的新欧亚主义思想赋予所谓“后现代”（Постмодерн）的含义<sup>④</sup>，2007年又提出“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sup>⑤</sup>。受法国著名“新右派”思想家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思想的启发，2008年，杜金在新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具有强烈反西方自由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第四政治理论”<sup>⑥</sup>。随后，杜金又将其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的角度进行系统整合，提出了“多极世界理论”<sup>⑦</sup>。如果说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是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上的发展，那么“多极世界理论”（ТММ）则是杜金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对新欧亚主义思想的最新总结。杜金对该理论

① Мухаев. Р.Т.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М.:ЮНИТИ-ДАНА, 2010. С.261.

② 参见[俄]Э.Г·索洛维约夫：《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俄]安·巴·齐甘科夫，巴·阿·齐甘科夫主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徐向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③ Виктор Дяченко.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й блок «Евразия»:от Гаусгофера до Дугина. <http://from-ua.com/articles/323903-kontinentalnii-blok-evraziya-ot-gausgofera-do-dugina.html>

④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форуме”. Москва, 26 июля 2003г//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4. С.231.

⑤ 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СПб.:Амфора, 2007.

⑥ 参见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

⑦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М.: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期待。2014年7月，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举办了《多极世界理论》一书的罗马尼亚语译本发行推介会。杜金在会上说：“‘多极化’的概念至今尚未获得相应的理论发展，当前俄罗斯的精英们片面和肤浅地使用‘多极化’一词。我的《多极世界理论》一书的任务，就是弥补俄罗斯国际政治战略机构的这些不足”<sup>①</sup>。

新欧亚主义思潮内部流派众多，观点不一，但由于该思潮的主要方法论是地缘政治学，因此笔者选取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家杜金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尝试通过对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和其地缘政治思想特点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及实质。

## 一、杜金的“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

杜金将新欧亚主义看作是一种世界观，是“原创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学说。因为在他看来，“地缘政治也是世界观”<sup>②</sup>。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进入2000年以后，杜金赋予了新欧亚主义思想“后现代”（Постмодерн）的含义，于是他的地缘政治思想自然就成了所谓“后现代地缘政治”。

杜金将其“多极世界理论”也列入“后现代”理论之列，他用“时间”的概念来对“多极世界理论”进行诠释。杜金认为，在“时间”的坐标系中，可以区分出“前现代”（Предмодерн）、“现代”（Модерн）和“后现代”（Постмодерн）三个阶段。所谓“现代”，是指“对传统社会进行否定的替代范式”，它是一种后传统的、反传统的社会形式。“现代”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基础是“用科技进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神权、集体主义、信仰、直觉和整体性”<sup>③</sup>。杜金所指的“现代性”，相当于人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杜金看来，“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

---

① Презентация книг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угина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в Кишинёве. <http://enews.md/articles/view/4561/>

②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1999. С.12.

③ Дугин А.Г.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 М.:Арктогея, 2004. С.467.

“逐渐自由主义化的过程”<sup>①</sup>，“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摆脱一切”（свобода от всего），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自身隐含着“虚无主义”，因此，“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纯粹而具体的体现”<sup>②</sup>。杜金认为，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使“现代性绝对化”，达到自己的极限。随着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终结，现代性耗尽了自已否定传统社会的所有潜力，它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历史任务，体现出“后现代”的特点，或者说是“超级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消极特征”。于是，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现代”时代结束了，“后现代”或“超级现代”的时代开始了。

在所谓“后现代”时代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后现代”模式，一种是所谓“后历史”和技术至上的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有：法国人让·波德里亚尔和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等。杜金把这种“后现代”称为是“消极的、悲观的”后现代，是“现代性”消极后果的产物。他认为这种“后现代”是“割裂传统和现代之间联系”的“大西洋主义的后现代”，其中全球化是“后现代”最主要的特征。另一种“后现代”则表示一种趋势，是与“后历史”和“后工业社会”相对立的“后现代”，它将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后现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代表是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两翼——“新左派”和“新右派”。杜金称其为“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看作是激发创造和发展的动力”的“欧亚主义后现代”<sup>③</sup>。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杜金主张用“欧亚主义后现代”取代“大西洋主义的后现代”。

在用“后现代理论”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地缘政治现实时，杜金指出，两极世界体系的结束，是“后现代”时代的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以美国为首的海洋文明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出现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即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相互竞争的后现代全球化方案。一种是正在积极发展中的美国主导的

---

① Дугин А.Г.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 С.468.

② Там же.

③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4. С.231.

单极全球化，也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化的世界秩序，或称为“单极的后现代性”。杜金认为当前的全球化现状是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所谓大西洋主义，这不仅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原则，它还具体体现为强大的军事集团——以北约、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及其附属的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各种代理人，等等。所有这些国家和组织机制都服从一个任务——建设和巩固“单极世界”。另一种全球化世界秩序方案，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大陆集团联合反美的大多数力量建立“多极世界”。关于将单极全球化等同“后现代”的观点，杜金认为，“如果全球化就是后现代，那么多极化则是这种后现代的对立物”<sup>①</sup>。杜金又补充道：“某种意义上，多极化也是一种后现代，而不是现代或者前现代，但这种多极化的后现代完全不同于单极全球化的后现代。”<sup>②</sup>这样，杜金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海洋—陆地”文明的、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以及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对立划分，从而实现了从新欧亚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向新欧亚主义的“后现代地缘政治学”的转变。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是“基于现代性和后现代命题的哲学分析之上的”<sup>③</sup>。他试图使欧亚主义的思想纲领适应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即所谓“后现代”的现实情况和挑战。在他的新欧亚主义思想中，诸如宗教、民族、帝国、崇拜、忠诚等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的概念都被赋予了“后现代”的意义。杜金新欧亚主义重视传统社会价值观，但也不是盲目地否定现代化进程，而是准备接受“尚未脱离文化根源的技术和社会的”那种现代性。因此，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不仅具备“前现代”的特征，还兼具“现代性”和“后现代”的一些特点。

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现实，杜金承认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和基础性的”进程，全球化“决定了现代历史的基本方向”。因此，杜金新欧亚主义是一种“承认全球化客观性的全球战略”。另一方面，杜金新欧亚主义也与西方全球主义一样，认为“民族—国家”时代终结了，但杜金新欧亚主义的全球化观与全球主义者们的单极全球化或者统一的世界政府领导的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М.: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С.337.

② Там же. С.340.

③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99.

“世界国家”方案不同，新欧亚主义者们的全球化是“多极的全球化”<sup>①</sup>。

## 二、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

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是一种关于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该理论是以所谓“多极化”（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为核心概念构建的。杜金并没有对“多极化”做出明确的定义，只是笼统地称“多极化”为“开放性的方案”，并用“多极化不是什么”的排除法界定了“多极化”的大致范围。比如，“多极化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模式”、“多极化不是两极化”、“不能与单极世界兼容”、“多极化不是无极化”，“多极化不同于多边主义”等等<sup>②</sup>。最后，杜金将其“多极世界”的图景大致总结为：

1、多极世界是单极世界激进的替代选择，多极世界里能存在多个具有全球战略决策能力的享有独立主权的权力中心。

2、这几个全球性权力中心有足够的物质实力，以便在物质上能捍卫自己的主权免受最强大的敌对力量的直接干涉，也就是能够在物质上和军事—战略上对抗美国和北约。

3、这些全球性战略决策中心没有义务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和规范，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面前应保持完全的独立。

4、多极世界并不要求回到两极体系，因为无论战略上还是思想上，今天还不存在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物质和精神霸权上相对抗的单极力量，因此，“多极世界必须是多于两极的结构”。

5、多极世界并不重视当今“民族-国家”的主权。杜金认为，这种主权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这些“民族-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在战略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真正捍卫自己的主权。在 21 世纪，只有在国家间联盟的综合实力条件下才能真正捍卫主权。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

---

①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Аркогея-Центр, 2004. С.213.

② См: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М.: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С.16-29.

不能反映现实，必须进行修正。

6、各个决策中心（多极世界中的各“极”）既不是在统一的“世界政府”之下，也不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联盟”之中，更不是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极”应是在某些地区中发展起来的。

从杜金对“多极化”概念和“多极世界”特点的描述来看，他所主张的多极化既不赞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也不主张恢复雅尔塔体系的两极模式，对国际现状也不满。杜金的多极化方案是建立在坚决反对美国单极化的基础之上的，杜金的多极化既反对美国用武力推行的单极化企图，也反对当前流行的软性的“多边主义”单极化，因为这种“多边主义”实质上是美国主导的单极化的一种表现。杜金认为，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两极世界相比，多极化思想是从地缘政治视角对土地空间不同的看法：多极化反对单极化不是出于单一意识形态目的，而是从众多意识形态、文化、世界观和宗教的综合立场出发，是从陆地文明角度出发看待现有国际局势。西方的“海洋文明”有统一意识形态表述，而在“陆地文明”内部则是一些不同的世界观和文明的组合，因此，多极化有必要建立反对海洋文明的“大陆统一阵线”。<sup>①</sup>因此，杜金认为，恢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两极化是不可能的，而强化民族-国家秩序只是有利于维持美国单极化趋势的现状，“大陆文明”必须建立全新行为主体的多极化世界，才能对抗“海洋文明”的单极化。

为了应对西方大西洋主义全球化，杜金提出多极化的全球化方案——欧亚主义的“多极世界理论”。杜金试图“将西方霸权置于历史和地理背景中进行揭露”，在他看来，这是构建多极世界理论的最基础的一步。只有“对西方霸权进行解构，并揭露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普世化的企图”<sup>②</sup>，才能实现多极化。杜金“通过否定西方霸权的各种理论基础”来构建他的“多极世界理论”<sup>③</sup>，该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秩序设想上：一个是全球层次上的多极化方案；另一个是地区层次上的地区一体化设想，这是关于多极世界体系基本行为体单位层次的设想方案。杜金在地区层次上着重

---

① См.: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М.: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С.74.

② Там же. С.89.

③ Там же. С.96.

阐述了欧亚主义地区一体化，即独联体一体化方案。无论是在全球层次还是地区层次的整合过程中，杜金都将俄罗斯视为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一体化理论设想构成了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主要框架。

### （一）多极全球化的方案

杜金以所谓的“四极世界模式”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多极世界格局的设想方案，这四个“极”的每一地区分别是按照所处位置的子午线进行划分的。第一个地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大陆，该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大空间”和拉美地区“大空间”；第二个地区是欧洲—非洲地区。杜金认为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二重性。大西洋主义属性使欧洲内部存在追随美国的单极全球化力量，欧洲大西洋主义主要以积极追随美国、对欧盟有离心倾向的英国为代表；欧亚主义属性使欧洲具有了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主张加强“欧洲的联合”，重视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是欧洲的欧亚主义代表；第三个地区是亚太地区。在这一地区里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和日本。以往，杜金曾一直强调日本是亚太地区的最主要力量，但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杜金开始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最后一个地区是杜金认为最关键的地区，即欧亚主义者们所说的“俄罗斯—欧亚洲”。在该地区有几个“大空间”相互重叠，主要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大空间”，即独联体地区；此外，还有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伊斯兰大空间”和印度斯坦“大空间”。在阐述自己的多极世界秩序方案时，杜金着重强调了俄罗斯与本地区内其他“大空间”结盟的重要性，因为能否按大陆文明原则建立多极世界，这完全取决于“俄罗斯能否成功地与其南部强国建立战略集团”<sup>①</sup>。

杜金认为，按照“四极模式”建立的多极世界目前还仅是个设想，当前世界最大的现实威胁是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单极化的全球化，其他几个“极”中任何一“极”都无法单独阻止美国的单极化企图。因此，为了避免大西洋主义对全球的统治，实现真正的多极化，必须推动世界“新的两极化”。杜金所谓“新的两极化”是相对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两极化而言的，这是指

---

<sup>①</sup>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65.

在上述“四极世界”构想中，除了美国为首的地区外，位于欧亚大陆之上的其余三“极”联合起来构成与美国对立的力量整体，形成一个超级的“极”。按杜金的设想，若能实现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三个重要地区的联合，就构成了唯一有能力对抗美国大西洋主义的方案。这种美国大西洋主义与联合起来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对抗，构成了未来国际体系的“新的两极”。因此，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的关键步骤就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联合实现“新的两极”，围绕着欧亚大陆的联合问题，杜金提出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两个重要轴心，以此作为欧亚大陆联合的支柱。

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地区层次的一体化思想，是关于“四极世界模式”中每一“极”的地区一体化的方案设想。杜金着重阐述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方案，他认为该地区的整合对未来多极世界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为此，他提出了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方案——建设欧亚主义联盟。

## （二）欧亚联盟——欧亚主义帝国方案

欧亚主义联盟是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建设的直接目标，也是杜金多极世界理论的基础。杜金认为，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属性决定了俄罗斯必然把注意力转向整个后苏联空间。实现独联体一体化是欧亚洲地区各欧亚民族的使命。欧亚洲，即独联体地区，这是个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自成吉思汗帝国时代就被整合为一体，后来的沙皇俄国和苏联都是这个欧亚主义帝国的继承者。如今，苏联的解体是大西洋主义文明对欧亚主义文明的胜利，这对欧亚洲各族人民来说则是个灾难。为了避免被大西洋主义全球化吞噬，欧亚洲各族人民必须重新实现一种新形式的统一，俄罗斯则是这个一体化过程的天然领导。为此，俄罗斯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杜金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就是个帝国，作为成吉思汗欧亚主义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命中注定地理上就是位于“欧亚洲”这一区域，注定是欧亚主义大陆文明。新俄罗斯当前自我认同的“民族-国家”模式是“西方的陷阱”，这违背了俄罗斯的历史宿命。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必须要担负起欧亚洲，即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重任，而民族—国家的俄罗斯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

“历史和文明使命”<sup>①</sup>。所以，俄罗斯必须是一个帝国，为了建设这个帝国，必须实现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

杜金认为，美国 21 世纪对外政策的主要计划是“建立全球性的自由主义-民主帝国方案”<sup>②</sup>。目前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能力“在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中捍卫自己的主权”<sup>③</sup>。“民族-国家”的模式在当今国际现实中无法阻止单极全球化的实现，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主权。只有在“大空间”基础上联合组建的帝国才能成为单极化的替代者，未来的多极化世界的主体应该是帝国。杜金指出，在欧亚主义世界观基础上建立的未来统一战略空间，其规模最小也要能“让俄罗斯以欧亚联盟的新形式恢复战略潜力，重新成为‘帝国’”<sup>④</sup>。关于建立联盟的原则，杜金强调，欧亚主义联盟应该是通过“自愿方式”，由享有主权的后苏联国家“自由”建立的。这个未来的政治组织应该“考虑到每个组成部分的自治要求”。所以，他认为“邦联”或“国家联盟”的模式最适合<sup>⑤</sup>。

除了在独联体地区建立“欧亚联盟”，杜金的地区一体化还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这也是他对欧亚主义联盟的更高层次的设想。他主张，欧洲、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地区和亚太地区应团结起来，实现“欧亚主义大陆的一体化”，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单极化企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上，杜金把美国主导的欧洲军事和政治联盟视为“欧洲发展的大西洋主义倾向”。而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则被杜金看作是“欧亚主义在欧洲的实践”。他借用戴高乐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地缘政治设想，主张俄罗斯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将这视为欧洲的“真正的一体化”。由于俄罗斯包含了突厥人、蒙古人以及高加索各民族，因此，涵盖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欧洲一体化就使旧大陆“真正具有欧亚主义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欧亚主义等同于大

---

① Дугин А.Г.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я. М.: Яуза, 2004. С.365.

②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502.

③ Там же.

④ 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7. С.165.

⑤ Там же.

陆主义”<sup>①</sup>。

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建立欧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形式应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帝国，以此作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在这个“多极世界”中，每一“极”都是根据所谓的“大空间”原则建立的。其中，俄罗斯除了要在独联体地区进行帝国建设，还要主导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帝国之间的联合，这种多极世界结构才能阻止自由主义后现代的单极全球化。通过对杜金“多极世界”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被杜金称作“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多极世界理论”，实质上还是“新的两极”、“大陆集团思想”和“帝国欧亚主义”等以往他一直宣扬的思想，杜金依然在延续他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主张。

### 三、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来源

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主要由三部分综合而成：一是欧洲“新右派”与“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二是德国大陆集团地缘政治理论，三是俄罗斯本土民族主义思想。

#### （一）“新右派”与“保守主义革命”思想

杜金在大学时期经常参加以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著称的叶甫盖尼·戈洛文（Евгений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Головин）为核心的秘密小组活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由于戈洛文的思想来源与欧洲右翼传统主义者有联系<sup>②</sup>，因此，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最初是来源于欧洲的“新右派”思想。

“新右派”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政治哲学思潮。这一思潮产生不久就迅速传播到西欧其他一些大陆国家，该思潮属于当代欧洲保守主义范畴。从欧洲地缘政治学流派角度看，“新右派”地缘政治思想延续了战前德国大陆地缘政治思想传统，特别是继承了卡尔·豪斯浩弗（Karl

---

①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4. С.220.

② См.: Михаил Диунов. Русский кочевник //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ай 2008. С.18.

Haushofer) 的地缘政治思想。同时, 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的思想也是“新右派”重要的思想来源。

法国著名“新右派”思想家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 的思想的主要观点是: 将捍卫欧洲认同视为“最高的价值”, 伯努瓦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主张摆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 支持建立“统一的大欧洲”, 主张保存欧洲自己的文化, 继承地区民族传统, 还支持新俄罗斯重新“回归历史”, 赞同第三世界的国家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此外, 伯努瓦也主张建立多极世界, 为此, 他力主欧洲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和经济联盟。伯努瓦从“欧洲大陆共同命运”的思想基础出发, 发展出他的“欧洲联合思想”。他从历史文化上论证了传统的欧洲与现代世界中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的不同。他认为, 欧洲各民族有着共同印—欧种族血缘和文化起源, 它们与以唯物主义生存观、单一理性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机械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现代世界中, 美国是这个“西方”文明的最终代表, 而欧洲与“西方”不仅不同, 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对立。

在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形成的早期阶段, 他接受的主要就是伯努瓦的“新右派”思想。杜金从中汲取了“大欧洲”的主张, 并且与豪斯浩弗的欧亚大陆集团理论相结合, 形成了“欧亚大陆联合”的思想, 这是杜金“多极世界”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伯努瓦将大陆欧洲同盎格鲁—萨克逊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西方”相区别的观点也使杜金受到启发。杜金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大陆地缘政治学派和欧亚主义思想, 将反美主义等同于反西方主义, 提出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大陆文明与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海洋文明之间的对抗模式。

1993年杜金参与组建了俄罗斯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民族—布尔什维克党”(НБП), 杜金是该党的意识形态领袖。该党公开以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并希望以此作为俄罗斯未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又由于欧洲“新右派”的很多思想同样也来源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 所以杜金新欧亚主义的很多地缘政治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含有“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元素。其中, 德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思想对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 杜金发

表了《卡尔·施密特：给俄罗斯五个教训启示》<sup>①</sup>的文章，他根据施密特的理论思想，试图为正处混乱中俄罗斯社会寻找出路。杜金主要是借用施密特的“敌友政治论”和“大空间”等理论，对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地缘政治未来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敌友政治论”是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施密特强调，敌我关系是群体间的对立，敌友关系具有“公共性”，敌人是“公敌”，而非私人的“仇人”<sup>②</sup>。杜金对此解释道：“只有当民族形成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时，在与其他政治社会共同体相对立的情况下，民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存在”<sup>③</sup>。树立共同体的外部敌人，是确立自我认同的首要前提。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美国这个“公敌”作为欧亚主义大陆联盟团结的动力。杜金认为“反美主义是促进全体俄罗斯社会团结起来的可靠平台”<sup>④</sup>。因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都可以团结起来。

在施密特的地缘政治思想中，杜金最为推崇的就是“大空间”理论。施密特的“大空间”理论将国家的发展进程视为“最大限度获取领土空间”<sup>⑤</sup>，“大空间”是在具有“统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几个国家和民族的”<sup>⑥</sup>基础上形成的。在“大空间”内，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多样性在“大的地缘政治联盟”中可以得到和谐的体现。“大空间”是在形式灵活多样的联邦帝国类型的政治结构中建立的。施密特的“大空间”内部可以包含若干个和谐相处的帝国，也可以是一个帝国。根据施密特的观点，“大空间”应能保证内部各民族和国家意愿的自由表达，并能作为地区冲突、“规范战争”的稳定器和公正的仲裁者。施密特强调，“大空间”必须是陆地领土或大陆板块。如果遵循的一体化原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灵活地、有机地与人民意愿和精神相适应，并能将其文化的、地理的邻近国家和民族吸引到陆权集团中来，那么

---

① Карл Шмитт: пять уро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и// Дугин .А.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Арктогея, 1994. С.54-68.

②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③ Дугин .А.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Арктогея, 1994. С.56.

④ 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7. С.124.

⑤ Желтов В.В, Желтов М.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стория и теория. М.: Вузовский учебник, 2011. С.130.

⑥ Там же.

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地缘政治宏观实体——“大空间”。杜金用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分析今天的俄罗斯，发现苏联的解体可以引起自发的、有力的大陆东部欧亚主义集团的重建。因为这符合欧亚空间内有组织的、土著民族的利益，特别是重建类似联邦的帝国，可以使他们在“大空间”内获取因苏联解体而失去的国家认同的领土。也就是说，施米特的“大空间”原则完全可以指导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进程。

杜金在“大空间”理论上提出了欧亚主义“帝国”构想，即在欧亚主义文明空间内实现多民族和多宗教自治基础上的联合，建立类似邦联的帝国模式。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是杜金的“欧亚联盟”设想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杜金后来提出的“多极世界理论”的基础。杜金还声称，“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是第四政治理论整体结构的直观表达，也是多极化世界、反全球主义、反美主义和反美国全球霸权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可靠的平台。”<sup>①</sup>可见，施米特的“大空间”思想对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全面的。

## （二）卡尔·豪斯浩弗的“大陆集团理论”

杜金对未来“多极世界”方案的设想主要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缘政治思想家卡尔·豪斯浩弗（1869-1946年）。在豪斯浩弗的“泛地区思想”基础上，杜金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多极世界”中各个“极”的大致范围，并根据豪斯浩弗的“大陆集团思想”，为俄罗斯确定未来地缘政治盟友。

豪斯浩弗的“泛地区思想”理论设想，是建立“一种大区域生存空间，即在大陆规模上的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sup>②</sup>，也就是以当时世界各大陆上主要政治大国为核心建立的各自的势力范围、按主导大国的民族扩张思想为特征划定的地区。根据豪斯浩弗的观点，理想的世界应该是围绕3-4个各自的地区影响地带而联合起来的国际体系，每一个地带都是以本地区最强国家为核心建立的联合体。豪斯浩弗最初设想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泛美地区、以德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493.

②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国为核心的泛欧洲-非洲地区和以日本为核心的泛亚洲地区三个地带。后来豪斯浩弗又把以苏联为核心的泛俄罗斯地区也作为一个“泛地区”，这样世界就成了四个“泛地区”组成的国际体系。杜金的“四极模式”的多极世界构想，就是在豪斯浩弗“泛地区思想”的基础上，设想各地区在各自独立的地理空间内进行地区一体化，进而构成全球层次的多极格局。杜金将豪斯浩弗的“泛地区思想”理论与施密特的“大空间”理论相结合，在根据泛地区思想划分的每一子午线地带内再划分出若干个以文明为特征的“大空间”，比如泛欧洲-非洲地带内就包含了“在文化和文明方面彼此明显区别、但又不相互排斥的欧盟、阿拉伯、黑非洲三个‘大空间’”<sup>①</sup>。

豪斯浩弗的“大陆集团”理论，即通过建立欧亚大陆地区主要强国——德国、俄国和日本之间的联合，建立“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大陆集团”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的启发。麦金德强调欧亚大陆中央核心区的重要地缘政治作用，并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来评估俄国的国际地位和历史作用。豪斯浩弗认为，大英帝国全球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欧亚大陆“建立强大的大陆集团”<sup>②</sup>。他赞同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年）的论断：“当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联合起来的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政治末日就降临了”<sup>③</sup>。杜金在自己的“多极世界”地缘战略构想中提出了大陆文明集团联合的主张，把大陆集团理论从地缘政治层面发展到地缘文明层面。杜金用帝国，即同一文明的大空间形成的集团作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以欧亚主义的大陆属性作为选择战略盟友的最主要标准，通过欧亚大陆地区各极之间的联合实现欧亚主义集团的联合。杜金把建立“欧亚主义大陆集团”作为建立多极世界极其重要的战略步骤，就是为了联合世界主要的反单极化力量，以便获取抗衡美国单极霸权的地缘战略实力，这与豪斯浩弗联合大陆力量对抗海权的英美势力的“大陆集团”理论如出一辙。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64.

② Хаусхоффер К.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й блок// Хаусхоффер К. О геополитике. М.:2001. С.373.

③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 :Арктогея, 1999. С.835.

### （三）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思想

杜金的早期地缘政治思想来源于欧洲的“新右派”和德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但后来杜金逐渐将这些外来的思想与俄罗斯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杜金将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都看作为俄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sup>①</sup>。随着欧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社会的兴起，特别是在1998年，杜金脱离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就正式将自己的思想体系以“新欧亚主义”命名。因此，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和早期欧亚主义者——这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们的思想就成了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杜金从古典欧亚主义者那里继承了“欧亚洲”（Евразия）、“发展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和“文明路径”（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等一些重要概念和原则。这些是П.Н·萨维茨基和Н.С·特鲁别茨科伊等古典欧亚主义经典作家们思想学说中的核心概念和方法。П.Н·萨维茨基德发展了“欧亚洲”概念，他认为，大体上与俄罗斯帝国领土重合的“俄罗斯-欧亚洲”（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这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特殊的欧亚主义文化世界，是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立的历史—文化实体，是以俄罗斯人为核心的欧亚民族的“发展地”。萨维茨基则认为，在广阔有序的共同体中，“生物体”与外部地理条件紧密联系。共同体内的“生物体”在彼此适应的同时，也积极地适应着周围环境。“发展地”可以理解为：社会历史环境和它的地理环境应该使人们“融入统一的整体，融入地理地貌的特性之中”<sup>②</sup>。萨维茨基还赋予“欧亚洲”政治和文化上的含义。他不是将俄罗斯看作“民族国家”，而是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明”<sup>③</sup>。杜金在萨维茨基关于“俄罗斯-欧亚洲”是俄罗斯独特的欧亚主义文化“发展地”<sup>④</sup>的地缘文明思想基础上，结合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独联体空间一体化的“帝国”模式。他将独联体地区看作是建立一个有独特文明的未来“帝国”的基础。今

---

① См: Дугин .А.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С.20-21.

② Савицкий П.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 Савицкий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збранное. М.:РОССПЭН, 2010. С.267.

③ Желтов В.В, Желтов М.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история и теория. С.287.

④ Савицкий П.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 С.268.

天的独联体既是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地”，也是俄罗斯重建帝国的“大空间”。这样，杜金将古典欧亚主义的“发展地”思想与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进行了对接。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遵循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路径”原则，是一种“地缘文明”学说。在这方面，杜金更多地借用另一位古典欧亚主义者H.C·特鲁别茨科伊的思想观点。特鲁别茨科伊指出，“欧洲文化并不是全人类的文化，它只是某一民族集团的历史产物”<sup>①</sup>。他否定和批判了西方世界主义者关于欧洲文明具有普世性的观点，这为杜金“多极化世界理论”中的反西方文明全球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古典欧亚主义者的“西方反对人类”文明观基础上，杜金又补充了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法国传统主义者格农（René Jean-Marie-Joseph Guénon）、欧洲“新右派”，以及西方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文明观。与古典欧亚主义所处的时代不同，杜金的地缘政治文明思想是在冷战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面对苏联解体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现实，他仍然梦想恢复昔日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杜金的地缘文明观中依然保留着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的思想，只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转变为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对立。杜金在强调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后苏联空间是欧亚主义特殊文明的同时，又结合豪斯浩弗的“大陆集团”思想，将欧亚主义联盟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使“欧亚主义等同于大陆主义”<sup>②</sup>。这样，在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中形成了“西方-东方”、“海权-陆权”、“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单极化-多极化”等概念，这些对立的观念体现了地缘政治两分法的逻辑特点。

除了古典欧亚主义者外，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文明路径”原则还体现了“欧亚主义先驱”——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家Н.Я·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文化历史类型”学说的特点，

---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 М.: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5. С.59.

②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4. С.220.

即每一历史文化类型都是区域性的，各文化类型之间不能相互转移，不存在“全人类文明”。丹尼列夫斯基明确提出“俄罗斯不属于欧洲”<sup>①</sup>，并认为欧洲对俄国充满敌意和偏见，“同欧洲进行斗争不可避免”<sup>②</sup>。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文化类型学说开创了以地缘文明模式研究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方法。杜金通过古典欧亚主义者间接继承了丹尼列夫斯基学说中很多原则，其中，作为杜金“多极世界理论”基础的“欧亚联盟”方案就与丹尼列夫斯基关于建立“全斯拉夫联盟”的一些原则非常符合。比如，丹尼列夫斯基在论述建立“全斯拉夫联盟”的目的时指出，为了避免产生单一文化历史类型统治世界的悲剧，就必须制止“欧洲的世界统治权”，这只能依靠维持国际政治的力量均衡来实现，因此，必须建立“全斯拉夫联盟”。因为，“只有联合的斯拉夫世界才能与联合的欧洲进行斗争”<sup>③</sup>，这个联盟是反对欧洲的世界统治权的“唯一支柱”和保持世界力量平衡的“唯一保证”<sup>④</sup>。同样，杜金在解释“欧亚主义联盟”设想目的时称，因为冷战后美国要建立单极霸权，但当前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能力“在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中捍卫自己的主权”<sup>⑤</sup>。在失衡的国际结构中，只有联合具有潜力的几个帝国才能抗衡美国，从而阻止单极世界的建立。因此杜金认为，为了建立多极世界，俄罗斯应当在后苏联空间恢复自己的影响，“将与我们文化相近的国家和民族（首先是独联体国家）整合到我们周围”<sup>⑥</sup>。

两个相距一百多年的联盟设想不仅有着相似的战略目的，而且组建原则也都大同小异：两个联盟都是以俄罗斯为主导，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对联盟中的其他成员表示遵循某种平等和自由原则。在“全斯拉夫联盟”设想中，丹尼列夫斯基非常注重各斯拉夫民族成员的政治独立地位，主张“为了能让属于独特的历史文化类型的文明获得发展，必须让属于该类型的人民享有政

---

①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С.59.

② Там же. С.435.

③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М.: Книга, 1991. С.424.

④ Там же.

⑤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502.

⑥ Там же. С.510.

治上的独立”<sup>①</sup>，而不应被并入俄罗斯。因为一种文明“只有当构成它的各民族享有独立，而不是被兼并到一个政治整体组建联邦时，该文明才会达到充实圆满、多样和丰富”<sup>②</sup>。在联盟内，各成员的关系应该是“公平和健康的”，联盟负责确保成员的自由。杜金在描述“欧亚联盟”方案时，他认为，欧亚联盟方案还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实验阶段，为了避免苏联时期的覆辙，关键在于“建立像欧盟那样的“民主的帝国”，同时注意保留地缘政治主体性和珍惜民族的独特性，就像拜占庭或者成吉思汗帝国那样”<sup>③</sup>。由享有主权的后苏联国家通过“自愿方式”建立“邦联”或“国家联盟”，并且“考虑到每个组成部分的自治要求”<sup>④</sup>。显然，杜金的欧亚主义联盟设想与“欧亚主义先驱”之称的丹尼列夫斯基的“全斯拉夫联盟”思想存在着某种原则上的借鉴与传承。

在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组成中，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新右派”和“保守主义革命”思想，还是欧亚主义等俄罗斯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思想都具有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杜金出于反西方自由主义的目的，综合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阵营的反西方思想，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

## 四、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的特点和性质

### （一）激进的反西方的地缘意识形态

在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成为地缘政治分裂的决定性因素。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二战后，美国与苏联分别按各自的意识形态划分了全球地缘政治空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体系。冷战结束后，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彻底瓦解，苏联自身也解体了。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杜金认为，

---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91.

② Там же.

③ 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Пб.:Амфора, 2007. С.65.

④ Там же. С.165.

需要树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新时期的“俄罗斯思想”，以取代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吸取了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各种意识形态的优点，能成为重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帝国的“精神支柱”。杜金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他的新欧亚主义思想。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来源十分庞杂，其中既有“新右派”的思想，也有“新左派”的观点。杜金按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宗旨将这些来自不同思想阵营的观点进行组合，体现出鲜明的思想特性——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为坚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在地缘政治上体现为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单极全球化，主张建立“多极世界”秩序。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最初是从“新右派”等西方反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杜金将自己的思想称为“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作为当时俄罗斯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保守主义革命”党的指导思想。杜金还积极利用俄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其“保守主义革命”思想进行“俄罗斯化”，导致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当年德国法西斯的一些思想家十分接近，而杜金也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新法西斯分子”<sup>①</sup>。20世纪90年代末期，杜金离开“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后不久，杜金又将自己的思想更名为“新欧亚主义”，他不断地将俄罗斯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套既包含有西方反自由主义思想元素又有俄罗斯本土民族主义元素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对杜金的影响主要来自古典欧亚主义和丹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将欧洲-西方视为俄罗斯应与之进行斗争和防范的对象。

古典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者将西方等同于欧洲，以及俄罗斯不属于欧洲的观点，Н·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欧洲的世界主义者所说的“文明”，指的就是“欧洲的罗曼语系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sup>②</sup>。

---

① Андреас Умланд/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усском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е” О значении взле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угина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ие. 2009. №2.

②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 М.: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5. С.57.

正如俄国哲学家B.B·津科夫斯基在评价古典欧亚主义时指出：“欧亚主义坚决将西方与罗曼—日耳曼文化等量齐观，忘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sup>①</sup>。然而，在杜金的新欧亚主义那里，“西方”已不是古典欧亚主义者所指的“罗曼—日耳曼文明”，而是采用了“保守主义革命”和“新右派”思想家们的“西方世界”的定义，将“西方”指代为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大西洋主义”、“世界主义”、“全球自由主义”，等。<sup>②</sup>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俄罗斯开始的自由主义激进改革的反应，旨在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寻找摆脱危机的新的意识形态。杜金认为，“政治家应以地缘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sup>③</sup>，因此，他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为俄罗斯制定国家意识形态。杜金“从20世纪90年代初‘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思想发展到今天‘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始终执着地希望这套思想体系能成为当代俄罗斯的‘民族思想’”<sup>④</sup>。

杜金用地缘政治来制定和解释意识形态。他综合麦金德、施米特等地缘政治思想家关于“海权—陆权”两种文明对立的思想，区分大陆—海洋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杜金认为，“对于西方来说，意识形态只是地缘政治‘二分法’的一种表现而已”<sup>⑤</sup>。于是，杜金将西方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海洋—大陆”对立，演变为在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欧亚主义”之间的对立。因此，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既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杜金新欧亚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体现为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在地缘政治上则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陆权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海权力量之间的对抗，即所谓的“大陆地缘政治学”。作为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的新发展的“多极化”思想，正是“‘大陆地缘政治’在新环境下的延续，是在新水平上和按新比例对大西洋主义全球化的进攻”<sup>⑥</sup>，多极化则是“大陆地缘

---

① [俄]B.B·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38页。

②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Арготеря-Центр, 2002. С.96.

③ Там же. С.13.

④ 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

⑤ Дугин А.Г.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13.

⑥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16.

政治学”在全球化现实条件下的“缩减版”<sup>①</sup>。可见，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从“大陆地缘政治”到“后现代地缘政治”，再到今天的所谓“多极世界理论”，名称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换，但实质基本未变，依然是当初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反西方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

## （二）以实力确定盟友的实用主义特点

在杜金关于多极世界的一体化联合方案中，无论是在大陆集团的联合层次，还是在作为“帝国基础”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层次上，始终都能体现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反西方单极全球化的“联合阵线”思想。我们从杜金“欧亚联盟”思想的来源中，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实用主义特点。比如，在丹尼列夫斯基建立“全斯拉夫联邦”的构想中，他将欧洲树立为俄罗斯的敌人，因为这样可以有力地促进全斯拉夫联邦的建立，从而增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与欧洲打交道的能力。他写道，“同西方的斗争是医治我们俄罗斯文化弊病、发展全斯拉夫情谊、消除不同斯拉夫民族之间纠纷的唯一有效方式”<sup>②</sup>。丹尼列夫斯基这种联合起来对付强敌，并用树立外部“共同敌人”以便增强联盟内部凝聚力的方法，被杜金借鉴到欧亚联盟的帝国方案之中。杜金一直宣传，在建设帝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个“共同敌人”的原则。他反对大西洋主义，反对美国战略控制，拒绝自由市场价值，认为这就是“建立牢固的政治战略联盟，建设未来帝国轴心框架的共同的文明基础和共同的动力”<sup>③</sup>。“为了对抗敌人，必须紧密地亲近朋友，对我们之间的各种摩擦要视而不见”<sup>④</sup>。杜金地缘政治思想关于树立明确的敌人、建立“联合阵线”对抗之的主张，是施米特“敌友政治论”的体现，其中反映着实用主义的逻辑。

杜金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的设想也是根据国际政治现实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在杜金早期的地缘政治思想中，杜金一直坚持“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一体化模式。杜金将“莫斯科-柏林”作为欧亚新帝国的西部轴心支柱，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07.

② Там же.433

③ Дугин А.Г.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я. М.:Яуза, 2004. С.370.

④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513.

东部则是“莫斯科-东京”轴心<sup>①</sup>。但在2012年出版的《多极世界理论》一书中，却将“莫斯科-柏林”轴心改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并提出了“欧亚主义大东欧”的地区方案，以此作为未来俄罗斯帝国的友好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斯拉夫民族圈”和“东正教宗教圈”的国家，以及处于两者之外的匈牙利。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亚太地区，杜金出于“共同敌人”的原则，主张俄罗斯应该寻求与那些有反对大西洋主义历史传统的“经济技术大国建立战略联盟”<sup>②</sup>。因此，像日本这样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由于拥有经济技术实力，也被杜金视为潜在的“盟友”。日本曾是沙俄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战以来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存有争议，而且战后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但杜金却将日本视为俄国在远东的“最佳伙伴”<sup>③</sup>。这一方面是受豪斯浩弗“大陆集团理论”重视日本作用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俄罗斯经济极为重要的科技实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曾广泛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日本可能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sup>④</sup>。

最能体现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的实用主义和理论上前后“矛盾”的例子是对待中国的态度。杜金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属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属于太平洋地区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它又从未成为海权国家，相反，总是定位于大陆模式。中国长期以半殖民地方式被纳入西方大西洋主义阵营，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的时间内奉行欧亚主义的亲俄罗斯政策，但便终止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加入到大西洋主义阵营之中。因此，杜金在20世纪90年代将中国视为“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sup>⑤</sup>。如今，杜金开始逐渐重视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作用，特别是对抗美国的作用。从维护俄罗斯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减少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与远东领土以及中亚各国的“人口扩张”威胁，杜金继续主张鼓励中国向南

---

① См : Дугин А.Г.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я. С.374-394.

② Дугин А.Г. (под ред.)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2. С.229.

③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307

④ 国玉奇、丘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⑤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С.362.

方的亚太地区发展。认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比重越大，多极化结构就越巩固”<sup>①</sup>，因为该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军事部署地区，中国向该地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将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从而将美国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赶出去。杜金认为，这具有“全球意义”。最近几年杜金宣称，为了成功建设欧亚主义联盟，俄罗斯必须与欧亚主义的欧洲和欧亚主义的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甚至提出建立“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倡议<sup>②</sup>。

如今，在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中，中国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抗衡美国单极霸权的作用，这与杜金以往的观点相差甚远。对中国的态度变化如此大，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在 21 世纪后迅速崛起，中国已经具备多极世界体系中重要的一“极”的实力。中日两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使以联合一切反美力量为宗旨的杜金越来越重视中国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作用。杜金地缘政治思想中的观点时常会变化，这也体现了其思想的特点——为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合，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结盟对象的实用主义特点。今天，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不断深化的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业已开始对接合作，中俄两国的合作成了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杜金将“莫斯科-北京”轴心作为他建立“欧亚大陆集团”的基础，也是其地缘政治思想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其地缘政治思想的这种实用主义特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 （三）最终目标是夺取世界霸权

杜金将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定位为帝国模式，理由是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个帝国，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只是一个过渡。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能真正拥有主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试图建立单极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冷战后的时代的要求，因为该模式不能有效地维护主权。为了阻止当今最强大的帝国——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必须以一种新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形式就是杜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305

② См: Дугин А.Г. Путин против Путина.М.: Язма пресс, 2012. С.226.

金所称的“帝国”。杜金的帝国的范围是以某一地区（大空间）内的主要文明为标准进行界定的，每个“大空间”之间的关系遵循“不干涉原则”，“大空间”的内部关系则以尊重每个民族及其文化特性为基础，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自治性。杜金将“大空间”特点的概括为：“在文化上表现为文明的形式，而在政治上表现为帝国的形式”<sup>①</sup>。

杜金将古老的前现代的“帝国”概念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概念结合起来，他的“欧亚主义联盟”就设想采用所谓“民主帝国”的形式。这貌似与以往历史上的沙俄帝国和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不同，因为这具有当今时代流行的“民主”色彩，但杜金所说的“民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式的“民主”，它更接近于苏尔科夫提出的“主权民主”的含义。杜金在解释他所说的“民主”时称：“欧洲人、美国人和欧亚人对民主的理解各不相同”，根据民主原则，欧亚联盟是“各民族自愿地加入到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法律标准和统一社会经济模式的统一战略联合体中”，“在民主的欧亚主义联盟中，各民族拥有政治主体的权力”<sup>②</sup>。显然，杜金所指的“民主”主要是指帝国中各成员主体之间的政治相对独立和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杜金帝国模式的欧亚主义方案也是一种“地区一体化”，他之所以主张赋予帝国中各民族政治主体地位，就是为了补偿这种“地区一体化”的代价，即在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地区实现高度一体化，采用让其他民族主体获得一定自治权的方式，以此部分地满足现实欧亚一体化过程中其他成员国对主权的要求。

无论杜金如何描述欧亚主义帝国的“民主性”，都掩盖不了该设想中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源自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例如，丹尼列夫斯基在强调斯拉夫各民族以“政治独立状态”自愿地加入“全斯拉夫联邦”的时，其前提就是将俄罗斯设定为这个未来联邦的领导。他认为，该联邦应当“处在俄罗斯政治和霸权领导之下”<sup>③</sup>。丹尼列夫斯基作为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和欧亚主义思想先驱，他的大俄罗斯优先的民族主义思

---

①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49.

② Дугин А.Г.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С.147.

③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М.: Книга, 1991. С.385.

想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杜金。在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中，类似丹尼列夫斯基这种大俄罗斯优先的民族主义思想非常明显。杜金在论述俄罗斯在未来“多极世界”中的地位时，多次强调俄罗斯的优先地位和特殊作用。杜金认为，为实现多极世界，必须建立“世界规模的帝国集团”<sup>①</sup>，俄罗斯因其能力和历史传统，必然成为这个多极帝国集团中的“协调者”。对那些依靠多极化才能维护主权的国家来说，俄罗斯是它们的唯一机会和指望。无论在未来的俄罗斯帝国，还是在欧亚大陆帝国集团中，俄罗斯人都应处于“联邦帝国的特权地位”<sup>②</sup>和“欧亚帝国空间的战略中心的位置”<sup>③</sup>。杜金指出，所有希望阻止美国单极全球化的人们必须牢记一个公理：“世界秩序的命运现在只有通过俄罗斯来决定。俄罗斯在建设多极世界过程中接受天然领导权是多极化实现的必要条件”<sup>④</sup>。此外，杜金还描绘了这个帝国的未来：这个帝国应该“在战略上和空间上超越苏联”，它应该是“欧亚主义大陆的帝国”，未来应该成为“世界帝国”，并认为“俄罗斯人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战斗并未结束”<sup>⑤</sup>。这表明杜金地缘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要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球化，他主张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双层欧亚主义帝国结构的目的，最终是要彻底击败大西洋主义敌人，实现“欧亚主义帝国联盟”的最后胜利，也就是俄罗斯帝国的胜利。由此可见，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以实现俄罗斯“世界帝国”梦想为目标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若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帝国主义霸权扩张，必然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思想，遭到外界广泛质疑和批评。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试图恢复帝国的尝试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而只能使它失去很多”。当前俄罗斯已认识到，单凭一国之力不能实现现代化。在全球化时代，必须积极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源，俄罗斯应该和他们建立现代化联盟，因此，“西

---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518.

② Дугин А.Г.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я. М.: Яуза, 2004. С.409.

③ Там же. С.421.

④ Дугин А.Г.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С.273.

⑤ Там же. С.368.

方将重新成为俄罗斯的盟友”<sup>①</sup>。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埃娃·汤普逊认为，俄罗斯（包括苏联）帝国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俄国过多地依靠士兵和大炮，而“没有成功地用思想代替大炮”，“浅薄地坚持大俄罗斯的优越地位”<sup>②</sup>。俄国用沙文主义推行俄国事务的方式，激起了被强迫加入帝国的民族的反感。杜金在构建其“欧亚主义联盟”帝国方案时，虽然声称已吸取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显然并未真正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而是仍然在延续着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家们都坚持俄罗斯与西方基于不同文化的发展道路“特殊论”，而俄国特殊论“孕育着孤立主义的种子”<sup>③</sup>。杜金作为反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继承人，其新欧亚主义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孤立主义的性质。正如俄国学者谢·瓦·戈尔都诺夫评价的那样，当前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试图逃避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民主化，这种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幻想。<sup>④</sup>

## 结 语

通过以上对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内容和特点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虽然声称是“后现代地缘政治”，但实质依然是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该思想具有浓厚的地缘意识形态特点。杜金在意识形态上用新欧亚主义思想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对抗，在地缘政治上则用欧亚主义多极全球化对抗自由主义单极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了构建复兴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杜金综合了俄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西方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各种思想，他把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古典欧亚主义者的“欧亚洲”、“发展地”

---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Post-imperium: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316.

②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9 页。

③ 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Кортунов С.В.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или химера?// «Золотой Лев». № 77-78. [http://www.zlev.ru/77\\_130.htm](http://www.zlev.ru/77_130.htm)

概念和西方思想家施米特的“大空间”等各种理论概念都糅合到一起，构建出在后苏联空间进行一体化的“欧亚主义联盟”方案，形成了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观点。

第二，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将“帝国模式”作为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未来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主体，这是对现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否定。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以反对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全球化为宗旨，主张以俄罗斯为核心实现两个层次的欧亚主义一体化：一个是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另一个是整个欧亚大陆范围的欧亚主义一体化。在杜金的“多极世界”中，主要国际行为体是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未来的“俄罗斯欧亚主义帝国”应以欧亚主义文明为基础确定其范围，也就是在独联体这个“欧亚主义特殊文化空间”范围内建立“帝国”。杜金将“欧亚联盟”，即未来的欧亚帝国，作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与世界上其他几个主要文明形成的帝国，共同构成一个力量均衡而又相互独立的世界多极秩序。杜金的“多极世界理论”不仅否定了美国的单极世界秩序，也否定了现行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的合法性。

第三，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思想是当代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西方反自由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其宗旨是要恢复俄罗斯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因此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一思想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浓厚的反西方主义色彩。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杜金新欧亚主义具有强烈的帝国扩张倾向，作为极端的反西方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杜金新欧亚主义又脱离了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现实，走向了俄罗斯孤立主义的老路，这既反映了杜金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同时也意味着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不可能成为当代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

**【Abstract】** Russia's neo-Eurasianism originates from divergent schools of thought. Alexander Dugin,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thinker, has been constantly developing his unique Neo-Eurasianism by obtaining anti-liberal elements from both western politics and Russian traditions. The essence of

neo-Eurasianism is kind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Dugin attaches “post-modernism” to his neo-Eurasianism. Dugin’s so-called “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 accords with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of his neo-Eurasianism., emphasizing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ntinental civilization and maritime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is, Dugin proposes his concept regarding the future new global order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empire model is Dugin’s orientation for Russia’s self-identity and also the basis of his vision of “Eurasian Union” and 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 Essentially, Dugin’s neo-Eurasianism geopolitical thought is a sort of great-Russian nationalism which aims to seek world hegemony.

**【Key Words】** Neo-Eurasianism, 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 Empire model, Dugin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базируется н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теориях и идеологиях. Идеолог нео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своего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а постоянно черп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ему антилибераль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из запад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ыслей и русског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В сущности, дугинское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тождест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ку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мысль. В 21 веке он придал окраску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воему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у,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угин выдвинул «Теорию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как н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вое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продолжила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Суши», которую Дугин выдвинул давно, и подчеркнула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и «Суши» и «Моря». «Имперская модель»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линией в дугин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По мнению Дугина, «Имперская модель» — это основа и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дл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мперская модель, Дугин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欧亚文明·文化·法律

欧亚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断裂带”  
研究——兼论“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

潘光\*\*

**【内容提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着连接地带或“断裂带”。欧亚陆上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个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断裂带。各种文明在断裂带碰撞，引起了一些摩擦和纷争，但从千百年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断裂带更是文明交汇、融合的地带。各种文明、民族、宗教，通过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相处而逐渐融合，形成了当今欧亚一系列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断裂带及冷战后沿这一断裂带而起的一些冲突，正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不过，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尽管受到文明因素，特别是宗教、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但暴力冲突往往只是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所为，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大众。而且这类冲突大都源于外部的武力干涉和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因此，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虽然“文明冲突论”存在漏洞和谬误，却也指出了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会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提醒我们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这就是“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所在。

\* 本项研究得到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法学高原学科（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方向）的支持和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支持计划的资助。

\*\* 潘光，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

**【关键词】** 欧亚大陆 丝绸之路 文明断裂带 “文明冲突论”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6-0091(18)

两千多年来,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沿线逐渐形成了各种文明之间的断裂带,一些冲突和纷争由此而起。然而,文明断裂带往往也是文明融合带,居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间既有碰撞,又有着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相处而逐渐融合,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和利益共同体。本文以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个地区为例来阐述这些文明交汇/融合带的形成和演进,同时对“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加以评析,说明不同文明、民族、宗教以对话、包容、互鉴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为新丝绸之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 欧亚丝绸之路沿线“文明断裂带”之一: 中亚<sup>①</sup>

中亚地区包括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有的学者也将中国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一部分、阿富汗、克什米尔的北部包括在内,统称为“欧亚大陆腹地”。

在古代,这片地区是游牧民族的栖居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游牧民族文化区与其东部、南部的中国、印度、伊朗(波斯)三大农业文化区发生交流和碰撞。在古代,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突厥、蒙古等,它们不时南下进入农业文化区,与属于农业文化区的国家和民族既冲突又交融。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地区的突厥语系和波斯语系诸民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形成了穆斯林文化圈,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混杂其中。这一伊斯兰突厥(波斯)文化圈与其周围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区,汉儒文化区、蒙藏佛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之间形成了断层线,但界线不像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那

---

<sup>①</sup> 参见余建华、姚勤华、潘光、邓新裕:“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冲突热点带剖析”,《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5期,第58-65页。这是以潘光为组长的课题组当时所写研究报告的公开版,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引用了该报告的一些内容,并根据20年来的形势变化对原文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调整和补充,随后两个部分亦同。

样清晰。许多世纪以来，不同民族、宗教、文化沿着这一断层线互相交融和碰撞，逐步形成了今日中亚地区各个多民族国家，而文化/文明断层也在交流互通中逐渐淡化。据各国官方统计，今日哈萨克斯坦国内就有 140 余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有 130 多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也有 80 个民族。经历了 70 多年的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宗教民众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如哈萨克斯坦有 23.7% 的俄罗斯族居民，俄哈通婚的家庭比比皆是。据作者在哈萨克斯坦实地考察，这类家庭的子女们既可去东正教堂，也可去清真寺，并无什么宗教禁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亚大陆出现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浪潮，企图“统一”所有属于突厥语系的民族和国家。这股潮流扩展到了中亚地区，也对中国产生影响。如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新疆短暂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泛突厥主义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中亚、高加索出现了多个突厥语系的独立国家后，泛突厥主义暗浪再次汹涌。虽然泛突厥主义组织和政党在土耳其十分活跃，但突厥语系的中亚独立国家对这些跨国活动的政治色彩十分警惕，强调共同语源只是一种文化联系，不应过度政治化。与泛突厥主义相呼应的是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伊斯兰世界“统一”，也对中亚产生了影响。其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伊斯兰法治理社会和国家。塔利班曾在阿富汗尝试推行这种体制，结果以失败告终。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又挑动叙利亚内战，激起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使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运动再掀高潮。其矛头首先指向美国和西方列强，同时向全球扩展，其中一部分力量更走向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导致了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崛起。在中亚，出现了“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东突”）、“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迁移‘圣战’组织”（伊杰拉特）、“哈里发斗士”等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它们鼓吹暴力，挑动冲突、甚至远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加“圣战”，滥杀无辜的行径远远超出了不同民族、宗教、文明的差异，而是在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

目前，中亚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团结起来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有

两个新发展值得一提：2001 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的稳步发展以及上合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中亚地区日益深入人心；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获得了中亚各国的积极支持，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正在稳步推进。这些新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地区各民族、宗教、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合作，使中亚文明断裂带的负面作用受到有力遏制。

## 欧亚丝绸之路沿线“文明断裂带”之二：高加索

高加索文化断层基本上位于内高加索山脉南北两侧，南北均有文化断裂层。北部文化断裂层在高加索山区与俄罗斯的平原地区之间；而南部文化断层主要在内高加索与外高加索之间，在外高加索内也有文化断层。在内高加索的整个山区居住着许多穆斯林山地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等等。这些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后代，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而高加索山区以北的平原地带是斯拉夫俄罗斯人的居住地，照例都信奉东正教，与高加索山地文化区截然不同。北部断层线沿着高加索山脉的北麓把两种文化分开。在内高加索以南的外高加索西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形成了另一文化区域。这里自古以来受基督教文化浸润，格鲁吉亚人大多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则大多信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与北方的高加索穆斯林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沿着格鲁吉亚北部边界构成了南部断层。但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却是穆斯林文化区，阿塞拜疆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属突厥语族，文化渊源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迥异。因此，南部断层线又折向南方，从格、亚两国同阿塞拜疆的边界中间通过。不过，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则是亚美尼亚人居住的一块飞地。与这一文化区相邻的土耳其和伊朗是另一穆斯林文化地区。

高加索文化断层两侧的不同民族和宗教曾发生持久的冲突。18 世纪沙俄南下占领高加索时，遭到当地山地穆斯林民族的抗击，爆发了一连串的抗

俄斗争。特别是在车臣等地区，先后出现了曼苏尔（Sheikh Mansur）领导的武装反抗和穆里德运动，它们都以伊斯兰圣战为号召，抗击沙俄的统治。后来，又爆发了夏米尔教长（Imam Shamil）率领的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持续 25 年之久。沙俄在长期内不能平息高加索山区的反抗，穆斯林山地人的反抗延续至二十世纪初才结束。在沙俄分别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在高加索地区进行战争时，那些穆斯林山地居民及阿塞拜疆都支持土耳其或波斯，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则站在沙俄一边。

到苏联时期，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成为加盟共和国，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成为苏维埃俄罗斯联邦内的独立行政主体（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等）。总体来看，在 70 多年的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宗教的民众能够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不过，政府的一些错误政策也导致了严重后果。如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将数十万车臣百姓强行迁往中亚，虽在赫鲁晓夫时期他们又被允许返回高加索故地，但从此埋下了冲突的隐患。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独立，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继续保持俄罗斯联邦内的独立行政主体地位，其中车臣自行宣布独立，由此导致了长达十多年的车臣战争，最终俄罗斯重新控制车臣。同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爆发战争，亚美尼亚控制了原属阿塞拜疆但居民大多为亚美尼亚人的纳卡地区。进入 21 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继续推动北约东扩，极力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积极插手高加索地区，导致了 2008 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结果原属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宣告“独立”。2013-2014 年乌克兰政局突变和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又在高加索地区的西侧增添了一个新的动乱因素。

目前，影响高加索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历史积怨，外部染指和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固然，不同民族、宗教的差异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高加索问题绝非“文明的冲突”。例如，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就同属一个宗教文明圈，它们之间的冲突显然与美国、北约极力向高加索地区渗透、扩张密切相关。车臣战争和中东剧变的交错，导致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该地区泛滥，但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

人民大众。最近到过高加索地区的人们看到，那里各民族、宗教、人民之间跨越边界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不同国家、民族、宗教的人们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主要是跨国打工、从事贸易、观光旅游和探亲访友；虽然各国官方语言不同，但大家仍能用俄语进行沟通；人们依然维持着苏联时期形成的友谊和亲情。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高加索地区既是文明断裂带也是文明融合带的双重特质。

### 欧亚丝绸之路沿线“文明断裂带”之三：巴尔干

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文化断层上。这一断层线由北向南纵贯欧洲大陆，标志着不同宗教或民族的分野。它的北端起于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左侧依次是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乌克兰一小片领土、匈牙利，以及更往西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右侧一侧顺次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绝大部分、罗马尼亚，以及更东面的摩尔多瓦。简而言之，断层西边国家的居民绝大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东边国的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层面。除了宗教因素之外，斯拉夫、日耳曼、拉丁三大民族文化体系也在这条断层两侧相互碰撞和交融。

这条断层的南段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沿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以克塞边界中分逶迤向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一侧，笃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在另一侧。接着，它向南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入波黑后，这条线的走向变得不那么清晰，呈犬牙交错状，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和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混处杂居，情况错综复杂。再往南，这条断层以黑山共和国同阿尔巴尼亚边境为界，又折入塞尔维亚，顺着塞境西南大部分为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科索沃的界线向南，经过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共和国的边界。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另一半是文化背景迥异的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都信奉东正教。在这之后，断裂层分成东、西两线前进。西线沿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向前，直至地中海。两侧

分别为穆斯林占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东线循希腊与马其顿，以及保加利亚这几国的边界推进，再折向南穿过希腊与土耳其边界直至爱琴海。在这断层的两侧，一边是单一种族的希腊人，另一边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两边虽然都信奉东正教，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民族的差异在发挥着作用。再往南，一边是东正教的希腊，另一边是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双方冲突已历时几个世纪。

自中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相碰撞、融合的地区。奥斯曼帝国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并向中欧腹地推进，但最终为欧洲各基督教强国的合力抗击所挫败。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波什尼亚克等民族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也受到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自认为已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其广阔版图内的宗教、民族、领土争端纷纷突现，同时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被马克思称为“东方问题”——“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sup>①</sup>，使巴尔干地区成为民族宗教冲突集中的欧洲“火药桶”。正是这个“火药桶”的爆炸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一个接一个瓦解或崩溃，欧亚非“三叶草”<sup>②</sup>完全改观。

一战后巴尔干地图重新划分，出现了南斯拉夫等一系列新国家。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成长，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成为最为西化的伊斯兰国家，与欧洲联系更加紧密。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占领巴尔干地区，残酷镇压各国的抵抗运动，极力挑动各民族、教派之间的仇杀。在这危难时刻，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与德、意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西方盟国和苏联红军的援助下，终于取得了反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利-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海因里希·邦廷（Heinrich Bünting）是德国一名新教牧师、神学家和制图专家，在其写于1581年的经典著作《穿越圣经》（Travel book through Holy Scripture）中，他称重要的世界是由欧、亚、非三洲组成的，每个大洲像三叶草的一片叶子，三片叶子在耶路撒冷会合。

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二战后欧洲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巴尔干地区也难以幸免。在两极格局意识形态冲突空前激烈的形势下，民族、宗教矛盾相对弱化或被掩盖。在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宗教民众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包容互鉴。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变天，在外部势力的挑动下，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再次爆发，导致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解体。此后，波黑内战、科索沃战争、马其顿动乱等接连爆发，酿成一系列悲剧。然而，数百年和谐相处的亲情纽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并肩战斗结下的鲜血友谊、数十年建设各民族共同家园的难忘历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切断或忘却的。近年来，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巴尔干地区逐步实现了和平与发展，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再次走到一起，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巴尔干各国都积极参加了中国—中东欧国家进行合作的“16+1”机制，并积极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

## “文明冲突论”的缘起及其负面影响

本文之所以要兼论“文明冲突论”，是因为横贯欧亚大陆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文明断裂带及冷战后沿这一文明断裂带而起的一些冲突和纷争，正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笔者有必要在剖析上述三个文明断裂带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sup>①</sup>

### （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与文明断裂带密切相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国际上原有

---

① 关于以下三点看法，也可参见笔者此前发表的如下文章：“浅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历史教学》，2007 年第 5 期，第 17-20 页；“‘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文汇报》，2006 年 6 月 4 日；“和而不同，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深圳特区报》，2011 年 2 月 22 日；“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解放日报》，2011 年 3 月 13 日。此次笔者根据近年来的形势变化对上述文章的一些观点和提法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调整和补充。

的两极均势被打破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在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骤然凸现。庞大的苏联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十五个国家，基本以主体民族名称命名的前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告独立，只是在新国名中去掉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连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一分为二，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被戏称为“协议离婚”。很快，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再到中亚就形成了一条冲突热点带，而这正是横跨欧亚大陆的民族宗教分界线，也即前述的“文明断裂带”。

巴尔干半岛的动乱首先爆发，使铁托创建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同时，车臣战争打响，揭开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地区的“再分解进程”，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乃至俄罗斯自身，都出现了主要由分离主义分子挑动的内乱、有的甚至发展为内战。1996年，塔里班在阿富汗掌权，宣布要消灭一切宗教“异端”，以至将其珍贵的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巨佛摧毁，使中亚、南亚，乃至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此同时，在非洲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在中东和南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和印度—巴基斯坦争端愈演愈烈；在拉美，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日趋高涨。这股民族宗教冲突的潮流也蔓延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北爱尔兰、苏格兰、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魁北克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上升，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暴力冲突、“种族清洗”乃至恐怖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了。亨廷顿的核心观点是：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sup>①</sup>此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似乎在进一步证实“文明冲突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严重恶化了国际气氛，导致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再呈上升势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和紧接着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趋于激化。于是，亨廷顿在2002年发表的“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中

---

<sup>①</sup>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又进一步发展了“文明冲突论”。他宣称，世界已进入了“穆斯林战争”的时代，即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或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内不同教派之间。<sup>①</sup>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导致全球范围极端势力的上升和暴力冲突的加剧，进而引发了新一轮恐怖袭击的狂潮，形成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这些都被一些人视为“文明冲突”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例证。但是，也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有学者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任意选择历史和地域政治标准，有不少漏洞，无法解释国家间的所有问题，使人们极易误判形势，以为大规模文明冲突正在发生或即将来临。<sup>②</sup>显然，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热点，而成了一场政治辩论。

## （二）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

笔者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首先，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而战争之初两大对立集团内的主角也几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国家。又如，目前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发生的内战或内斗，也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团的冲突，尽管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挑动往往是起因。

其次，世界历史上还有许多冲突和战争起初是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即与文明差异并无关系，而主要由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造成。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初都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20世纪中叶德国的分裂和中国内战导致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状态，也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

再次，即使有些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

---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Age of Muslim War”, *Newsweek* (Special Edition), December 2001- February 2002, pp.8-9.

② 克里斯托夫·克泽：“亨廷顿的本意是什么”，德国《星期日世界报》，2006年2月1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2月17日。

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亚非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近期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但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非文化差异。后面对此还要详述。

第四，必须指出，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以严肃的世界史研究的标准衡量，他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尽管他强调文明的冲突，但也认为：“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sup>①</sup>有意思的是，后来他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的冲突时，他倒认为“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因此，是否可将亨廷顿的理论整体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将其作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这本身还是有疑问的。

### （三）“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

2006年11月发表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最终报告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笔者作为该小组成员参与了报告讨论和写作的全过程。该报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由‘文明冲突论’所带来的忧虑和混乱扭曲了对于世界面临困境之实质的讨论。用一成不变的文明分界线来概括内部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不同社会，妨碍了人们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动机、行为这类问题。与这种公式化的文化框框相比，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裂痕，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的裂痕，不同政治团体、阶级、职业、民族之间的裂痕，会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事实上，文化框框只会强化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变为看来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而且还会挑起大众的绵绵想象。”<sup>②</sup>因此，报告认为：“很有必要反对这些公式化的偏见和错误理念，因为它们加

---

<sup>①</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

<sup>②</sup> “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United Nations, Nov.13, 2006, New York, p.3, <http://www.unaoc.org/repository/report.htm>

深了不同社会间的对立与不信任。”<sup>①</sup>

## 文明因素的重要作用和“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

当然，亨廷顿的观点尽管存在漏铜和谬误，却也指出了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会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的观点确实提醒我们——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这就是“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所在，即它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是必须强调的。<sup>②</sup>

其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充满了各民族、各宗教、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互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都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吸取了许多外来精华，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参观印度国宝泰姬陵时就发现，它实际上是典型的波斯特色建筑。在印度各地的古建筑中，处处可以看到波斯文化的浓重痕迹。而在笔者访问伊朗时，又看到古波斯帝国的宫殿遗址中处处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都是由世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而成的，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外来影响和外来因素。绝对排外的、纯粹的本土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例如今日的中国文化，就是由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其中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

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

---

① “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② 关于这两点看法，也可参见笔者此前发表的如下文章：“浅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历史教学》，2007年第5期，第17-20页；“‘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文汇报》，2006年6月4日；“和而不同，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深圳特区报》，2011年2月22日；“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解放日报》，2011年3月13日。此次笔者根据近年来的形势变化对上述文章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做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调整和补充。

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如前所述，中亚-高加索-巴尔干文明断裂带同样又是文明融合带，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萨努格鲁教授(Prof. İhsanoğlu)认为，即使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也存在着“相通之处”。<sup>①</sup>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实际上，不仅是在这两大文明之间，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重要文明之间，都有着“相通之处”或者互相联系之处。

其二，极端主义使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冲突，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政治经济权益之争互相交错，特别是历史遗留的宗教、民族之间的争端，往往由于加入了现实的矛盾而更为加剧，使冲突双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中东乱局就是如此，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矛盾，又有当前围绕能源、水资源、交通要冲等方面的权益之争，互相纠缠而错综复杂，导致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其次，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因为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及其支持者，这是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持续近 70 年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最为典型，如本·拉登等人就声称，他们策划 9·11 袭击美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打击犹太复国主义”。显然，反对美国、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已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狂潮从中东向全球扩散的一个重要动因。巴以争端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这个根源性因素就无法彻底根除。再次，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纷争。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例，西方列强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实行政权更迭也是如此，结果使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乃至中东和全球不同民族、宗教、教派、地区之间的矛盾激化。当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便泛滥成灾，“伊斯兰

---

<sup>①</sup> [土]E·伊赫萨努格鲁(Ekmeleddin İhsanoglu): “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多哈会议上的讲话”(Statement at the Meeting of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High Level Group in Doha), 2006年2月26日。根据笔者参加当天名人小组会议时拿到的英文发言稿摘录。

国”这样的怪胎也就应运而生了。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富，有些国家和社会群体则越来越穷。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往往产生于绝望的弱势群体之中。如果差距和不平等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极端主义、偏见和冲突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例如近年来大批来自穷国和动乱地区的移民、难民涌入欧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导致这些群体被社会歧视和边缘化，西方媒体的反穆斯林宣传更使他们倍感愤怒，又受到“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煽动和蛊惑，许多暴力、极端活动就由此发生。这两年在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等国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基本上都是属于此类。

从上述互相关联的四个方面看，显然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导致的无知、愤怒、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想乃至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实际上，这在许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如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殖民主义打着基督教文明的旗号摧毁土著文明的血腥过程，出现过纳粹德国摧毁犹太文明，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同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家们，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Hassanal-Banna）到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都极力宣传按宗教来划分世界的观点和讨伐异教的思想，实质上也在宣扬文明的冲突。直到后冷战时代，在巴尔干、中东、非洲的一些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中，我们仍可看到一些极端势力从肉体上消灭“异己”民族、宗教团体的“清洗”暴行。

从上述两点看，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主流是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与交融，在包容互鉴、取长补短中共同发展。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一小撮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且这类冲突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那些言行最极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兰世界，通过漫画、影视蓄意侮辱伊斯兰教的那些人也不能代表西方国家广大人民。这进一步说明，尽管如亨廷顿提醒我们的，国际纷争和危机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

##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sup>①</sup>

1. 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

2.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着连接地带或“断裂带”，欧亚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断裂带”。

3. 各种文明在断裂带接触、碰撞，引起了一些摩擦和纷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干扰。

4. 从千百年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断裂带更是文明交汇、融合带，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发展方向，而冲突和纷争只是插曲和支流。

5. 经过漫长岁月，通过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相处而逐渐融合，形成了当今欧亚大陆上一系列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

6. 当前全球、欧亚大陆、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某些地区出现的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只是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所为，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大众，而且这类冲突往往源于外部的武力干涉和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

7. 尽管人类发展进程受到文明因素，特别是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

8. 只有努力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克服形形色色的极端思想、偏见

---

<sup>①</sup> 关于这 8 点结论，也可参见笔者此前发表的如下文章：“浅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历史教学》，2007 年第 5 期，第 17-20 页；“‘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文汇报》，2006 年 6 月 4 日；“和而不同，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深圳特区报》，2011 年 2 月 22 日；“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解放日报》，2011 年 3 月 13 日。此次笔者根据近年来的形势变化对上述文章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做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调整和补充。

和误解，促进不同文明、民族、宗教以对话、包容、互鉴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为当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主席的一段精辟论述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sup>①</sup>

---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connecting zones or “fault zone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ed areas. There exist three such fault zones along the land Silk Road on Eurasia continent through Central Asia, Caucasus and the Balkan region. Various civilizations collide against each other along fault zones, causing a number of friction and disputes. Nevertheless, looking back into several-thousand-year history, we could find that fault zones are more of intersections of civilizations. Through dialogues, communications and friendly exchanges, various civilizations,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r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by harmony co-existence along the Silk Road, consequently shaping a series of multi-ethnic and multi-religious communities of countries and interests in present Eurasia. The trans-Eurasian civilization fault zones and some conflicts along them after the Cold War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of the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owever, al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ic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by civilizations, especially those factors including religions,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yet violent conflicts are often caused by only a handful of extremists, terrorists, who can never represent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Moreover, these conflicts occurred mainly due to external armed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l in-dep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

<sup>①</sup>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阿斯塔纳，2013年9月7日。

contradictions. Thus, there doesn't exist conflicts resulting entirely from pur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civilization factors. Although there are flaws and fallacies in the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yet it still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which difference and collisions of various religions,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reminding us to pay attention to civilization studies. This is actually the duality of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Eurasian Continent, Silk Road, Civilization Fault Zone,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определило наличие поясов связывания и «поясов раскола»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регионами. На Шёлковом пут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проходящем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Кавказ и Балканы,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ой пояс раскола. В поясах раскола у различ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существуют не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е и раздоры, однак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ысячелетн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ые зоны разлома являются,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м пересечением, зонами слияния. Диалог и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обмены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и, этносами и религиями вдоль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гармоничн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и проходили процесс постепен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образу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 много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интересов в Евразии. Пролегающий через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пояс раскола и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на нём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основ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Общий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хотя и испытал на себ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особенно влия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зличий, однако сил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действи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крайностью 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народы раз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Та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оисходят как реакция на внешнюю вооруженную интервенцию и от глубинных внутривосточ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истог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ли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причинах,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Хотя в «Столкновен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недостатки и заблуждения, однако в труде также обозначена важная роль различий между религиями, этническими группами, культурами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ч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м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ридавать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изуча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В этом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двойственность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пояс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аскола,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

(责任编辑 孙超)

## 苏联意识形态转向中的美国文化渗透因素 及反思——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

凌霞\*\*

**【内容提要】**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苏美仍旧处于“冷战”之中，但外交关系已相对“缓和”，这种局面为美国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和利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文化领域积极向苏联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苏共却不断地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管控与打压。但是苏联大学生还是表现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与追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倾向于西方，苏联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最终走向解体。苏美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宣传而展开的文化冷战，其结果值得反思。

**【关键词】**勃列日涅夫时期 文化冷战 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D751.2;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6-0109(40)

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 Л.И.）时期，苏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大肆展开意识形态宣传斗争，这场斗争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展开。美国千方百计地争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因为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作家。而苏联当局则以各种方式管控这个群体，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发表对苏联不利的言论及文学作品。站在不同的立场，双方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

\*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苏美意识形态心理战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以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思想为例”（项目批准号：13YJC710025）和2015年北京联合大学国外访问学者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 凌霞，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积极争取和扶持这个群体，而苏联则对其采取了打压和驱逐政策。在较量的过程中，美国逐渐掌握了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动权，并有效改变了苏联大学生的意识形态。

## 一、 美国利用持不同政见者撼动苏联文坛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意识形态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美国运用多种途径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中文化维度是最为重要的手段。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苏联的文化底蕴深厚，俄罗斯人被称为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民族，因此用文化渗透来宣传西方意识形态可达到影响面最为广泛的效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活跃，在这一群体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对苏联当局和政策的不满成为美国得以利用的切入点。美国通过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提高其文学地位，并协助他们暗中传播地下出版物，这些策略对苏联主流政治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

### （一）诺贝尔文学奖橄榄枝垂青苏联作家

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作品的主题多为对苏联当权者的不满，对生与死、爱与恨的探索，对人性和尊严的执着追求。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被驱逐出境，他们在海外坚持创作，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留恋与怀念。作家们秉承了俄国文学强大的社会批判传统，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抗争不合理现实对人的精神奴役，赞美纯洁的人性，构建了苏联侨民文学。美国当局正是利用了侨民作家对祖国的特殊情感，逐渐把苏联侨民文学打造成了对苏联开展文化冷战的重要载体。

“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但俄国却不曾与诺贝尔文学奖结缘。苏联时期这一奖项突然垂青了 5 位俄籍作家，除肖洛霍夫（Шолохов М.А.）外，其他 4 位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勃列日涅夫时期，伊万·布宁（Бунин И.А.）和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Л.）虽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文学作品依然在海外被印刷，并在苏联秘密传播，对苏联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肖洛

霍夫和索尔仁尼琴（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早在1962年索尔仁尼琴就发表了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在社会上引起了超出纯文学评论的反响，“从大学生到工人都争相阅读这部作品，报刊上、机关单位、企业、农场——到处都在争论这部小说。”<sup>①</sup>1968年他因写成了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和《癌症楼》（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并在西欧发表，于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苏联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份支持索尔仁尼琴获奖的声明在莫斯科流传，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声明上签名，并将其转给外国新闻记者。而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大力反对，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分部副主席М·加波奇卡说：“我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看作为我们的思想意识对手的一种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支持我们社会中诸如萨哈罗夫（Сахаров А.Д.）、索尔仁尼琴等等一类投机分子。但是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造成一个先例，因此苏联政府看来很难对索尔仁尼琴采取理所应得的严厉措施。”<sup>②</sup>加波奇卡指出了西方的意图和高明手段：不仅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持不同政见者，也将该奖项授予了列宁勋章获得者肖洛霍夫。这种手段造成了苏联政府的两难境地，如果将诺贝尔文学奖一棒子打死，就等同于对苏维埃文化也加以否定，但如果置之不理，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影响力会越发不可收拾。所以，70年代苏联政府驱逐了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Бродский И.А.），他们流亡国外，成为苏联侨民文学的典型代表人物。1987年，已加入美国国籍、被誉为“20世纪俄罗斯诗歌太阳”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的橄榄枝在苏联时期伸向持不同政见者，是苏美开展文化冷战的突出表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借助苏联本土作家的文学影响力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以这些作家对苏联既爱又恨的特殊情感作为切入

---

① [俄]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② [苏]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反应呈苏共中央的通报（1970年10月17日）No04036”，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点，在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学生中培育代表西方文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非主流亚文化的继承者，使他们的政治倾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而苏联的任务则是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及其对本国主流文化的冲击。苏美在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实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在两种制度共存的前提下，其结果必定是两种文化长期共生，一种强势存在，另一种弱势存在，其本质是双方希望通过文化的渗透，间接削弱直至消灭另外一种社会制度。

## （二）“萨米兹达特”与“塔米兹达特”

文学作品是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政治表达方式，出版物则是实现这一方式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苏联当局的限制，另辟蹊径的“萨米兹达特”和“塔米兹达特”应运而生，成为苏联地下出版物的主要形式，为持不同政见者自由地表达思想提供了平台。

“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被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它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思想传播、交流和分享的主要载体。“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sup>①</sup> 私下出版物最早的传播形式是被禁诗集，这是因为，诗歌语言简练，短小精悍，便于翻印和复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有利于表达受监视的思想；遐想空间广阔，能够引发知识分子的共鸣。受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的冲击，私下出版的诗集承担起了思想解放、打破意识形态“一言堂”的初期任务。“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逐字逐句地复制革命前和苏联时期被禁止、被遗忘和被镇压的诗人的诗集，这些诗人有阿赫马托娃（Ахматова А.А.）、曼捷尔施塔姆（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Э.）、布洛克（Блок А.А.）、古米廖夫（Гумилёв Н.С.）、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И.），以及很多老一辈记忆中的诗人……人们知晓这些作品都是通过私下出版物，而非国家出版机构发行的刊物。”<sup>②</sup> 苏联文化中断了俄罗斯文化“白银时代”的连续性，这

① [俄]西尼亚夫斯基：《笑话里的笑话》，薛君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② 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М.:Моск.Хельсинк.группа, 2012. С. 210.

些诗人的作品构建了两种文化间的桥梁，使渴望了解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青年人找到了偶像：“整个莫斯科的各种机构和办公室中，打字机的运转都达到了极限：人们为自己和朋友翻印古米列夫、曼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sup>①</sup>私下出版物最初的出发点是传承俄罗斯文化传统，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异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必要补充，它未经审查，能够表达作者真实的思想和现实。1960年代中期，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私下出版物的任务从文化传承转变为兼具政治性，形式也从简单的诗集扩充为多种题材：抗议信、请愿书、声明、批判性文章、辩护词等。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布拉格之春”之后，《时事纪要》、《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通报形式的刊物开始涌现，刊载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各个派别的纲领以及其受政府迫害的信息。7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和宗教问题凸显，《土地》、《莫斯科文集》等刊物创办，发表了争取民族权利和开展宗教活动的相关文章。<sup>②</sup>私下出版物虽然制作技术手段落后，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传播，甚至每到一位读者的手中，都能被再复制几份传播出去，因此传播的速度经常会以几何倍数增长。“如果说，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在苏联人口中占的比重极小，但是‘萨姆—伊兹达特’（即萨米兹达特——引者注）传播的范围就不是以千计，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sup>③</sup>“当时就连工人队伍中，阅读‘萨米兹达特’也成了一种时尚，许多工人对‘持不同政见者’抱同情态度，尽量地保护他们的活动”。<sup>④</sup>1970年，安德罗波夫（Андропов Ю.В.）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对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从1965年至今这一时期已出现了400多种研究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方面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

---

① Буковский В.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етер. [http:// litru.ru/book/?p= 319102](http://litru.ru/book/?p=319102). 1978. С.16.

② 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析论”，《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77页。

③ [苏]罗·麦德维杰夫、亚·索尔仁尼琴、安·萨哈罗：《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社《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第4页。

④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的1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176页。

对外和对内政策进行修正，提出了各种对立活动的纲领。”<sup>①</sup>可见私下出版物不仅影响人群广泛，而且给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带来严重威胁。私下出版物贯穿了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声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秘密宣传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自由民主思想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工具。

“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被译为“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在国外发表作品或苏联组织在国外出版刊物，再通过地下渠道偷运回苏联并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文学作品。这种出版物在国外是公开发行的，这是持不同政见者绕过苏联出版审查机构发表作品的最迅速且有效的方式。1960-1970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出版了数量可观的“那边出版物”，伴随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出境，这类出版物也不断增加，这些书籍主要有几大类内容：第一，首当其冲的是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他的《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以及E·金兹伯格《陡峭的征途》等，都是批判苏联的劳改营制度惨无人道的代表作品；其次，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揭露和抗议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代表作有“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关于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白皮书》、以及《四个人的诉讼程序》、《谁是疯子?》、《我的证词》等。”<sup>②</sup>第三，批评苏共专制，抨击苏联社会不合理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建设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提出自己的主张。代表作有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萨哈罗夫的《论祖国与世界》、B·别洛策尔科夫斯基的《自由、权力和所有权》、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等。第四，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方方面面进行总结，代表作有“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奥西波夫《对俄国的三种态度》、列维京《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等。”<sup>③</sup>第五，批判大俄罗斯主义，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书籍：《国际主义还是俄

---

① [苏]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No06204”，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② 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析论”，第78页。

③ 同上。

罗斯化?》、《被惩罚的民族》、《旁观者随笔》等。这些作品在国外被大量印刷,并通过秘密方式转运回苏联,以手抄本和复印件的形式广泛传播。

“那边出版物”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苏势力的大力支持。他们运用文学的手段,借用苏联本土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之手,对苏联境内进行意识形态和平演变,苏联大学生群体成为他们主要的宣传对象。“60年代人”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间的大学生成为日后苏联政坛的主要领导人,其思想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向往西方“阳光”的向日葵,但遥远的阳光终究不能照耀苏联广袤的土地,失去文学话语权的苏联,最终丧失了政治主导权。

### (三) 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冲突与切换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Almond G.A.)于1956年8月首次提出的,该词兼具文化性和政治性,可以说是文化学的横坐标和政治学的纵坐标的交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文化谱系中包括苏共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和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象征着自由与民主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sup>①</sup>苏维埃文化代表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是在一个贫穷落后、长期受沙皇专制制度奴役、文盲比例高达70%的农业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缺乏现代社会的土壤,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法自然地生根发芽,因此必须把意识形态植入于文化之中从外部灌输,以吸引众多的追随者,激发起热血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情怀,在推翻黑暗专制统治的基础上,追求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纯洁性,确保政权的稳定。因此,从十月革命胜利一直到斯大林去世,苏维埃文化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是苏联社会中绝对的主流意识形态。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空前严苛,用大清洗的残暴手段清除异议,使刚性的意识形态管控日趋紧绷,最终断裂。

赫鲁晓夫(Хрущёв Н. С.)时期的解冻思潮使苏联意识形态开始多样化,出现了“二十大的儿女”——“60年代人”。他们是追求人权、自由和公

---

<sup>①</sup> 张建华:“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54页。

开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世界观形成于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ёв М.С.）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1955-1962 年，戈尔巴乔夫一直在斯塔夫罗波尔从事共青团工作。1971 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74 年，根据他在共青团工作的经验，被选为最高苏维埃青年问题委员会主席。<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外祖父及其妻子的外祖父都在大清洗时期受到过残酷的迫害，因此他对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号召热烈响应，主动向上级提出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计划，并获得批准。戈尔巴乔夫不仅接受了二十大所主张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而且他对“欧洲共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布拉格之春”的思想很感兴趣，并将这些思想向青年一代传达。这一时期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青年和大学生们的意识形态。再加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这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共和共青团产生了怀疑和离心力，<sup>②</sup>并在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上发生了变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学生正是“60 年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接受了新的政治观点的青年人，作为走在改革前列的一代人步入了社会生活，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是政治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他们思想的变化使苏联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人权建设和社会民主化思想的亚文化有利于苏联共产党的净化，但其实却为危险的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条件。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鼎盛，其与代表苏维埃的主流政治文化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表现出其挣脱主流政治文化压服的强烈反抗。这种持续的斗争，使苏联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位置最终角色互换，苏维埃文化由 70 年代前期的强势，逐渐过渡到 80 年代中期的弱势地位。

---

①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 – биография. <http://to-name.ru/biography/mihail-gorbachev.htm>

② 凌霞、张泽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教训及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13 年第 12 期，第 107-108 页。

## 二、苏美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对立态度

由于苏美文化宣传出发点和利益点的对立，导致双方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完全相左。苏联严格执行书报检查制度，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惩戒，一些在西方国家发表作品的作家会付出“从此没有了祖国”的代价。而美国却向这些失去祖国的人敞开怀抱，并以为他们争取自由和权利为名，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攻击。

### （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与书报检查制度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文化领域中由于受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管理松动迹象，很快就被加强意识形态监督所替代。1965年9月，莫斯科的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Синявский А.Д.）和达尼埃尔（Даниэль Ю.М.）遭到逮捕，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一款：“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鼓动或宣传活动”，对他们提出了在国外出版“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著作的指控。并以被告“撰写和出版恶毒诽谤和号召推翻国家制度的文学作品”的罪名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公开审判。<sup>①</sup>为了使政治迫害有法可依，苏联当局甚至对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这招致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尖锐抨击：宪法“直至今日仍是一个纯粹的宣言，他只是给外国人造成一种神话：苏联劳动人民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1966年9月对刑法典作了两项补充，完全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工人阶级争取来的最大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这两项补充条文是背着人民，在极端保密、同‘流氓’做斗争的喧嚣声的掩护之下通过的。”<sup>②</sup>对两位作家的审判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导火索，修宪举动导致护法运动的诞生，自此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境内此起彼伏。西尼亚夫斯基认为：“在本质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反对派，反对谁？不是从总体上反对苏联

---

① Сост. Никанорова Е.Б., Прохвятилова С.А. Миф о застое. Л.: Лениздат, 1991. С.70-71.  
② [苏]格里戈连科：“致布达佩斯会议参加者的公开信”，[苏]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社《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356页。

制度，但反对苏联社会中的思想统一化和对思想的扼杀”。<sup>①</sup>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宣传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如民主运动、民族运动、宗教运动、人权运动等。虽然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松散，但是流派众多，他们宣传民主、自由和法制，从不同的立场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批判，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

为了控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由苏联书刊保密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来执行书刊检查制度，它们承担着监视持不同政见者及有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青年群体的活动，并对出版单位及其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的任务。他们通过审查、禁止出版和篡改他人作品的方式封堵违禁出版物的源头；通过控制书刊销售部门和封杀作家的手段清除“有害”作品；还通过检查图书馆和旧书店的途径来阻止人们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第五局受到苏联政府的极度重视，其初建时约为 200 人，1967 年新招募了 24952 名情报员，总人数已经超过了当时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两倍多。<sup>②</sup>1968 年之前的两年半时间里，苏联书刊保密局通过预先检查禁止刊登或者传播的材料多达 7.2 万份。<sup>③</sup>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经常用侦察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目的是通过进行预防性政治检查掌控相关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计划，并向苏共中央汇报。在 1975 年 10 月 31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预警行动总结报告》中，记录了 1959—1974 年间，在对约 6 万名苏联公民进行意识形态监控侦查活动后对他们提出了“预防警告”，其中有近三千人被强加上了“从事反苏宣传鼓动活动”的罪名<sup>④</sup>。另外，苏联海关是书刊检查的重点盯防目标，其任务是阻止各种手稿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进入国内。西尼亚夫斯基曾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不是黄金，不是钻石，甚至也不是苏联工厂的计划，而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

---

① Ушаков А.В. и др.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 М.:Агар: Рандеву-АМ, 1999. С.437.

② 李淑华：“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5 期，第 40 页。

③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РОССПЭН, 2009. С.345-346.

④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 1945—1991》，第 403 页。

就是说，要筑起屏障，筑起拦河坝，布拉茨克水电站，为的是不让手稿流出和书籍钻进来。”<sup>①</sup>苏联书刊保密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对苏联文学作品的控制让许多作家无法忍受。索尔仁尼琴曾给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写公开信，要求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对“我国文学书籍长达几十年受到书刊检查机关越来越不能容忍的压迫”<sup>②</sup>表示抗议。这一要求得到了上百位作家的支持，西方一些国家报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使苏联这一内政问题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 （二）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惩戒措施

为了避免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对苏维埃主流政治文化的冲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多种惩戒措施。

首先，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由于公开反对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审判，儿童文学家利季娅被作家协会开除，其作品也遭到封杀。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会被开除公职、党籍，还会被收回住房等社会福利。这些人不仅丧失政治上的权利，而且失去经济上的来源，生计受到严重威胁。

其次，进行搜查逮捕。1964年，P·麦德维杰夫的《政治日记》开始在西方定期发行，1965年他被克格勃逮捕。随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也因在国外发表著作而被苏联政府逮捕。1971年1月14日，克格勃在一个月内在莫斯科等地展开了多次大搜查，“Л·普柳希被逮捕，在维尔纽斯和列宁格勒分别逮捕了B·谢甫鲁克和Ю·梅尔尼克。……仅在维尔纽斯就有100多人被审讯。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24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是所有搜查、拘捕和审讯的明确目的。”<sup>③</sup>

再次，审判入狱。A·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因编辑并在国内外出版发行了苏联当局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提起诉讼的材料——《白皮书》而被判刑。此后，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料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惯例，而每一次出版都会招来更加暴力的压制和审判。苏联政府与持

---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России// Континент. 1974. No.1. С.144-145.

② Сост. Коротков А.В. и др.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М.:Родина, 1994. С.43.

③ 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249.

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苏联政府不再公布起诉材料，审判也私下进行，但这一做法招致了持不同政见者更加猛烈的抨击，指责苏联政府违宪，剥夺了公民应该享有的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1967年7月，A.E·科斯捷林在致《顿河》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协会的信中写道，“上百位作家和诗人在监狱和劳改营中‘悄无声息地消失’，身心均受到残酷的摧残”<sup>①</sup>曾以“社会寄生虫”罪名被判入狱的约瑟夫·布洛茨基曾说：“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名字往往不登在作品封面，而却写在他牢房门口的国家。”<sup>②</sup>

第四，关进精神病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历史上存在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就是谎称持不同政见者患精神病，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麦德维杰夫兄弟中的弟弟Ж·麦德维杰夫就曾被关进精神病院，其哥哥Р·麦德维杰夫多方展开营救，才使弟弟脱离苦难，出狱后两人合著了《谁是疯子？》（Кто сумасшедший？）一书，揭露精神病院中对“病人”使用精神类药物进行“治疗”，目的是让这些人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停止“危害社会”的活动。

第五，剥夺国籍驱逐出境。为了减轻在国内控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苏联当局更倾向于将他们赶出国门，禁止他们作品的传播。“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sup>③</sup>到了70年代中期，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谈判期间，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迫流亡西方，眷恋祖国不愿离开者，遭到苏联当局的驱逐。随着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的作家名单不断增加，促成了苏联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在西方占有一席之地的奇特现象，他们在国外出版著作，不仅对苏联国内的青年及大学生产生影响，也扩大了俄罗斯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 （三）美国的缓和战略与犹太人移民问题

---

①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 С.334.

② 杨绍彤摘译：“私下出版物——俄国的权威之声”，《苏联问题参考资》，1981年第1期，第16页，摘自[美]《读者文摘》1980年第1期。

③ 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256.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军事实力不断增长，早已摆脱了赫鲁晓夫时期古巴导弹危机所显露出弱于美国的尴尬局面，在核武器和导弹的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这一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也是苏联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但即便是这样，其民众的生活条件、工资水平，以及生活质量仍然远远低于美国。加上犹太人的权利在苏联社会仍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苏联国内众多犹太人希望移居西方。此时，丧失了军事绝对优势的美国，开始改变与苏联争霸的策略，希望通过谈判，从支持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入手与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联系，并逐渐利用他们干涉苏联的内政和动摇苏联当局的统治基础，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必须先从缓和苏美两国关系入手。

早在 1968 年，尼克松就曾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会上表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要从对抗转向谈判。<sup>①</sup>1970 年，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强权政治模式，即国家寻求利用每个可利用的机会获取自己的利益，或是在每次谈判中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真正的缓和需要双方做出一系列的根本改变，而不仅仅是表面政策的转变。”<sup>②</sup>至此，“缓和”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其实，尼克松是从战略层面上提出“缓和”的理念，即“缓和”是一种外交手段，而并非外交的目的，它与武力威慑一起形成和平与竞争的统一体。虽然“缓和战略”非常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美苏和平共处，减少双方军备竞赛投入及其带给世界的核战争威胁，但是缓和战略的实施却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美国几届总统任职期间忽冷忽热。这不仅与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有关，也与美国采用“联系原则”（linkage）直接干涉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而招致苏联的反对有关。“联系原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采取的一种谈判策略，即将不同的利益点捆绑在一起进行谈判，只有对方接受了不利于自己条款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有利于自己条款的生效。在尼克松执政早期，苏联犹太人开始掀起了申请向国外移民的浪潮。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通过与苏联的“悄悄外交”方式

---

① Richard Nixon, “Address Accepting the Nomination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Miami Beach”, Florida, August 8, 1968,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5968&st=&st1=\(2012/9/20\)](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5968&st=&st1=(2012/9/20)).

② Richard Nixon, “Address to the 25th Anniversary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6(October 26, 1970), p. 1435,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754&st=&st1=\(2012/9/20\)](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754&st=&st1=(2012/9/20))

解决这一问题，并许诺回馈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但是美国国会中的杰克逊集团却提出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这一提案得到了苏联犹太人的大力支持。1973年4月23日，由100多名苏联犹太人活动分子签名的呼吁书直接导致了美国犹太人集团于4月26日表示公开支持《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另外，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公开支持该修正案，他认为犹太人获得移民的权利是苏美双方关系缓和的必要条件。但是苏联国内却发动了反对以萨哈罗夫为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这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国会中的中立派也倒向杰克逊集团，最终使苏联失去了贸易最惠国待遇。苏联的本意是希望通过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即向申请离境的犹太人征收“离境税”，来解决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这说明苏联处于一种纠结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如果申请离境的犹太人数目迅猛增长，有损苏联的国际声望，会使人联想到犹太人厌恶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0年代，半数移民的犹太人都选择去了美国，这对于苏联描绘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优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是一个重大打击；<sup>①</sup>另一方面，在犹太人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国家安全机构既希望通过犹太人移居国外而减轻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社会的影响，但同时又担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美国利用，在国外发表诋毁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和文章，这不仅没有消除其对国内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把这一影响扩大到了国际范围。事实也的确验证了苏联的担忧。苏联犹太人移民与美国，以及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美国国会中的右翼势力和保守派不断与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联系，通过支持他们向苏联当局施加压力。

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国总统，他比尼克松更加关注犹太人移民问题，并与苏联开展“悄悄外交”，以商定移民的数量。但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即修改后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当天苏联塔斯社就发表声明称：“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任何企图干

---

<sup>①</sup> 杜红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苏关系中的苏联犹太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涉纯属苏联内政的事务，这种企图不管来自什么人都不能接受。”<sup>①</sup>但是福特总统仍然于1975年1月3日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激起了苏联的强烈反感，使得犹太人移民问题和苏美关系陷入了困局。1975年6月，美国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美国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趁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辗转来到美国之际，向福特发出邀请信，请总统出席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欢迎索尔仁尼琴的宴会。在福特还未做出赴邀决定之时，国会参议院就通过了决议，决定授予索尔仁尼琴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共同代表国会内的保守派，希望福特在6月30日会见索尔仁尼琴。<sup>②</sup>美国主张对苏联强硬的右翼势力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目的就在于破坏即将进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福特通过权衡利弊，最终没有接见索尔仁尼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会见并不能推动索尔仁尼琴所希望的一些苏联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且显然会削弱缓和的根基。”<sup>③</sup>虽然美国白宫实行的对苏缓和政策，不断受到来自国会的干扰，但是苏美关系一直保持着围绕犹太人移民问题而时远时近的缓和状态，即使美国国会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与苏联境内和境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联系，希望利用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制造舆论对苏联施加压力，他们的行动也确实对苏联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此时苏联在反对美国干涉苏联内政的斗争中尚拥有一定的主动权，但是在欧安会最后文件签订之后，苏联在犹太人移民、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问题等方面却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地位。

#### (四) 《赫尔辛基协议》与美国人权外交

在美国采取缓和政策的前提下，70年代，勃列日涅夫积极向西方示好，多次与美国总统会晤协商，推动有助于双方友好合作的谈判，希望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终于在1975年8月，促成37国共同

---

① Правда. 18.12.1974.

② FRUS. 1969-1976, Vol. X VI, p.610.

③ Ibid, p.662.

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对于苏联来说是喜忧参半：值得高兴的是，西方承认了二战后欧洲现存国界的不可侵犯，东西欧既定边界被赋予了合法性，这使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据了有利地位；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将人权原则纳入到协议中，即各国必须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赫尔辛基协议》其实是苏联妥协的交易，即通过承认人权条款来换取西欧和美国承认欧洲的领土边界现状。这就为美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向苏联和东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合法性。“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议是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以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sup>①</sup>自此，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关注苏联人权状况为名，支持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成立“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等组织。其中，成立于1976年5月的“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和分析他们得到的破坏赫尔辛基协定中人道条款的材料，并将它们通报给协定参加国。”<sup>②</sup>“1977年，‘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还下设特别小组，专门调查苏联当局将精神病治疗用于政治目的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1976年底至1977年初，赫尔辛基小组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包括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地。各加盟共和国的赫尔辛基小组往往与宗教运动及民族运动建立联系，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更加复杂。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些组织的庇护下，还建立了各种组织，诸如‘苏联保卫人权自发组织’、‘人权委员会’、‘俄国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教徒权利保卫委员会’等等。‘持不同政见者’聚集在这些组织周围，宣传与官方不同的观点。”<sup>③</sup>美国大力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文化影响力公开向苏联大众、主要是向苏联青年和大学生进行思想渗透，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是美国拉拢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谋略的胜利。早

---

①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15页。

② Журавлев В.В. (ред).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Юристь, 1998. С.624.

③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的18年》，第162-163页。

在 50 年代末美国就提出：“利用今日在自由世界为数可观的 100 多万苏联和俄罗斯侨民……其中少部分属于‘政治侨民’，他们对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现出强烈兴趣并准备为之献身。”在《赫尔辛基协议》签订后，美国国会中的右翼势力和保守派如愿主打“尊重人权”的王牌，大造舆论声势，抗议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苏联当局则不得不采取更加温和的手段处置持不同政见者，大大减少审判入狱人数，更多地将他们驱逐出境。而这却正中美国下怀，美国开始大量接纳申请政治避难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获得了可以利用的人才储备，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文化冷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卡特（Carter J.E.）担任美国总统后，更是把“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1977 年 1 月 26 日，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美国不能对自由的命运和每个个体的人权漠视不管。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共同构建一个更和平、正义、人道的世界。<sup>①</sup>这表露出美国打着为持不同政见者争取人权的幌子企图干涉苏联内政的阴谋。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在斗争方式上，他们也更多地与政府对抗，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向国外寻求知识和帮助”。<sup>②</sup>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和思想与当时西方国家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是合拍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势力所利用”。<sup>③</sup>这使苏联发现，自《赫尔辛基协议》签订之后，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转入防御地位。70 年代以来，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离开苏联，居住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远离了苏联政府的干扰，终于可以自由地撰写反映个人价值观和思想的书籍，大量的“那边出版物”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被偷运回苏联进行传播。这些书籍对苏联大学生们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导致许多大学生同情、支持并追寻持不同政见者的脚步，对苏联当局表现出不满、抗议，甚至直接做出反抗举动。

---

① [美]卡特：“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77 年 1 月 26 日）NO0251”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 31 卷），第 518 页。

②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的 18 年》，第 174 页。

③ 同上，第 175 页。

### 三、文化渗透对苏联大学生意识形态冲击的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战略对苏联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所支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和文学作品对苏联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大部分苏联大学生不再信仰马列主义，苏共也已不再是青年一代崇尚和追随的核心。<sup>①</sup>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有三大流派：自由主义改革派、自由民族主义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受他们的影响，在大学生中也产生了具有不同流派倾向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大学生的思想并不成熟，因此他们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更为激进，甚至直接对共产主义制度、红色政权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谩骂。

#### （一）自由主义改革派对西方制度的向往

自由主义改革派也被称为“西方派”、“自由派”或“法制派”，代表人物是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主张禁止核试验，响应美国提出的裁军倡议。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领袖，197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自由主义改革派成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批判斯大林制度，他们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党治国家，主张实行多党制。萨哈罗夫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的理论，认为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和平共处。他还提出应该通过修改宪法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西方的民主。受到自由主义改革派影响的大学生，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追求西方的民主文明和生活水平。

1965年3月17日，维尔纽斯市大学生Б.П·绍林斯卡娅在大街上散发写有“苏维埃选举是骗局，仅仅是一场闹剧，打倒红色畜生——共产主义”

---

<sup>①</sup> 凌霞、张泽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教训及启示”，第107-108页。

的传单。同年7月17日，她再次散发写有“在苏联没有自由”的传单。<sup>①</sup>绍林斯卡娅是一个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经调查，她散发传单共有七次，她指责苏联选举制度，认为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和自由，号召人们推翻红色政权。1950-19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复杂的矛盾：苏南冲突、匈牙利“十月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中苏关系破裂、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是苏联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份，干涉他国内政的结果。苏联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要求“小兄弟”们必须固守斯大林模式。这种要求和举动严重损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招致了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大学生的反对。1968年10月-1969年4月，列宁格勒市工业学院的两名学生（А.М.列文施泰因和Ю.Л.托波尔科夫）几次在校园内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世界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国家间战争的边缘，到了抛弃共产主义空想的时候了，请想一想，这种乌托邦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出路只有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将用暴力回应暴力……要么自由，要么死亡”。<sup>②</sup>1967年底-1968年初，加里宁市的师范大学生В.И.特里福诺夫，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谩骂苏共，指责其干涉匈牙利事件，赞扬美国的生活水平。<sup>③</sup>美国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份关于苏美两国居民消费对比的报告显示，1965年，苏联每个居民的物质财富总需求量为564美元，非粮食商品的需求量仅为168美元，而每位美国居民对应的统计数据却分别为1542美元和905美元。<sup>④</sup>因此，借助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向苏联大学生宣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进而进行思想渗透的途径是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意图轻而易举地被美国真实的经济基础掩盖了，虚实结合，真伪难辨，导致苏联大学生在向往美国优越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欣然接受了西方的价值

---

① Сост. Эдельман О.В. и др.5810.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 Март 1953-1991. М: Материк, 1999. Ф.8131. Оп.36. Д.291. С.671.

②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3265. С.701.

③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2559. С.687-688.

④ [苏]叶诺夫：“叶若夫关于美苏收入比较向列别金斯基提供的统计资料（1966年12月21日）NO03649”，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125页。

观。

## （二）自由民族主义派开展民族分裂活动

自由民族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索尔仁尼琴。虽然该派别对控诉斯大林的残暴统治与其他流派有相同之处，主张摧毁古拉格群岛，还苏联社会以民主与自由。但是其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却是通过民族权利运动和宗教运动来表达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民族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包括“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米亚的全民族运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及在苏联的犹太人要求迁徙权利的运动，乌克兰及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非俄罗斯化运动，俄罗斯的新斯拉夫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sup>①</sup>索尔仁尼琴既不主张走西方的道路，也不赞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希望通过恢复民族文化的历史道德传统来拯救苏联，他甚至认为苏联应该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俄国时代，可见他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和对本国历史传统的认同。他主张恢复东正教，建立神权专治国家，认为不必推翻独裁统治，只需要在道德上净化政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索尔仁尼琴的思想，通过各种手段在大学生中进行反苏反共、民主主义、教权主义的宣传，唆使大学生成立民族复兴组织，大搞民族分裂活动。1968年居住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纳帕市的农业技术学校学生H.A·博加奇组织技术学校的11名学生参加非法集团，提出了章程和誓词，表达反苏情绪，打算进行武装斗争，让库班脱离苏联。<sup>②</sup>塔什干市大学地理系研究生M.M·米拉布杜拉耶夫于1967年起发表“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民族主义言论，1968年企图建立非法组织“解放联盟”或者“山川和自然爱好者”，以便开展把俄罗斯人赶出乌兹别克斯坦的斗争。<sup>③</sup>1974年赤塔市铁路运输中等专业学校学生C.M·塔拉图欣决定成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类型的反苏青年地下组织，宣传苏联国内缺乏民

---

① 王鹏：“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运动及其对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1期，第58页。

② Сост.Эдельман О.В. и др.5810.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 Март 1953-1991. Ф.8131. Оп.36. Д.2583. С.689.

③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4742. С.731.

主，呼吁青年实施恐怖和破坏活动。<sup>①</sup>这些大学生自发成立的组织虽然规模不大，有的甚至中途夭折，但是它们的数量和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它们背后受到西方反苏势力的支持，还有一些大学生直接参加国外组织，为它们撰写稿件和传播地下出版物。1969年彼得罗扎沃茨克市的大学生A.E·乌奇捷利在梁赞结识了反苏集团武德卡成员O.M·谢宁并被吸收加入该组织，此后乌奇捷利多次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大学生中散布反苏言论，传播从梁赞得到的和自己编写的材料，还纵容他人撰写反苏文章，试图通过去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的学生把这些文章带到国外发表。<sup>②</sup>1980-1982年，居住在莫斯科市的大学哲学系学生M.B·马列宁撰写和传播了几篇文章和呼吁信，企图通过波兰学生向波兰“团结工会”转交材料。<sup>③</sup>这些大学生为西方及时掌握苏联的人权作品和民众的思想动态提供了方便，为西方在苏联开展思想渗透找到了宿主，欧美特工人员寄生于这些组织，并以其为触角在苏联各地开展意识形态蚕食活动。

### （三）民主社会主义派抨击苏联体制的弊端

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P·麦德维杰夫。这一派别的主张与自由主义改革派和自由民族主义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这一派别信奉马克思主义，批判斯大林极权统治，主张恢复列宁主义准则，消除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社会生活的不良影响。P·麦德维杰夫认为，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假社会主义”：“今天的苏联社会是一个真假社会主义的复杂混合物。……苏联的制度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sup>④</sup>但他认为，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并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东西，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也有某种继承关系，应该通过引入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多元化等有益因素来克服苏联

---

① Сост. Эдельман О.В. и др.5810.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 Ф.8131. Оп.36. Д.6489. С.764.

② Там же.Ф.8131. Оп.36. Д.3637. С.707.

③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8905. С.796.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北京：群众出版，1984年，第102页。

体制上的弊端。

受到这一派别观点影响的大学生，有的直接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有的希望借用其他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理论来拯救苏联社会主义。1968年，三名大学生（A.A·鲁缅采夫、B.П·波皮沃达和B.K·加比索夫）在莫斯科市散发160份传单，传单上写道：“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苏联被孤立和完全丧失威信，国内的艰难状况，都是这些变化能够看得见的后果”，“知识分子上层和世袭知识分子在与已经脱离人民的党和国家机关上层融合基础上形成了剥削阶级执政集团”。<sup>①</sup>传单的内容对苏联插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表示了抗议，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引发的后果，说这种行为不仅对原来追随苏联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损失，也损害了苏联的名誉和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破坏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传单还反映了党和国家内部的腐败问题，认为执政集团已经被形成的新剥削阶级所垄断，这个群体逐渐发展成为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挑战了苏联社会公民之间应有的公平和平等关系。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大学生，面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称霸的做法，更加赞同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事务时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7年莫斯科市航空技术学校学生A.B·马科夫斯基在熟人中宣传毛泽东的某些思想。<sup>②</sup>1968年莫斯科市的历史系大学生C.A·图皮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打算把这封信投送到中国大使馆。<sup>③</sup>这些大学生是持不同政见者中最清醒的群体，他们在本质上热爱自己的国家，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政治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有的积极宣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其出发点并非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希望在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对阻碍苏联发展的弊端进行改革，使苏联的“假社会主义”转变成能够体现出自身优越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在苏联大学生中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他们因

---

① Сост.Эдельман О.В. и др.5810.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 Март 1953-1991. Ф.8131. Оп.36. Д.2980, 3213. С.697.

②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1496. С.681.

③ Там же. Ф.8131. Оп.36. Д.1792. С.685.

向往西方的民主、文明和自由，而对苏联政权、制度和执政党进行攻击，通过散发传单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由于大学生年纪尚轻，涉世未深，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因此他们的性格具有冲动、敏感等特性，对自己观点的表达也更加直接和激进，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苏联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及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苏联社会多种危机综合爆发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 四、对苏美文化冷战结果的反思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双方将博弈的重心从军备竞赛转移到文化冷战上。中国学者朱红琼认为，“文化冷战是冷战的最主要特征，其实质是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争夺，通过对对方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否定来否定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进而通过对对方精神空间的控制以颠覆对方存在的合理性。”<sup>①</sup>荣正通对文化冷战的定义是，“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背景下，一国政府以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行动，对本国或他国的民众施加思想认识层面的影响，使用强制手段或潜移默化地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从而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以此巩固本国的现政权或改变他国的现政权。”<sup>②</sup>可见文化冷战的有效性和重要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苏美双方都尽一切力量树立本国文化的正面形象，削弱对方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输送到对方的地盘中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表面的风平浪静掩盖不住内在的暗流涌动，较量必定以你死我活的结果收场。

##### （一）美国文化入侵战略精准，逐渐获得主动权

###### 1、美国政治文化及新闻署的文化渗透策略

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

---

① 朱红琼：“文化冷战与作家命运——以俄罗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为例”，《山花》，2008年第24期，第145页。

② 荣正通：“中外文化冷战研究述评”，《近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301页。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演说中都包涵了这一重要思想。虽然美国文化自身具有多样性，但民众对它的认同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美国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自觉信奉”、“被所有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国家领袖所津津乐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sup>①</sup>已经成为美国国家道德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将自由主义法制化的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国家。“自由主义法制化和常识化的结果就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普及和深入人心，体现在美国人对宪法的崇拜，美国宪法作为典型的自由主义文献成为美国人尊奉的‘圣经’。这不仅影响到美国人的日常行为和对政治的基本看法，同时也塑造了美国人对外交与国际问题的理解，使美国民众更多地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而在其他国家，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主要局限在思想家和政治精英的思想中，民众远不像美国人那样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sup>②</sup>因此，美国政府在向苏联进行文化渗透时，选中了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苏联社会知识精英，即持不同政见者，企图把他们打造成美国政治文化在苏联的代言人。为了建立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广泛联系，美国政府在与苏联进行人权谈判时，总希望将问题诉诸法律的框架体系，其中就包括关于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为持不同政见者争取人权的《赫尔辛基协议》，因为“在美国，道德和政治问题最终都是法律问题”。<sup>③</sup>这样做不仅能博得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好感，更能在美国国内获得最广泛民众的支持，而且还能将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演变成违法行为，煽动国际舆论谴责苏联。这种做法其实是美国最惯用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法，是美国采取文化“软渗透”的前提条件。

美国虽未设置宣传部和文化部，但美国文化对苏联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效果显著，这看似令人费解的奇特现象，正是美国文化渗透策略的高明之处。

---

①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1962, p.3.

②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7 页。

③ H.Jefferson Powell, *The Mor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

不设立这两个政府机构并不代表美国不进行文化宣传，只能说明美国宣传机器的运作方式非常特别。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过，“最好的宣传方式就是任何时候都看不出是主动宣传。”<sup>①</sup>其含义并非要放弃主动出击，而是要把宣传搞得非常隐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新闻署的活动完美地展现了美国文化渗透的这一最大特点。美国传播学大师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认为，宣传“意味着不通过改变客观条件，……来控制人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运用故事、报道、图片、谣言等符号，以及社会传播等其他方式，来控制舆论。<sup>②</sup>美国新闻署正是运用了这样的理念，通过以下途径来执行文化“软渗透”的任务。

首先，通过讲美国故事，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讲美国故事并非简单的推销工作，它是一种长期教育工作（far-reaching educational job），“将会对那些对美国物质和文化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人们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有多么伟大”<sup>③</sup>通过讲美国故事，不仅可以扭转美国民众对新闻署早年“硬宣传”策略的反感，更能肩负起“提升美国对全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同时为我们的前景注入更多的历史乐观主义”<sup>④</sup>的任务。1977年卡特在巴黎圣母院大学发表演讲：“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应当促进对它的塑造，新世界要求美国采用新的外交政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恒久尊严和美国历史观的乐观主义的外交政策。”<sup>⑤</sup>可见美国通过讲述本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向全世界展示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推动苏联民众的亲美反苏倾向，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从这一层面上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 B.Hartz）认为的那样，成为“世

---

① Сондерс Ф.С. ЦРУ и мир искусст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фронт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4. С.5.

② [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③ NA, RG 306, Biographic Files Relating to USIA Directors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1953-2000, Box 1, Understanding, Not Propaganda, Should Be USIA Aim, Allen Feels, February 19, 1961.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3.

⑤ [美]吉米·卡特：“在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1977年5月22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7》，第957页。

界上最大的专制主义之一。”<sup>①</sup>

其次，在对苏联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进行全员间谍活动。1957年，美国新闻署颁布《基本指导文件》，提倡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使用最著名且最简单的“沟通技术”，即人员接触。美国新闻署的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最优先考虑与他们所工作的国家的人民建立亲切和信任关系。而且，还应该尽所有努力来促使所有的美国人这样做，不管他是居民还是暂住者。<sup>②</sup>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之下，美国新闻署的工作人员在苏联大肆开展搜集情报的间谍活动，通过与苏联人民接触，得到不利于苏联国际声誉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加工，打造出苏联红色文化应该被反对的最有力证据。

再次，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对苏联民众进行消费引导。1959年夏天，美国“在莫斯科举行的为期六周的展览，标志着西方在冷战中取得了优势地位。虽然一场展览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冷战的发展路线，但在争夺人心和思想斗争中，它放大了苏联的弱点突出了美国的力量”。<sup>③</sup>展览中几乎所有商品都受到苏联民众的喜爱和好评，根据美国的统计，最受欢迎的展品是汽车和彩色电视机，然后是环幕电影。此外，房屋模型、时装、IBM问答机和百事可乐同样非常受欢迎。参观者总是详细询问它们的价格、大约工作多长时间可以挣够这些钱以及购买需要等候的时长等。<sup>④</sup>甚至还有苏联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好，……你们不想同我们进行贸易非常愚蠢。”<sup>⑤</sup>此外，让美国获得意外之喜的是，苏联在展览之后花费37.5万美元购买了网格球顶展厅和玻璃展厅。<sup>⑥</sup>这一事件相对于美国获得不菲的经济收益来说，将这些建筑留在莫斯科继续展示美国现代建筑和设计成就而给美

---

① Louis B.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55, p.59.

② NA, RG 306, Director's subject Files, 1957-58, Administration—Privat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Box 1, USIA Basic Guidance Paper, 1957.

③ Walter L.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xiv.

④ FRUS, 1958-1960, Vol.X, Part 2, Eastern Europe; Finland; Greece; Turke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40.

⑤ N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Moscow, 1957-59, Box 7, Report on American Exhibition in Moscow Visitors' Reactions to the American Exhibit in Moscow a Preliminary Report, September 28,, 1959, p.25.

⑥ NA, RG 306, 1956-1964 Moscow Exhibits, UD-UP 10, Box 1, Facts about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April 1, 1959.

国带来政治文化上的收获，更让美国政府欣喜若狂。因为美国看到了利用消费引导，使苏联民众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给苏联社会带来冲击的可行性。

美国新闻署一直到 1999 年才被并入到美国国务院，因此它的活动持续了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冷战宣传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策略也从冷战初期的“硬宣传”逐渐过渡为“软渗透”，从而完成了美国文化渗透策略的蜕变，达到了“看不见宣传”的境界。美国新闻署用精心伪装的面具巧妙地掩盖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意图，把它装扮成带给苏联先进的民主和文明的文化交流使者，有效地输送了资本主义价值观，扰乱了苏联社会的红色思想，这样的结果折射出了美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软到近乎让人无从察觉。在与苏联的文化冷战中美国经常运用这种心理战的手段，通过文化渗透传播资本主义思想和信息，影响苏联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通过分析受众的心理特点，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手段，体现了美国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的过人之处。

## 2、中央情报局与自由文化联合会

除了美国新闻署，美国的文化渗透工作还被另一个强力部门所掌控，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它暗中支持文化渗透的相关活动。美国最早以冷战思维分析问题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曾经表达过中央情报局有填补美国文化部空缺的责任。1999 年英国记者、纪录片导演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撰写了《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一书，其中论证了中央情报局在文化渗透中扮演的角色。这部著作首次见证了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对政治文化领域的操纵。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档案信息，并在精心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得到了非常重要的论据，证明了中央情报局帮助左派知识分子筹划和协调相关文化活动，并给予资金支持的事实。中央情报局的行为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弥补自身在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上的不足，摆脱因发战争财成为暴发户的印象和种族歧视问题引发的世界反感，利用他人之口之笔帮自己说话，变被动为主动，不用亲自出面争取，便可获得引领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唆使他国知识分子参与反共反苏斗争，养成喜欢美国道路的偏好。中央情报局积极

地从外国知识分子中培养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本国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

作为文化冷战的幕后操手，中央情报局手中有用不完的资金，这些资金的使用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为了隐藏拨款来源和便于参加各种所谓的争取文化自由的国际学术活动，中央情报局构建起了分支众多的基金系统，自1950年起，就不受限制地把计划的款项秘密划拨给青年团体、工会、大学、出版社和其他组织，让他们资助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相对抗的作者出版作品。<sup>①</sup>为了更大规模地构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中央情报局在庞大的基金系统中打造出了一个优秀的文化渗透平台——文化自由联合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该组织在1950-1967年由中央情报局间谍麦克·乔塞森（Michael Josselson）领导，从事各种文化渗透活动，成绩异常显著。其“活跃的高峰期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工作人员达到数万人，出版20多种杂志，控制着新闻和电视业务，组织有声望的国际会议、音乐家的演出和艺术家的展览，并组织竞赛奖励参与者。它的任务是打消东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情，转变他们的观念，使他们接受美国生活方式。”<sup>②</sup>文化自由联合会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存在，拉拢欧洲知识分子，防止他们倒向共产主义，努力争取曾经同情和支持过共产主义的左翼文人，他们在冷战初期由于不满和抨击斯大林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决裂，转而与美国政府合作。但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反映出他们因过分依赖美国政府的资助，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沦为被中央情报局驯服了的工具。由此可见，虽然文化自由联合会名义上打着捍卫“文化自由”的旗帜，但实际上是替中央情报局招募文化傀儡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

除了汇聚反苏反共人才，创办杂志也是文化自由联合会的重要任务。在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各类意识形态化的杂志相继创办。“1953-1990年出版的美国杂志《碰撞》（Encounter）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有中心地位，它的生机勃勃与玩世不恭堪比鸡尾酒会文化。……这本杂志在英国，美洲，亚

---

① Сондерс Ф.С. ЦРУ и мир искусст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фронт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4. С.4.

② Там же. С.5.

洲和非洲都有读者，它对待文化问题不择手段，对许多政治问题的漠视或直接掩盖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该杂志时刻都使问题意识形态化，带有冷战思维的反共思想。……并与世界情报机构保持紧密联系。”<sup>①</sup>美国创办有影响力的杂志，就是为了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利用这种方式在苏联发起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征服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思维，使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追随西方民主与自由，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使成千上万的苏联大学生认同美国文明的优势和赞同美国对自由的理解。

1977年美国《纽约时报》公布，1950-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参与资助了1000本书的出版<sup>②</sup>，其中就包括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所著的《日瓦戈医生》。这部著作描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红色政权存在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社会乱象，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该书的出版无疑是想给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当头一棒。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秘密出资成立了“契诃夫出版公司”，将契诃夫的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sup>③</sup>。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的作品挣脱了愚民、妥协和御用的三伪文学的束缚，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直面现实的笔触。中央情报局正是看中了契诃夫小说对俄国社会丑恶现象的大胆揭露和对沙皇黑暗统治制度的无情鞭挞。从俄国经典文学作品中搜寻苏联社会依旧存在的相关现实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把契诃夫所批判的沙俄时期的糟粕与苏联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连接，使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苏联现实社会与俄国历史上的黑暗没有区别，用以达到丑化苏联红色政权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目的。

### 3、美国间谍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密切联系

为了在文化冷战中战胜苏联，美国把渗透的重点放在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利用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政策，将计就计，通过各种间谍活动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保持密切联系。充当间谍的人员有使馆外交人

---

① Сондерс Ф.С. ЦРУ и мир искусст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фронт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42.

② *New York Times*, 25 December 1977.

③ Сондерс Ф.С. ЦРУ и мир искусст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фронт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208.

员、新闻记者、美国作家等，他们无孔不入地进入各种渠道从苏联国内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大肆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手段散布相关信息，使苏联当局陷入人权问题的漩涡，长期难以自拔。

1977年7月29日，持不同政见者斯涅吉廖夫在《给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中控诉苏联宪法的违宪性并宣布自己放弃苏联国籍的决定：“你们的宪法是受政治暗探局控制的，在苏联一切都处于它的支配之下，没有它你们的集中营制度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把自己的公民证连同本声明一起寄给你们，从今天起我不再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sup>①</sup>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斯涅吉廖夫展开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报告呈送苏共中央，证明了斯涅吉廖夫与美国反苏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与国外反社会主义杂志《大陆》的副主编涅克拉索夫、莫斯科的反社会分子及一些美国记者建立了非法联系。斯涅吉廖夫通过他们向西方转交敌对性材料，这些材料被国外的一些宣传中心和民族主义组织用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自由》电台今年7月18日广播了斯涅吉廖夫的一篇谤文——《给美国总统吉·卡特的公开信》，信中再次恶毒诽谤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苏联政府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今年夏天斯涅吉廖夫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向外国记者宣布他出于政治上的理由放弃苏联国籍并向他们递交了所谓的《给苏联政府的公开信》。”<sup>②</sup>通过对斯涅吉廖夫进行搜查：“发现他炮制的反苏文件草稿，其中有他给以敌视苏联著称的美国作家贝洛的信的副本。斯涅吉廖夫在这封信中请求贝洛帮助他与美国驻基辅领事建立联系，并在国外发表他的诽谤文章中的一篇。”<sup>③</sup>

20世纪60-70年代，泛俄罗斯主义在苏联抬头，并形成了带有政治性质的地下组织。“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就是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在组织中和社会上散布对苏联当局的不

---

① [苏]斯涅吉廖夫：“就放弃国籍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1977年7月29日）No06175”，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373-374页。

② [苏]安德罗波夫：“关于制止斯涅吉廖夫犯罪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7年9月19日）No06174”，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375页。

③ [苏]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斯涅吉廖夫案件侦查过程的报告（1977年12月2日）No06176”，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377-378页。

满情绪。1967年12月，列宁格勒市判处了5名自称是该组织首领的人，他们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次年3月14日-4月5日，列宁格勒市又对17名参加者进行了审理并追究刑事责任，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有固定公职，且基本都属于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共青团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根据苏联对该组织成员的审理材料，在国外发表文章，抨击苏联政权侵犯公民信仰自由。苏联相关档案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有关这些案件在国外流行的某些传闻，都是外国资产阶级记者所杜撰的，这些记者采用了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西方新闻界提供的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并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情报。”<sup>①</sup>虽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承认国外记者报道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负面报道仍然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内一些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自称是“俄罗斯语文学家”，在倡导“为拯救俄罗斯民族而斗争”的口号下，从事反苏活动。“外国意识形态中心、侨居国外的反苏组织、以及资产阶级的大量宣传工具的积极挑唆和鼓励，使这种倾向得到了发展。敌人的间谍机关已经看出了在这种倾向中存在着在苏联社会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性。”<sup>②</sup>因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打着保卫俄罗斯文化、古代文献，维护俄罗斯法律的旗帜，他们的反苏活动更具有隐蔽性和号召力。因此“驻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代表处对这个阶层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其中，美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加拿大的大使馆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积极性。这些国家使馆的工作人员竭力与这些所谓的‘俄罗斯语文学家’们进行接触，以获取感兴趣的情报，并弄清楚，什么人可以为他们所利用来从事反动活动。”<sup>③</sup>通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俄罗斯语文学家”的参与人群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人与法》杂志的主编，苏共党员C.H·谢马诺夫，他主张同国家政权进行斗争：“和

---

① [苏]安德罗波夫：“关于审理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成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4月16日）No04564”，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223页。

② [苏]安德罗波夫：“就伊万诺夫和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3月28日）No04565”，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224页。

③ 同上，第224页。

平征服人们心灵的时代已结束。革命的时代已来临……应该转而采用斗争的革命方法……如果我们不自己起来进行反抗，那么我们会灭亡。”<sup>①</sup>像谢马诺夫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希望利用的人，因为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让这类人现身说法，与共产主义和苏联政府相抗衡，这不仅能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土的假象，更有利于证明苏共内部早已腐朽不堪，提供了在最大限度上迷惑苏联民众的思想并影响其行为的可能性。

## （二）苏联对外文化宣传由盛转衰，处于被动地位

苏联自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斯大林打造的铁幕曾使苏联在与美国的文化较量中占有先机，但当这种固步自封的平衡被打破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错误理解所带来的问题集中显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联当局文化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高涨，为美国文化入侵创造了条件，最终使苏联主流政治文化让位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为苏联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的倒塌埋下了伏笔。

### 1、铁幕之下苏联文化宣传强势掌控全局

二战结束后，苏美之间共同利益逐渐减少，分歧与日俱增。1946年，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文，首次提出了遏制苏联的策略，丘吉尔的《和平砥柱》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美国的国策。自此，原为反法西斯同盟阵营中最重要的苏美两个大国，走上了对立的冷战之路。斯大林开始精心打造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入侵的铁幕。在文化宣传方面，对内注重保持苏维埃政治文化的纯洁性，对外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版反对美国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反美宣传的领航任务落到了联共（布）中央宣传

---

<sup>①</sup> [苏]安德罗波夫：“就伊万诺夫和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3月28日）No04565”，载沈志华、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0卷），第226页。

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的肩上，它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和监督实施，而执行任务的是各级党政机关、通讯社和出版机构。他们利用报纸、杂志、广播和文学作品等构建苏联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抨击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揭露其反共反苏活动。这一时期苏联对美国的文化宣传成效显著，斯大林亲自组织编写、出版于 1938 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Shor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此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材，在全球的流通量达到 41,000,000 册，是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在美国的书店里售价为 1 美元，纸张考究，印刷精美，非常受欢迎。面对苏联来势汹汹的政治文化宣传，美国用斯蒂芬·波索尼（Stefan Thomas Possony）所著的《一个世纪的冲突》（A Century of Conflict）予以反击。该书从反共反苏的角度，撰写共产党的历史，售价 7.5 美元，但其在美国和全世界的销售量不到 6000 册，<sup>①</sup>没有起到反制苏联的预期效果。这一时期，苏联捕捉美国异常意识形态作品的观察力也颇为敏锐，1948 年，当得知美国时事评论家斯基尔（Стил И.）所著的有关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元内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在美国被禁止出版时，苏联立即私下运作，计划先由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然后再翻译成俄语发行，这样可以巧妙地避免出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局面<sup>②</sup>。1949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用英、法、德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突击出版《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sup>③</sup>。该书的作者安娜别尔娜·比卡尔（Аннабелла Бюкар）曾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信息处的工作人员，因爱上了俄罗斯男高音演员，而决定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著书揭露美国间谍活动与反苏阴谋。苏联大力支持此书的出版，目的是要影射“遏制”战略的提出者、时任美国驻苏外交代表的乔治·凯南。同年，作家什巴诺夫（Шпанов Н.Н.）

---

① “Report details an overview of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and its basic principles on U.S. foreign policy,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U.S.S.R., and the U.S. government support of its many departments”, Jun 29, 1953, CK3100094653, DDRS.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издания в СССР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адиокомментатора И. Стила, 24.01.194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55.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выпуске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книги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 11.03.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20.

揭露英美操控二战且准备发动下一次世界大战阴谋的著作《战争贩子》（Поджигатели）也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在这一年被批准出版的还有作家马克·威廉姆斯（Мак Вильямс）的《哀伤之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sup>①</sup>、揭露美国工人阶级和黑人生活现状、抨击“美国生活方式”宣传虚伪性的书籍《美国的劳动与资本》（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sup>②</sup>以及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地缘政治学说谋求全球霸权扩张计划的著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sup>③</sup>等。可见1949年是苏联对美国进行文化宣传的巅峰之年，这一时期，苏联牢牢地掌握了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动权。外来文学作品被严格地阻挡在苏联国门之外，美国希望用文化渗透的方式侵蚀苏联人民思想的计划全盘落空，仅有反映美国生活的杂志《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在1942年被苏联政府允许发行，但就连这一点可怜的宣传机会也于1952年被苏联政府剥夺了。其原因是有读者来信反映第46期《美国画报》用“逼真的图表，虚构的数字与事实，将美国描绘成天堂（рай）和理想中的黄金国（Эльдорадо）”<sup>④</sup>，企图用虚假的宣传迷惑苏联读者。可见当时美国对苏联的文化宣传处于弱势和任苏联摆布的状态。

## 2、和平攻势撼动了苏联文化宣传的优势地位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掌握了苏联政权，他主动向美国示好，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三和政策”。在一改过去苏联对美国一脸阶级斗争面孔的同时，也替美国人拉开了斯大林打造的抵制文化入侵的铁幕。苏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美国终于等到了对

---

①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К.Мак-Вильямса «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 17.05.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60.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б издании книги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 22.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0.

③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б издании книги Ю.Н. Семенова «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22.06.1949//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1.

④ Письмо читателя журнала «Америка»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разоблач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жизни», 24.05.195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46.

苏联实施文化渗透的机会。由于斯大林时期美国长期在文化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出于对苏联文化宣传材料迅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模式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的担忧与惶恐，迫使美国潜心研究针对苏联的文化对策，成立了学说项目组，注重对社会科学研究，在学说领域的框架下优选送往海外发行的图书，系统、全面、“科学”地批判共产主义的矛盾和弱点<sup>①</sup>。同时在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政府组织和自由民众行为等方面诠释自由的历史进程<sup>②</sup>。这无非是要宣传以美国为主导的社会思想与价值观。1954年9月，“学说项目”更名为“意识形态项目”。美国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图书的传播工作，“强化支持和信仰自由世界的根本原则，使保持中立和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坚信，自由社会能够满足和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共产主义环境会封杀和毁灭这些愿望”<sup>③</sup>。美国通过多年的努力，万事俱备，此时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正好给美国吹来了对苏联进行文化渗透的东风。通过苏美双方协商，1956年10月《美国画报》在苏联境内重新发行，作为交换条件，《苏联》（USSR）杂志创刊并打入美国市场。该杂志于1965年1月更名为《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这两份杂志都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才停刊，扮演了双方互相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角色，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文化冷战中最有力的宣传工具。《苏维埃生活》由苏联新闻社（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出版，很多文章来源于《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是政策性和政治性极强的刊物。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加强了该杂志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从1964年12月到1976年2月，设立了“关于共产主义问题”（Questions On Communism）专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了对抗美国关于苏联“排犹主义”的宣传，1965年4月，《苏维埃生活》以图文形式宣传苏联犹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发表了题为“犹太人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The Jews）的文章，并将犹太人家庭过宗教节日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上进行佐

---

① “Production of effective materials for a U.S. doctrinal program detailed”, May 5, 1953, CK3100335106, DDRS.

② “USIA procedures to carry out 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 plan for a ‘U.S. Doctrinal Program’”, CK3100003406, DDRS.

③ “Memo outlines a plan of oper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deological program through information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Dec 15, 1954, CK3100114249, DDRS.

证。杂志还设立了“问与答”(Question And Answer)专栏,用以解答美国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有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与苏联人权状况相关的问题,刊物很少回应。《苏维埃生活》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但是它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了加强报道深度和宣传效果,杂志需要接受苏共中央宣传部的严格监督,因此时效性不强。其次,流通量不大,其写作和编辑方法陈旧,并拒绝美国官员提出的改变内容和风格的建议。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拥有的读者并不多,在美国每年的发行量为6万册,另外苏联大使馆还赠送给美国2000册,这样的数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影响力。再次,没有获得期待的定位人群的消费。“苏联政府将西方的读者确定为左翼人士,但实际上杂志的读者多为对科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很多大中学校图书馆也订阅这份杂志”<sup>①</sup>,因此苏联希望通过该杂志汇聚宣传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的设想未能实现。第四,过多的政治宣传使美国读者不满,杂志上经常全文转载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有读者来信表示,“杂志长篇大论的演讲等文章很无聊,杂志可以做摘要处理,因为它的读者是美国人。”<sup>②</sup>有些读者提出,他们反对这种“将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答案”的宣传,甚至有读者要求退还订阅费,不再订阅《苏维埃生活》杂志。<sup>③</sup>第五,杂志存在明显脱离实际的宣传。例如1965年2月的《工作日与共产主义》(The Working Day and Communism)一文的插图上,一个穿着讲究的裁缝在漂亮的起居室沙发上看报纸。文中描述了很多苏联工人每天仅工作7个小时,闲暇时间可以读书看报、参加职业培训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等。<sup>④</sup>这遭到了美国读者的质疑,认为画面上的富裕绅士不可能是个裁缝。以上的诸多问题使《苏维埃生活》的可信度和宣传有效度明显降低。当时苏联正沉醉于自己打造的国际“和平”氛围中,对其他文学作品和对外文化宣传项目的研发上不够积极主动,另外,苏联国内和被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明显站在了苏联当局的对立面,流失了大批知识精英和左派文人的苏联从原有的优

---

① The Editors, “40 and Counting: Four Decades of Russian Life”, *Russian Life*, October 1996, p.4.

② “Readers’ Letter”, *Soviet Life*, Feb.1976, No.2, p.42.

③ “Readers’ Letter”, *Soviet Life*, May.1979, No.5, p.43.

④ Stanislav Strumilin, “The Working Day and Communism”, *Soviet Life*, Feb.1965, No.2, pp. 21-25.

势位置上跌落下来，逐渐失去了对美国进行文化宣传的主动权。

### 3、苏联文化政策的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斯大林时期发动的文化冷战，是借助于报纸、杂志、书籍等媒介，有选择地进行宣传报道来影响苏联民众的思想，大力提倡爱国主义，一再发动反美高潮，在苏联人民的心理上强化了“美国是苏联的敌人”的思维定式，并尽一切可能丑化这个敌人的形象，在民众潜意识中树立了对美国的认知：“经济危机前的状态、垄断统治、法西斯主义、文化和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堕落、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种族歧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科学、媒体腐败、犯罪率增长、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为达成此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盟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必然导致的分裂”<sup>①</sup>。当时苏联民众处于与外界高度隔绝的政治环境中，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通过垄断的媒体宣传及行政手段影响受众的价值观，一方面实现了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的营造，另一方面利用反美宣传在民众心目中完成了“敌人”形象的构建，<sup>②</sup>使苏联民众普遍对美国产生了厌恶与憎恨，并认同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及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再也无法保持在全面封闭的情况下进行宣传的模式，苏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普通民众对美国的认知逐渐清晰和完善，心目中中原有的敌人形象也渐行渐远。更多苏联民众渴望了解美国，苏联人争相购买《美国画报》，使其在黑市上的价格被炒高了两倍，可见苏联民众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品质的向往，以及对西方流行文化的热衷。

但是苏共领导人依旧简单和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把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完全割裂开来，只注重文化的阶级性，忽略了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差别与对立，一味抵制资产阶级文明，忽略了文化传承与交往规律，违背了列宁“文化革命”的真正意图。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超阶级和纯粹的阶级文化，共产主义文化既是从资产阶级文化中孕育而来，又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两者

<sup>①</sup> Фатеев 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С.5.

<sup>②</sup>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Редкол.:...А. О. Чубарьян (отв. ред.) и др. М.: ИВИ РАН, 1997. С.169.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苏共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的误读和曲解，造成了苏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对持不同政见者都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压制。苏联官方坚守狭隘的文化观，扼杀流行文化，原本的出发点是要维护本国文化和政治安全，坚持国家主导文化市场。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世界性的文化市场早已形成，拒绝流行文化使苏联文化失去了活力。官方一贯干预文化发展，束缚作家用创新思维自由探索艺术发展道路，打击了作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本应多元化发展的苏维埃文化固守在一元化的模式中，文化危机也随之浮出水面，使枯燥、程式化的苏维埃文化无法与生动、魅力四射的美国文化相抗衡，在文化软实力上败下阵来。

在苏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不同声音，对苏联主流政治文化产生了质疑。一些著名的知识精英开始著书立说，表达自己异于官方的思想和观点。任何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都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角色，他们拥有话语权，对文化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文化核心竞争力不可替代的基本要素。虽然知识分子不能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但是却有着自身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如果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与这一群体的价值观一致，就会促进文化发展，保证文化安全，否则，知识分子群体将会进行抗争，阻碍文化的发展与安全。伴随着苏联当局的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打压政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高涨起来，产生了对苏维埃文化的离心倾向，外部通道被打开，苏联主流政治文化受到侵蚀，加速了政治转向。长期以来，苏联混淆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用政治批判取代对真理的探讨，使人不敢说实话。但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大胆地站出来，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作为代价换取讲真话的机会。一部分人指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他们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希望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但还有一部分思想异动的知识分子属于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加剧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在苏联民众中出现了价值观混乱、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当局没有审时度势地进行文化政策改革，依然沿用斯大林时期的封锁与围堵的做法，来对付挑战苏维埃文化地位的文学作品，对创作这些作品的人实施高压

和迫害政策。这种行为使苏联当局与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之间的苏联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广受国际关注的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扩大了阶级斗争的打击范围，这不仅没有削弱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反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斗志，在国内产生了更多的追随者，并得到了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苏美之间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的文化较量，最终以美国胜利、苏联失败而告终。苏共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的误读、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过于教条和保守，严重影响了苏联文化软实力发挥正面效应。这使得美国有机会以全方位、大规模、多角度的方式对苏联开展文化渗透活动。美国以实力雄厚的资本为后盾，不惜重金，长期以星火燎原之势对苏联社会思想产生影响，攻破了苏联的意识形态防线，使苏联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动摇了苏维埃文化的主流地位。文化软实力的缺失逐渐从内部瓦解了苏联的政治体制。

---

**【Abstract】**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alt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still been at the “cold war” against each other, yet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relatively “thawed out”. This situation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U.S. ideological penet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and took advantages of Soviet dissidents, proactively propagating capitalist values through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PSU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and suppression of dissidents. However, Soviet Union college students sympathized with and followed these dissidents. Their thought and actions were obviously inclined to the West, leading the Soviet Union into a passive situation and finally to collapse. The results of U.S.-Soviet cultural cold war regarding ideological propaganda is worthy of reflection.

**【Key Words】** Brezhnev Period, Cultural Cold War, Dissident, Soviet College Student

**【Аннотация】** В Брежневский период, хотя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сё ещё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днако 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наблюдалас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разрядка»,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оздала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пользуя поддержку США, как лидирующей западной державы, и советских диссидентов, через культурный сектор СССР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лась пропаганд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ПСС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контроль и подавления диссидентов. Советские студенты, однако, выражали диссидентам сочувствие, их мышление и действия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явно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Запада, СССР оказался в пассив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распался. Между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культурную Холодную войну, результаты которой достойны осмыс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Брежневский период, культурн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диссиденты, советские студенты

---

(责任编辑 黄翔)

## 文艺文献文学：俄罗斯纪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

杜晓梅 王亚民\*\*

**【内容提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C·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无论从国家历史，还是作家的独特经历、作品的主题来看，都与俄苏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在继承俄罗斯纪实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点的纪实文学新体裁“文艺文献文学”。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从文献资料的真实性、灵魂书写视角的独特性、语言创作风格的个性化、主题思想表达的复调性、写作方式的剪辑性以及作者身影的隐现性等六方面，探讨“文艺文献方法”对传统纪实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对纪实文学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C·阿列克西耶维奇 文艺文献文学 纪实创新

**【中图分类号】**D751.2; I511.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6-0149(19)

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列克西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因“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上海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751048）、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上海俄罗斯侨民作家及其作品研究（1920-1950）”（项目批准号：14ZS04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杜晓梅，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博士研究生、陇东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王亚民，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纪念”，获得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曾经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讨论热潮。有人从她的创作与俄苏文学联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她是“苏联文学的延续”<sup>①</sup>，“继承了俄语文学创伤书写的既有传统”<sup>②</sup>，“续写了俄语文学的辉煌”<sup>③</sup>；有人从纪实性的特点着眼，赞叹她是“人类命运的真实记录者”<sup>④</sup>，有“震撼心灵的真实”<sup>⑤</sup>；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抛开诺奖，C·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就是二流水平”<sup>⑥</sup>，“争议性太大”<sup>⑦</sup>。尽管有学者提出质疑，但绝大多数学者给予了C·阿列克西耶维奇高度评价，肯定了作家在继承俄罗斯、苏联文学传统和在纪实文学创新方面做出的贡献。

本文将从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文艺文献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sup>⑧</sup>对俄罗斯纪实文学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对作家创造的纪实文学新体裁——文艺文献文学进行解读，同时论证她对俄罗斯纪实文学的发展与贡献。

---

① 何可人：“阿列克谢耶维奇中文译名：她是苏联文学的延续”，凤凰文化，2015年10月8日，[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09\\_7188035.htm](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09_7188035.htm)

② 朱研：“中文译者谈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伤书写——以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为中心”，《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第96页。

③ 于清明：“阿列克谢耶维奇：续写俄语文学辉煌”，搜狐公众平台，2015年10月10日，<http://mt.sohu.com/20151010/n422854520.shtml>

④ 赵国柱、赵如泉：“阿列克谢耶维奇：人类命运的真实记录者”，《世界文化》，2015年第11期，第7页。

⑤ 晴朗李寒：“我译阿列克谢耶维奇：震撼心灵的真实”，中国作家网，2015年10月14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5-10-14/83301.html>

⑥ 张知依：“学者：抛开诺奖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就是二流水平”，北京青年报，2015年10月16日，[http://epaper.yinet.com/html/2015-10/16/content\\_159380.htm?div=-1](http://epaper.yinet.com/html/2015-10/16/content_159380.htm?div=-1)

⑦ 柏琳：“专家谈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很奇怪 争议性太大”，《新京报》，2015年10月9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09/content\\_601632.htm?div=-1](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09/content_601632.htm?div=-1)

⑧ 关于C·阿列克西耶维奇纪实小说的体裁名称，叫法不一，有人称为“文献文艺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参见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 <http://www.ijp.ru/razd/pr.php?failp=12600801497>；也有人称为是“文献文学”，参见：C·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乌兰汗、田大畏译《锌皮娃娃兵》，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作家在博客和受访文章中多次强调指出，自己创造的这种纪实小说的写作方法为“文艺文献方法”（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етод），参见 [http://www.alexievich.info/biogr\\_RU.html](http://www.alexievich.info/biogr_RU.html)，故本文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小说体裁名称应为“文艺文献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一、白俄罗斯文学抑或俄罗斯文学

关于C·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的归属问题，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俄罗斯和作家的祖国——白俄罗斯，一直以来都颇具争议。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厘清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白俄罗斯文学这三个重要概念。苏联文学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自1917年11月7日至1991年12月22日间的文学的总和”<sup>①</sup>。随着苏联的解体，其文学也成了历史。俄罗斯文学，又称俄国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一样，是本国人民有史以来创造出的一切文学的总和。

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些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则会产生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多次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由它们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造成的。首先，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是苏联文学的一部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苏联文学的概念大于俄罗斯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其次，俄罗斯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在苏联文学建立之前就已存在，在苏联解体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并独立发展，因此，我们又可以将苏联文学视为它们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俄罗斯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的概念又大于苏联文学的概念。第三，俄罗斯文学在苏联文学的构成和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对苏联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在苏联时期，白俄罗斯文学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巨大影响下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这种影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难以在短期内消亡。第四，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学是其文学衣钵的主要继承者，学界和读者也经常将二者对等起来。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文学的概念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而俄罗斯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则更侧重民族性质。由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在政治上保持了独立，但在文学、语言、艺术等文化传统和精神心理方面仍联系紧密，同时带有深深的苏联印记，正如C·阿列克西耶维奇所说：“国家变了，特

---

<sup>①</sup> 刘文飞：“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苏联文学联刊》，1993年第2期，第55-56页。

征留下了”<sup>①</sup>。

因此，可以说，С·阿列克西耶维奇是一位书写苏、俄的白俄罗斯作家。现实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所以，她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大多是亲历事件和灾难的白俄罗斯人，从他们个体的微观视野去认识世界，通过他们的心灵去揭示那些最伟大、最能触及人的灵魂的东西。但同时，她是作为一位苏联作家、记者走上文坛的，历史又决定了她曾是苏联那代人的一分子，她反映的中心主题又是自己所经历的苏联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如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战争中沒有女性》和《最后的证人》，描写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记事》，关于苏联解体的《死神的召唤》，以及描写苏联解体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俄罗斯及其普通人在迷茫中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二手时间》。因此，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名字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红色人”、“红色事件”等描写苏联历史事件和灾难的纪实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些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很难把С·阿列克西耶维奇同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割裂开来。

俄罗斯文学家普遍认为，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学的光荣传统”<sup>②</sup>。我国学者刘文飞也指出，“某些作家在解体后的创作，因其主题和风格，使我们有理由仍将其视为苏联文学的延续”<sup>③</sup>。笔者认为，С·阿列克西耶维奇应当属于这“某些作家”中的一位，其文艺文献文学（小说）根植于俄罗斯文学的深厚土壤。

所谓“文艺文献文学”，是纪实文学体裁的一种，它再现了历史事件和重大社会现象的真实信息，是对战争、事故、灾难等事件参与者和幸存者心灵陈述的记录和讲述观察的结果，让读者形成对事件新的哲学史观的一种纪实文学。一方面，通过作品让读者“形成对事件的新观点。……创建一种对事件的新的哲学史观”<sup>④</sup>。另一方面，描述事实真相，通过历史悲剧事件的

---

①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А. В поисках веч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0. №.1. С.37.

② Сайни Сону, Дели, Индия. С. Алексеевич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 <http://www.ijp.ru/razd/pr.php?failp=12600801497>

③ 刘文飞：“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第55-56页。

④ Адамович А. Гранин Д. Главы из блокадной книги// Новый мир.1977. №.12. С.27.

文献记录以期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在俄罗斯，出现过众多需要诚实描述事实和真相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卫国战争、大清洗运动、劳改营、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为纪实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艺文献文学”正是在继承这种体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二、俄罗斯纪实文学叙事传统的继承

众所周知，生平、自传、记录、信件、自述、回忆录、游记等体裁的纪实文学早已存在，这些文学作品以记录的方式表明了描述事件的真实性，由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自出现以来就深受读者的喜爱。早在18世纪末期，俄罗斯就出现了这种文学，例如А.Н·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Н.М·卡拉姆津的《我的自白》（1802）、А.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真正的俄罗斯纪实文学的产生是在19世纪后半期，С.В·马克西莫夫的《西伯利亚和苦役》和П.Д·博博雷金的《在巴黎的废墟上》（1871）就是标志。<sup>①</sup>尤其是后者，除了具有纪实性特点之外，还谴责了巴黎公社覆灭时的血腥和杀戮，“博博雷金是个有良知的作者，他的小说为时代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报纸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说明俄罗斯“评论界开始把纪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和美学问题并给予广泛研究，将事实作为‘现实的文献’在文学的体裁和文体层面上开始重新建构”<sup>③</sup>。可以看出，在俄罗斯纪实小说发展初期，“历史”和“事实”是其主要特点，相继出现的大量纪实文学作品，也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А.П·契诃夫的《萨哈林群岛》（1892-1894）、В.Г·柯罗连科的《帕夫洛夫斯基随笔》（1890）和《在饥饿年代》（1893）、Н.Г.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农村若干年》（1896）等就是政论的记录，而Г.И.乌斯宾斯基的《试验随笔》和П.Д·博博雷金、Д.Н·马明—西比利亚

---

① Местрегази Е.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он-фикшн/non-fiction. Москва:Совпадение, 2007. С.11.

② Шапочка Елизавета, Чехов А.П. и писател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Суворин, Боборыкин, Гаршин. <http://chehov.niv.ru/chehov/bio/shapochka-chehov-i-sovremenniki.htm>

③ Козлов Б. Проблема «документ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ьной критике 1890-х годов//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ваново, 1979. С.38-39.

克、А.И·埃特尔的《社会故事》则是关于社会的纪实等。因此，俄罗斯纪实文学一开始就以历史和事实为创作基础的特点，为其形成世界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决定了它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灾难和悲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想表达自己观点、讲出自己所知的真相，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众多以战争为主题和以纪实为特点来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在纪实性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人物的内心感受。把纪实和发掘主人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结合起来，开始具有了文艺文献小说的特点。С.С·斯米尔诺夫在创作《布列斯特要塞》（1957）时，曾访问了有关的见证人和知情者，寻找到布列斯特保卫战的幸存者，在对保卫战真相的艰苦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最终补写了卫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А.И·索尔仁尼琴本人曾在古拉格集中营生活过，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之事提供了证词，进而才创作出《古拉格群岛》（1973）。С.С·斯米尔诺夫创作的长篇小说《无名主人公的故事》、А.阿达莫维奇的《禁书》，以及Е.С·金斯伯的《飙》（1967, 1975-1977）也属于这类体裁的文学。这些作品反映出战后俄罗斯纪实小说的新特点，即对大量的幸存者、见证人进行采访，收集到大量史实、证人证言等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作，记录了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的心声，同时侧重表达出隐藏在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想法。除了具有纪实性特点和史料价值外，关注一个个微观个体的内心感受，对经历过大灾的人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

表现精神关怀和灵魂的复杂性，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是俄罗斯文学独有的灵魂叙事，这为С·阿列克西耶维奇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而А·阿达莫维奇的作品对作家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白俄罗斯诗人弗拉季米尔·聂克莲耶夫认为，“如果说整个俄罗斯文学来自于果戈理的《外套》的话，那么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则来自于А·阿达莫维奇、Я·布雷利和В·科列斯尼克的《我来自烈火燃烧农村》”。<sup>①</sup>作家也指出，自己文艺文献小说的思想直接来源于А.阿达莫维奇的文献小说，并称后者为自己的老师。<sup>②</sup>

---

① 转引自Николай Халезин.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разум и чувства.<http://мос.media/ru/223>

②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Биография. [http://www.alexievich.info/biogr\\_RU.html](http://www.alexievich.info/biogr_RU.html)

因此，可以说，С·阿列克西耶维奇正是在继承俄罗斯纪实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学体裁”<sup>①</sup>——“文艺文献文学”。

文艺文献文学是纪实文学的一种。所谓“纪实文学”是指真实再现事实的文学<sup>②</sup>，真实性是其核心价值 and 生命。但在创作过程中，它却“允许‘或多或少的艺术虚构’，允许使用‘合理的想象’”<sup>③</sup>，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离开作品的叙述，直接发表议论、评判事物、阐发主题”<sup>④</sup>，因此，造成了纪实文学“虚构与写真”、“客观报道与作家的主观渗透”、“非文学化倾向和文学化倾向”的矛盾，出现了“注重新闻性，忽略文学性”、“注重功利性，偏离了审美价值”、“失真、媚俗、缺乏艺术个性和史传意识”等一系列问题<sup>⑤</sup>。而在文艺文献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创作语言和资料都来自受访者，创作建立在完全真实、客观的资料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真实”与“虚构”这个影响纪实文学发展的核心矛盾。然后，作者通过筛选和剪辑的方法，努力使语言简练精悍。在解决“历史记录”与“文学创作”之间矛盾的同时，又将文献和资料统一于作品的中心思想之下，成功地将作者的思想隐藏于完全客观的资料之中，也较好地解决了“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矛盾。文艺文献文学的这些特点，解决了纪实文学创作中的上述难题，创新了纪实文学的体裁。但作者并未停留在文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上，而是意图引起读者“对保存在人们——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具体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某些人——灵魂深处、曾亲历过、体验过和承受过的一切的理解和领悟”<sup>⑥</sup>，“形成对事件的新观点。……创建一种对事件的新的哲学史观”<sup>⑦</sup>。《切尔

---

① 田洪敏：“倾听心灵的声音——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5期，第5页。

② Местрегази Е.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он-фикшн/non fiction. С.36.

③ 任遂虎：“文学‘真实性’级次辨析”，《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第60页。

④ 张冠华：“新时期纪实文学艺术创新谈片”，《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06页。

⑤ 高翔：“困扰纪实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08-113页。

⑥ Адамович А, Гранин Д. Главы из блокадной книги. С.27.

⑦ 转引自 Сайни Сону, Дели, Индия. С. Алексиевич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

诺贝尔的祈祷：未来纪事》就是建立在完全客观和真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从微观个体及其灵魂书写的视角，意图引起读者对事件原因的拷问和思考。因此，小说的副标题被命名为“未来纪事”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寓意的。

“文艺文献文学”就是阿列克西耶维奇在继承俄罗斯纪实文学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的纪实文学体裁。2015年诺奖结果公布后，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尼尔斯曾在采访中肯定了作家的创造性贡献，认为她创造了一种新体裁，拓展了文学的形式。

### 三、俄罗斯传统纪实文学的发展

《切尔诺贝尔的祈祷：未来纪事》是С·阿列克西耶维奇“文艺文献小说”的典型代表，也是作家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讲述切尔诺贝尔核灾难、描述灾难过后人们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现实的作品。它在继承传统纪实文学“真实”与“客观”的同时，在创作方法上具有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形成了全新的“文艺文献方法”，主要体现在“完全真实的文献资料”、“被发掘的微观心灵”、“简练精悍的个性化语言”、“主体思想的隐秘表达”、“文献与小说的有机结合”和“统领全局的隐形作者”等六个方面。

#### （一）人物与文本——真实的历史存在与艺术的再加工

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艺文献文学是由很多人讲述事件构成的历史，因为她认为，“独立的个人来自于宏大的历史并再次走向微观，走入自己的生活”<sup>①</sup>，作家首要的工作就是如实记录。因此，她的作品中没有主人公，只是去记录众多微观个体的谈话，表现众多灾难受害者的声音。《切尔诺贝尔的祈祷：未来纪事》主体部分全部由微观个体的口述实录构成。第一章“死人的世界”，是父亲、母亲、撤离区居民、邻居、心理医生等直接受害人的见证；“活人的世界”体现的是教师、清理人员、记者、议员、医生等间接受害者的心声；在第三章中，核工程师、化学家、历史学家、前核能研究所

---

<sup>①</sup> Ядвига Юферова. Почему люди говорят ей то, чего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други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0 мая 2008.

主任、环境检测员等专家学者和地方官员等政府代表讲述了灾难发生时的所闻、所见和所思。

小说还列出了 98 名受访人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地址等真实信息，只有 5 名受访人没有信息或信息不全。但他们并不是作家的虚构，而主要是由于受访者不愿列出全名，或由于“受访对象不愿意让人提及他的真实姓名”的缘故<sup>①</sup>。因此，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他们的叙述就是作品的叙事。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撤离区居民、清理人、消防员等直接、间接受害者，从普通受灾民众的微观视角讲述了核灾难爆发的现场以及灾后救援的状况。如果说这是从微观的视角对灾难现场报道和灾后生活的内心感悟的话，那么第三章中的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前办公室主任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和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等掌握苏联核灾难第一手秘密资料的权威科学家，以及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娜塔莉亚·阿尔谢尼耶夫娜·罗斯洛娃，前苏共斯塔夫哥罗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弗拉季米尔·马特伊维奇·伊万诺夫等掌握前苏联政府机密的高官们的讲述，则是在宏观层面上对党和政府对灾难的认识态度和实施救援方面的陈述和思考。因此，作者从微观个体的心灵感受和对国家政策上的宏观思考两个方面的资料证明，1986 年发生在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城的那场事故，不仅仅是一次核灾难，更是一场战争之上的战争、一场人祸造成的人类悲剧。

资料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创作语言上。98 位受访者的故事构成了《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的全部情节。而文本的语言，甚至高度概括主题和思想的故事标题，都来自于受访者，例如，“孤独的人类之音”、“死人的世界”、“一生写在门上的人”、“没有歌词的歌”等。当代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安宁斯基指出，“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小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文本用他人的语言创作而成”<sup>②</sup>。从统计来看，《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超过这个比例，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而其余百分之零点五

---

①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Беседа вела Татьяна БЕК//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6. №1. С.218.

② Аннинский Л. Оглянуться в слезах, Боже и человечье в апокалипсисах Светланы Алексиевич//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8. №8. <http://www.alexievich.info/artikl/Anninsky.pdf>

的文本也都由客观资料构成的。首先是小说开始的“历史背景”，作者引用了《白俄罗斯百科全书》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介绍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统计数据、明斯克萨哈罗夫国际辐射生态学院在《切尔诺贝利灾变的影响》中对世界范围核扩散的记录、以及1996年4月的《星火》杂志第17号对石棺的危险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报道。而作品中关于受访者的详细资料、偶尔对受访对象和环境的客观介绍，如受访对象是“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sup>①</sup>，讲述者“停顿片刻”（116），“她哭了”（196）等，是构成百分之零点五的另一部分。从这里不难看出，小说所有的创作语言和资料都是客观的，文献的真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者自始至终未对任何人物和事件进行任何议论和评价，这是文艺文献文学真实性的一种体现。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C·阿列克西耶维奇全程保持沉默，把所有的话语权交与讲述人和客观资料。因此，她只是一名旁观者，以口述和记录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非虚构”的“真实”世界，但却取得了比虚构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效果。难怪在作家获奖之后，《纽约客》也认为这是“非虚构战胜了诺贝尔”<sup>②</sup>。

文艺文献文学利用客观资料和受访对象的原语言进行创作，使其文献资料的真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较好地解决了纪实文学创作中“真实性”和“虚构性”两难的矛盾，是在文献和资料处理上对纪实文学创新的重要表现。

## （二）感受与心声——被发掘的行为与动机

文艺文献文学要做的不只是记录史实、证言、证词，而是让讲话者自己说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即作家不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只是尽力地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他们潜意识中的实质。C·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

---

① [白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方祖芳、郭成业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6月，第182页。以下出自该著的引文，只在句后注明页码，不再一一注释。

② 转引自美图：“肖像 阿列克谢耶维奇”，新京报，2015年10月10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10/content\\_601695.htm?div=0](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10/content_601695.htm?div=0)

“强调事实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我写的不是那些我们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的历史，即事实和事件的概念，而是这种微空间……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们经历过革命、战争、切尔诺贝利等大型历史事件，其影响已深入他们心灵深处。我要记录那些刻在他们本身、感觉和思想深处的东西，并通过众多个体的微视角反映出来”<sup>①</sup>，“从事实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sup>②</sup>。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灾区居民、消防人员、士兵、医生、记者等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的父母、妻子、儿女等间接受害人，讲述了自己亲历的灾难和遭遇，“每天充斥着政治座谈会。我们一直在被告知将会取得胜利。对谁取得胜利？原子吗？物理学吗？还是宇宙？……生活就是战争。”（080）他们发出了深埋于内心的呐喊，“到处是坟墓”（052），“另一个世界怎么能容得下所有的灵魂”（053）。而对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检测的工作人员，从事相关核研究的科学家、学者等科研工作者，以个人的微观视角讲述了核悲剧过后的个人世界，吐露了隐藏在他们心中不敢、也不曾说过的体验和感受。“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却要保守秘密，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182），“原子代表着我们的青春，……航天飞机就像孩子一样，是我们的未来。不过我自己都不愿相信这个观点。”（202）也有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评论，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人到受过良好教育的核专家，他们对惨祸发出了启示录般的呼声，“究竟谁该为这一切负责……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那些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过，那些学者同样是受害者”（133）。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起不幸事件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以及“……核弹，在人们还没明白它是什么之时起，就已经生活在后核战时代了”的严厉警告<sup>③</sup>。《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就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放射现象对人们及其心灵带来的毁灭和严重影响，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扇窗户。

---

① 转引自 Saxena R. Я – историк крас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Window into Russia: Art and society in the XXI Century. INDAPRYAL. New Delhi. 2010. С.75.

② 转引自 Ядвига Юферова. Почему люди говорят ей то, чего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другим//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0 мая 2008.

③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Биография.

文艺文献文学从“灵魂书写”的视角，记录了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一类人的命运。作者就是想让读者在阅读中体味人物的感受和心声，重新形成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观点，为纪实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书写视角。

### （三）人物语言与创作语言——简练精悍并具个性化

文艺文献文学在记录和展现众多人物微观心灵的同时，作者对叙述者的文体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保持了他们原有的语言和风格。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灾区的儿童看到“云很黑，雨很大。积水是黄色和绿色的”，“意外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从我们镇上消失了。……金龟子也不见了，他们没有再回来”（248）。历史学家认为，“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吗？……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193）。母亲则“跪下来求你，拜托你帮我们找安娜·苏什科。她驼背，今年六十岁……。她不会说话，痛苦的时候就唱：啊—啊—啊”（058）。戈梅利那诺夫连斯克区别雷贝拉格村村民“只有一头牛，我可以将它交出来。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打仗，我讨厌战争”（052）！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能识别人物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年龄等相关特征，儿童、历史学家、母亲，普通村民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通俗易懂的谈话体和个性化的语言，符合某一类特定人群的表达特点，使人对那个时代和社会有符合客观现实的真实认知。

C·阿列克西谢耶维奇的访谈对象大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而文艺文献文学的创作语言全部建立在人物的谈话之上，她是如何处理史料记录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呢？作者说，在将受访对象的思想提炼形成访谈主题后，以“尽量精练、类似警句、绝对准确”为原则，对人物的话语进行筛选。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不仅每个故事的标题，如“一生写在门上的人”、“没有歌词的歌”、“生活中为何不能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高度概括，简练而引人深思，而且人物语言表达也精炼简约，如“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023），“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到处是坟

墓”（052），“明白事理的是人，它们只想生存，‘会走动的骨灰’”（108），“我是切尔诺贝利的刺猬”（109）等警句式的语句贯穿始终，精炼准确并具个性化，形式简练却表意丰富，具有民间创作的语言特点，这都是作家筛选的结果。因此，这样的语言风格既突出了作品的思想主题，同时还保持了文献的真实性和人物的个性化，又具有颇高的文学性，较好地解决了纪实文学对“客观性”“非文学化”的要求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文学化”倾向之间的矛盾，是文艺文献文学对纪实文学在创作语言上的重要创新和贡献。

#### （四）内容与主题——禁锢与异化的艺术表达

C·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艺文献文学关注的是其他人不能表达和说出的东西，为了表达的艺术性和保持作品的思想创意，她把内容置于所选主题之下，力图在事实和文献的体系化与概括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从根本上说是对异化的揭示，是对自然的异化、人的异化、思想的异化的艺术表达。在“死人的世界”中，灾难后的切尔诺贝利就像“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逃，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只剩下蚂蚁，其他飞禽走兽都死绝了”（048），自然异化了，灾区居民、救援人员时时处处“和死亡生活在一起”（097）。人也异化了，在“活人的世界”中，“爱人也是一种罪孽。……生小孩会是一种罪”（116），切尔诺贝利人“就像一个新的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135）。而对辐射的“测量”、政府的“政策”、党的“指示”，则是“出人意料的哀伤”的“答案”。环境和身体的异化造成的伤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而思想异化所造成的灵魂的扭曲和心灵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弥合，更具毁灭性。

灵魂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思想的异化上。幸存者无法选择的有被意识形态异化了的自由和被迫接受的“欺骗和谎言”，也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不会有危险’”（084）。国家意识形态不仅淹没了微观个体的思想和灵魂，就连生命也是不自由的，“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他们想拿什么？我的灵魂？因为我只剩下灵魂了。”（033）对生命的漠视使人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权利，

思想的异化直接抹杀了个体，“唯一没变的，是人的苦难”，“苦难是我们的象征”（153）。灵魂出窍、只剩躯体是个人及其灵魂被异化的突出特征，它不仅危害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存在，而且也会摧毁人类和未来，“去过切尔诺贝利多次之后，所有的事物开始瓦解，我的过去再也不能保护我，我得不到答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未来摧毁我，不是过去”（028）。生命的信仰作为精神的能量完全是其个体内部的东西，而一旦这种信仰被蔑视，灵魂被异化，一切将被摧毁，包括国家、人类和未来。

然而，作家对于异化并未直接表达出来，而只是对受访对象的心声进行如实的记录，目的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并形成自己对灾难的思考和认识。重要的“不是选择事实，而是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新认识，从每一个主人公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不是老生常谈的，而是新的感觉、细微差别和细节。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对事件的哲学观”<sup>①</sup>。《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反映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及灾难之后众多微观个体的承受和隐忍，以引起读者对“我们是什么”，“曾经经历了什么”，“如何去应对”，以及“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从而从不同的视角对灾难进行深入灵魂的审视，不断追问个体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反思人的灵魂和永恒的精神，揭示生命本真的价值，从历史的灾难中吸取教训。

C·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艺文献小说由众多微观个体的讲述构成，似乎给人以片断性、互不连接性和局部性之感，但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作者将创作思想融入客观的文献之中，这种“复调书写”的手法，是解决纪实文学创作中“客观性”要求和“主观性”表达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也是该体裁对纪实文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 （五）非虚构与创作——历史文献与小说体裁的有机结合

筛选和剪辑将人物和资料、作者的思想、作品的构思和主题、个性化语言剪辑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作品的主题就隐藏在整个剪辑过程中。因此，筛选和剪辑在文艺文献文学的创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其创作的主要形式。首先，众多的文献资料形成了作者的思想 and 作者对事件的态度。“把资

---

①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Биография.

料集中起来，形成时代的印象”<sup>①</sup>。其次，开始寻找并摘录，对所获文献资料和受访对象的话语，根据章节的主题有所选择和取舍。关于这个问题，作者说：“80 页的资料有时只留下半页。有时可能和某个人谈了一整天，最后只用了一句话。”<sup>②</sup>

出现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的人物只是 500 多受访人物中的一小部分，各个章节就是在他们的故事基础之上建构的。“死人的世界”直击了灾难现场，是直接受害者的遭遇和体验，受害人的亲属、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等间接受害者的感受构成了“活人的世界”；而“出人意料的悲伤”来自工程师、学者、教师、政府官员、环保稽查人员等 33 人对灾难的感受和思考。三章分别在“士兵合唱曲”、“人民合唱曲”、“儿童合唱曲”的合辑中结束，“合体采访”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共同心声，表现了作品的思想。序幕和尾声特点相同，互相呼应。已故消防员之妻的悲伤爱情故事和清理人之妻幸福家庭突遭变故的讲述，自然而然地证明了为什么切尔诺贝利会让我们对这个“美好世界”产生了怀疑，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人物的选择和资料的剪辑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充分表现了作家的思想，同时强化了作品主题。此外，筛选和剪辑还体现在人物语言中，那些既符合作品主题思想和人物个性特点、言简意赅又具有警句般效果的句子就是作家筛选和剪辑的结果，使作品具有了可读性和文学性。

筛选和剪辑将史料和小说创作巧妙结合起来，是文艺文献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是作家进行“复调书写”的有效手段。С·阿列克西耶维奇将电影创作的剪辑手法成功地运用到文艺文献小说的创作中，是对纪实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又一次创新。

#### （六）叙述者与创作者——显形人物与隐形人物的共谋

在文艺文献文学中，几乎全部的文本由文献构成，没有描写，没有议论，似乎不见作者的身影。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除了受访者的讲述之外，剩余部分也全都是引用客观资料和对客观环境的描述，可以说，

---

①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Беседа вела Татьяна БЕК. С.218.

② Там же. С.212.

作者做到了完全的隐身。但她却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题和中心思想的确定、文献资料的选择、人物及其语言的筛选和剪辑、角色和环境的统筹和描写等方面。

首先，异化对个体的摧毁和对未来的警示，让读者在阅读中形成对事件的新认识——《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的这一主题和中心思想的确定与众不同。它首先取决于受访文献和资料，其次才是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和构思，作者就隐藏于这一过程中。“资料决定了我的思想和对事件的认识”，也“从不强制资料”<sup>①</sup>，一切取决于材料。然后，紧紧围绕主题和中心思想展开对文献资料的选择。小说以史料开始，“历史背景”列举了白俄罗斯百科全书对核灾难带来的死亡数字和对辐射量的记载，引用了《星火》杂志对目前核反应状况的报道，从而使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灾难性和毁灭性不言而喻。看似客观的资料却是作家精心选择的结果，隐秘地体现了作家的观点。

其次，在人物的选择上，不是所有的受访对象都能进入作家的人物画廊，“那些最震撼人心的讲述者是孩子和普通人，他们还没有受到报纸、质量低劣书籍和人类信仰的影响。他们是纯洁的、无辜的，讲述了别处不存在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sup>②</sup>，他们才最能体现作家的思想和主题，如一线消防员、撤离区居民、普通村民、受害人的父母亲和妻儿、幼儿园的儿童等。作者再根据需要把它们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作为表现主题的一个部分。从灾区“回来的人”讲述了他们“和活人死人都聊些什么”，“辐射长什么样”，“没有歌词的歌”和“关于家园的独白”等灾难的“死人的世界”。“活人的世界”就是“谎言和真相”，记录了现实“新国度”的“人民的声音”。在“出人意料的悲伤”中，“回忆”了“测量”、“昂贵的萨拉米香肠”、“死亡的阴影”和“畸形的婴儿”，从“铲子和原子”、“苏联政府护卫者的独白”、“对物理学的热爱”中揭示出“政策”和“指示”的“答案”。把人物和记录从点连成线，最后统一在作者的主题和思想下。“不仅要找到主人公，还要找到我自己”<sup>③</sup>。正是由于作者这种穿针引线的隐形作

---

①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Беседа вела Татьяна БЕК. С.218.

② 转引自 Сайни Сону, Дели, Индия. С.Алексиевич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

③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А.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С.222.

用，使得文艺文献小说在具有选择性、真实可信性的同时，具有了概括性和文学性的特点，并将创作者的思想和主题贯穿其中。

作者的隐形身影还体现在引用、对话、提问和对环境与角色的描写中。小说一开篇就引用了马马达叔维利(М. Мамардашвили)的话“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006)，直接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点明了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在行文过程中，对受访环境和受访者情态等也有少量描述，指出受访对象是“K家庭——母亲和女儿，加上一言不发的男人(女儿的丈夫)”(059)，讲述人“沉默、抽烟”(098)，“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152)等，受访环境是“我喝着茶，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结婚照片”(267)，这些客观的描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受访环境和氛围。尽管这些引言、注释和对人物的描述不是创作的主要形式，作者也不直接参与对话和创作，但却也不时出现在作品中，对表现人物心理，体现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主题，起点睛和衬托的作用，因而也是增强作品表现力的重要一环。

C·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艺文献小说中的作者不直抒胸臆，而是被隐藏在文本中的每个角落、每个想法之后，隐藏在讲述人的每句话之后。这也是其“复调书写”特点表现最为明显的部分。因此，文艺文献小说中的作者既不是媒介，也不是事实的作者，而是一个隐形的创作者。

## 结 语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C·阿列克西耶维奇，是一位用俄语书写苏、俄社会历史事件和重大社会现象的白俄罗斯作家，其创作具有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她创造的“文艺文献文学(小说)”，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证据为基础，侧重表现讲话者的心灵，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继承了俄罗斯纪实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俄罗斯传统纪实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叙事。但同时却又独具特点，一方面客观地描述事实真相，通过历史悲剧事件的文献记录，以求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让读者形成对事件的新观点，创建一种对事件的新的哲学史观。

《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全面表现了“完全真实的文献资料”、

“被发掘的微观心灵”、“简练精悍的个性化语言”、“主体思想的隐秘表达”、“文献与小说的有机结合”、“统领全局的隐形作者”等“文艺文献文学”的特点，解决了纪实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难题，为其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书写维度，为俄罗斯纪实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 Abstract 】** No matter in terms of national history or his unique experiences or themes of his works, the creations of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 winner in 2015,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ture. By inheriting traditions of Russian documentary literature, the writer creates a unique new style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which could be called “documentary fiction literature”. Taking Alexievich’s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of “documentary fiction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its contribution as well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ources, the uniqueness of soul writing, the individuality of language styles, the polyphony in expressions of themes, the editing style of writing, in addition to the shadow of the author.

**【 Key Words 】**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Documentary Fiction Literature, Documentary and Innov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лауреата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2015 г. Светланы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дь 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или уник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ил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мы работы,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На основе традиций русск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исательница создала новый жанр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На пример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молитвы. Хроники будущег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длинности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ложе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ерсонализации стиля, полифонии выражения мыслей и темы,

стиля написания и авторской тени, исследуются инновации «метод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и их вклад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публицистик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Алексиевич,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инновации

---

(责任编辑 万青松)

## 国际反恐法律机制视域下的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

王志亮 袁胜育\*\*

**【内容提要】**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恐怖主义的应对和打击,需要国际社会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为此,联合国以及各区域性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反恐怖主义合作的法律机制建设。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怖主义法律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网络化、本土化、碎片化的新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需要借鉴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进一步加以完善。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反恐怖主义 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97.9; D814.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6-0168(17)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极为猖獗,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突出问题。为了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反恐公约。尤其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反恐公约的制定。从规范层面上,国际社会形成了联合国反恐法

\* 本文系最高人民检察院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司法合作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GJ2016C52)的阶段性成果。

\*\* 王志亮,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袁胜育,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授。

律机制、区域性国际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并存的格局。这是世界各国共同智慧与共同意志的结晶，为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一、国际反恐法律机制

国际反恐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模式，可划分为全面性反恐与类型化反恐<sup>①</sup>。整体上，联合国作为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对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做出积极回应，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形成了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而各区域性组织也针对所在区域的恐怖主义，形成了区域反恐法律机制。

### （一）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

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是联合国规范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旨在协调和加强各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协调和加强各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依靠的就是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包括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反恐协调机构、界定具体的恐怖主义组织和具体罪名、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等等。

第一，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联合国作为国家间的国际性组织，没有领土及主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必须依靠各个主权国家，因而规定了普遍管辖权。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表述为一项国际义务，其蕴意就在于要求各国必须这样做。2001年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决议》，确定了成员国反对恐怖主义的义务，即所有国家政府都有义务不组织、唆使（怂恿）、资助或参加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各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即只要恐怖主义分子出现在本国，即使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该国也应对其行使管辖权。2006年9月20日，联合国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此后，联合国历次大会通过的《全球反恐战略》都重申会员国负有

---

<sup>①</sup> 梅建明、吴邵忠等：《城市反恐理论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年1月，第86页。

执行“反恐战略”的责任，对恐怖主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

第二，反恐协调机构。恐怖主义犯罪的泛滥使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因此各国都依本国刑法规定对恐怖主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然而，各国法律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以及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都属于其本国主权范围的事项，而各国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及现行制度均不尽一致且各有特点。虽然各国都表示要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但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仍未形成一致的“恐怖主义犯罪”概念，因而在具体反恐措施上也缺乏国际一致性。各国反恐法规及措施的不一致，客观上就要求在联合国反恐法律框架内尽可能加以协调，联合国为此也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联合国组织体系中，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联合国大会侧重在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规范框架和鼓励国家间的合作行动方面发挥作用，安理会则侧重通过促进有关安全、执法和边境控制当局之间的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有鉴于各国反恐法律行为不一致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加强全球反恐合作，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反恐协调机构——联合国反恐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任务是监督决议的实施情况，最终目的是提高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成立了下辖的执行局，就第 1373（2001）号决议涉及的所有领域向反恐委员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促使联合国的各个组织以及区域组织和政府间机构之间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协调，包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司法协助。

第三，具体的恐怖主义组织和具体罪名。恐怖主义是一个统称，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具体的组织及其人员实施的诸多行为，反对并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明确界定恐怖主义组织和确定具体的恐怖行为即具体罪名，这样才能有明确具体的打击对象。2009 年 1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 6247 次会议通过第 1904 号决议规定，所有国家均应对基地组织、拉登和塔利班以及第 1267（1999）号和第 1333 号决议编制的名单所列其他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采取规定的措施。安理会随后通过的多项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综合名单中的恐怖组织及其成员的制裁内容。综合联合国的反恐公约，在规范层面上明确了恐怖活动犯罪罪名，主要包括“谋杀罪”、“劫持人质罪”、

“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危害国际航空罪”、“恐怖主义爆炸罪”、“资助恐怖主义罪”、“海盗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等。

第四，反恐基本原则。联合国始终倡导、要求各国政府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又强调反对恐怖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和稳定而保障基本人权，采取反恐措施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其一法治原则。遵循法治原则是打击恐怖活动的必然要求，依照法律惩罚恐怖犯罪者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手段。如果反恐脱离法治轨道，搞法外制裁，或者“以暴制暴”，甚至用恐怖主义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虽然可能一时奏效，但最终却会造成恶果，这已被实践所证明。因此，惩治恐怖犯罪者需要联合国和各国加强立法，确立惩治恐怖犯罪的普遍管辖、“或引渡或起诉”、“政治犯罪例外”等原则，尽可能确保反恐行动的措施和手段合乎法治。

其二人道原则。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行动计划》提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必须确保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措施都符合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联合国敦促各国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将任何参与资助、策划、筹备、实施或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绳之以法，确保各国内法律法规将这类恐怖主义行为定为严重犯罪。同时，确保根据引渡或起诉原则依法定罪量刑，必须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注意恐怖分子被抓捕后的权利保护。

其三权利救济。鉴于恐怖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和特殊性，为有效打击恐怖犯罪，许多国家采取了非常手段，如为了监视恐怖主义活动、收集恐怖犯罪的情报和证据而广泛采用电子监听、秘密搜查、放宽拘捕条件、拦截邮件、银行查账等方法，有时甚至以重大恐怖犯罪引起紧急状态为由大范围限制公民权利。这些措施可能会侵犯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强调打击恐怖犯罪过程中的公民人权保障问题，将反恐特别措施限制在合理、合情、合法的范围内，做好公民权利救济工作。

## （二）区域反恐法律机制

**欧盟反恐法律机制。**欧盟反恐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恐怖主义犯

罪的普遍管辖、恐怖犯罪非政治化、反恐对象及其罪名、司法协助。对恐怖主义犯罪实行普遍管辖，属于可引渡之罪，对恐怖主义犯罪人实施“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使用所有力所能及的手段打击恐怖活动，将意识形态性的恐怖行为进行调和或非政治化，不允许被请求国援引政治犯罪而对抗引渡。欧盟公布了恐怖组织的名单，所列恐怖组织共有 15 个。防治恐怖主义是国际司法协助的义务，具体包括治安协助、预防协助和刑事司法协助。

**东盟反恐法律机制。**东盟反恐法律机制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确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合作、刑事司法合作、人道主义、改造恐怖分子。普遍管辖权只针对恐怖主义犯罪，该管辖权分为两种即“绝对国家管辖权”和“酌定国家管辖权”，绝对国家管辖权是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结合，酌定国家管辖权是属人管辖与保护管辖的结合，由此决定了缔约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而应积极行使管辖权。明确规定以 14 项国际公约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为标准，国际公约中所列举的恐怖主义行为就是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合作约定了 13 个领域，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预防恐怖主义行为。刑事司法合作主要有反恐的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方面。规定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核心是公平待遇的问题。各缔约国努力促进分享罪犯改造的措施，包括在适当情况下促使恐怖犯罪人回归社会，注重从改造人的思想出发，努力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犯罪的问题。

**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恐怖主义行为界定为国际意义的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恐怖主义犯罪，是指绑架、谋杀和对根据国际法有义务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些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进行其他袭击以及同这些罪行有关的勒索，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应视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罪行。由于大多数国家国内法规定对政治犯罪不引渡，这势必影响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效果，因而需要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为了在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进行协助，打击侵害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恐怖犯罪，需要交换情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生命和健康，将恐怖犯罪规定写进各国刑法，否则应予以引渡。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要保障恐怖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由，得到正当程序的法律保障。

**南盟即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反恐法律机制。**南盟反恐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恐怖主义犯罪包括：《非法劫持公约》约定的犯罪，《民航公约》约定的犯罪，《外交代表公约》约定的犯罪，成员国参加的公约范围内且要求予以起诉或引渡的犯罪。各缔约国可采取适当的、与其本国法律相一致的措施，遵循互惠原则，对恐怖犯罪行使管辖权。对于涉嫌实施恐怖犯罪或恐怖犯罪嫌疑犯，如交还有失公正则不引渡，如不引渡则应按本国法律做出判决。尽最大努力向其他缔约国提供处理恐怖犯罪的程序便利，包括提供该程序所必需的所有证据。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相互合作，通过相应机构之间的磋商，交流信息、情报和专家以及采取其他可能的适当的合作措施，具体包括成员国之间引渡嫌疑犯、分享情报、冻结恐怖主义组织的资产等。

**东盟反恐法律机制。**东盟反恐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和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国内化。恐怖主义犯罪，是指任何在缔约国国内发生的、针对缔约国国民、财产、利益实施的以制造恐怖活动为目的的受其国内法律惩罚的犯罪或犯罪企图，无论何种形式的动机或目的，包括一切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个人或集团实施的犯罪行为。缔约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或缔约国未批准的协议中未规定的犯罪，不属于恐怖主义犯罪。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决、反对外国占领与侵略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及保卫阿拉伯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均不属于犯罪行为。各缔约国必须采取措施，根据各自国内的法律，从严惩处恐怖主义犯罪。对任何恐怖犯罪未遂按既遂犯罪予以惩罚。冻结、没收罪犯制造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财产或任何与之有关的财物，从源头上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发生。

**伊斯兰合作组织反恐法律机制。**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包括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和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发生在任何缔约国并受该国法律惩罚的犯罪行为，仅限于以恐怖主义形式发动或参加针对国民、财产、国家利益和设施的犯罪活动。各民族根据国际法原则反对外国占领、侵略、殖民统治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自治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不应被视为恐怖主义犯罪。既要定义恐怖主义犯罪，又要将争取民族解放和自治的斗争排除在外。恐怖主义犯罪不应被视为政治犯罪，反对缔约国国王

和政府首脑及其家属和后代的行为，反对缔约国王子或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反对享有国际豁免权人员的行为如大使和外交官等，谋杀或武力抢劫个人或团体或交通工具的行为，蓄意破坏公共财产包括别国的财产的行为，生产、走私或拥有用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武器、炸药和其他物质的行为，即使带有政治动机，也不属于政治犯罪。

**非盟反恐法律机制。**非盟反恐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和排除事项。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以列举方式，约定恐怖主义犯罪：其一，违反一个成员国的刑法，并对任何个人、群体可能造成危及生命、影响肢体完整或自由或引起严重危害或死亡的所有行为，或者对公共或私人财产、自然资源、环境或文化遗产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且这些行为是有计划的或故意实施的。其二，对任何政府、团体、公共机构、公众等采取威胁、制造恐怖、强制等手段使之采取或放弃某种行动，或采纳或放弃某个特殊的观点，或按照某些原则行事。其三，破坏某种公共服务，使对公众的某些基本服务无法进行或在任何公共场所制造紧急情况。其四，在一个国家制造大动乱。其五，任何有意图地推动、发起、参与、指挥、资助、鼓励、恐吓、策划、组织人员实施上述前三项相关的行为。被排除出恐怖主义犯罪范围的事项：其一，排除政治犯罪，因为政治犯罪容易被视为恐怖主义犯罪，这实质上是实现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所做的努力；其二，排除争取自由和民族自决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些斗争包括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外国占领、入侵和统治的武装斗争，政治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部落的、宗教的或其他的动机不应成为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理由。

## 二、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现状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在上海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且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公约》就是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是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的核心。《上海公约》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

要职能，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性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奠定了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法律基础。<sup>①</sup>

### （一）上合组织的反恐法律

除了成立之时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二次元首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6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三份重要法律、政治文件，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合作层次、加大反恐力度所采取的三大战略举措。这些文件的签署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涉及安全、经济、交通、文化、救灾、执法等广泛领域，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其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合组织是第一个提出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反恐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上合组织并无借助反恐而成为军事联盟的意图”<sup>②</sup>。

2004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总部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这是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的重要步骤。2006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7年至2009年合作纲要》。2015年4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在塔什干举行的第26次例行会议上，又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2018年合作纲要》草案。这些重要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 （二）上合组织反恐法律内容

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法律主要包括《上海公约》及其《议定书》，但以前者为核心。除序言和约尾外，《上海公约》共有21个条文，其反恐法律内

---

① Guan Chen.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иоритет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No.11. С.71-76.

② Дубнов А. К чему стремится ШОС? В Москве обсудили итоги шанхайского саммита.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150854480>

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规定为犯罪，合作反恐，建立地区反恐机构。

第一，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规定为犯罪。恐怖主义是指：其一，为本公约附件所列条款之一所认定并经其定义为犯罪的任何行为；其二，致使平民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对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对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的任何其他行为，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活动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并且是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并且是依据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极端主义是指旨在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改变国家宪法体制，通过暴力手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为达到上述目的组织或参加非法武装团伙，并且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由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是滋生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恐怖主义往往是由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所产生，三股势力联系密切，密不可分，经常结为一体，这就决定了必须将打击恐怖主义与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斗争相结合。上海合作组织是最早鲜明提出打击“三股势力”的国际组织。《上海公约》在国际上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作了明确定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仅仅是主观上的区别，在客观上均可归结为恐怖主义犯罪。上合组织确定的恐怖主义犯罪，不仅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也是其成员国国内法律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犯罪。

第二，合作反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具有反对恐怖主义的诚意和坚决态度，打击恐怖主义是各缔约国应履行的义务。<sup>①</sup>对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其开脱罪责。为确保刑

---

<sup>①</sup> Клещева Т.А. Роль России 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в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в странах АТР 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http://www.center-bereg.ru/o1706.html>

罚惩罚恐怖主义者，各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尤其是制定国内立法规定相应的犯罪及其刑罚，同时应规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相互引渡。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合作义务包括预防、侦查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以及情报交换。<sup>①</sup>各方中央主管机关，互相提供协助，交流信息，落实快速侦查的请求，制定并采取协商一致的措施，以预防、查明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并互相通报实施的结果。采取措施预防、查明和惩治在本国领土上针对其他各方实施的有关行为，预防、查明和阻止提供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资金、武器、弹药和其他协助，预防、查明、阻止、禁止并取缔训练恐怖人员的活动。交换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情况的材料，交流经验，培训反恐人员的专业素质，必要时在惩治恐怖主义行为及消除其后果方面提供实际帮助。

各方中央主管机关交换共同关心的情报，包括准备实施及已经实施恐怖行为的情报，已经查明及破获的企图实施恐怖行为的情报；对国家元首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他受国际保护人员以及国事访问、国际和国家政治、体育等其他活动的参加者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情报，准备、实施及以其他方式参与恐怖行为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的情报包括其目的、任务、联络和其他信息，为实施恐怖行为而非法制造、获取、储存、转让、运输、贩卖和使用烈性有毒和爆炸物质、放射性材料、武器、引爆装置、枪支、弹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可用于制造上述武器的原料和设备的情报，已查明涉及或可能涉及恐怖行为的资金来源的情报，实施恐怖行为的形式、方法和手段的情报。

第三，地区反恐机构。200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元首在圣彼得堡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决定建立常设的地区反恐机构，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各方将签单独协定和通过其他必要文件，建立各方的地区性反恐机构并确保运行。除秘书处以外，地区反恐机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又一个常设机构，其目的是促进成

---

<sup>①</sup> Кирсанов Г.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Журнал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а. 2004. No.3. С.129-137.

员国各方主管机关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行动中进行协调和相互协作。地区反恐机构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包括：就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与该组织成员国主要机关及国际组织保持工作联系，加强协调，参与反恐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起草，与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反恐委员会、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同致力于建立全球反恐的有效反应机制，收集和分析成员国提供的有关反恐信息等。<sup>①</sup>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构工作推进顺利，仅仅在 2011 年，就防止了 10 起以上的恐怖主义袭击，消灭了 400 多名恐怖分子。<sup>②</sup>

### 三、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的完善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包括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规定为犯罪、合作反恐和地区反恐机构三个方面。从国际社会反恐法律机制的情况来看，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完善，如补充“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恐怖犯罪人的改造”等内容。

#### （一）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存在的短板

如何评判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的有效性，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蓝本。联合国反恐法律内容由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反恐协调机构、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和具体罪名、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四个方面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明确了任何国家对没有在本国实施恐怖犯罪的行为人实施管辖的资格，这就需要协调所有国家的反恐行为，因而就要有反恐协调机构，协调的内容首当其冲就是确定尽可能一致认同的恐怖主义组织和罪名，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强调法治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公民权利救济原则。这四个层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由此，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发挥着伦理倡导的协调作用，这是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的本

---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членами ШОС 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http://ecrats.org/upload/iblock/90a/2.pdf>

② Щербатюк Д. При участии ШОС решаются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infoshos.ru/ru/?idn=10940>

质特点，因为联合国不是主权国家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全球性国家组织。从宏观上看，恐怖犯罪蔓延到了全球，需要联合国制定反恐法律以发挥积极倡导协调的机制作用，因而联合国的反恐公约涉及的方面最为广泛，反恐公约的数量多达六项、反恐文件决议多达六十六项。

从中观层面看，恐怖犯罪可进一步缩小到区域范围。区域国家组织也纷纷制定了反恐法律，例如，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包括 1971 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和 2002 年《美洲国家间反恐公约》，欧盟反恐法律包括 1977 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2002 年《欧洲联盟理事会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议》、2005 年《欧洲理事会预防恐怖主义公约》和 2005 年《欧洲理事会反资助恐怖主义、洗钱与没收恐怖主义犯罪收益公约》，南盟反恐法律包括 1987 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打击恐怖主义地区协定》和 2004 年《南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东盟反恐法律是 1998 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伊合组织（前身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反恐法律是 1997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非盟反恐法律是 1999 年《非洲统一组织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东盟反恐法律是 2007 年《区域性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公约》，为维护反恐法律的稳定性，以上公约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相比较之下，区域内的国家组织与其成员国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区域国家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对于成员国具有法律效力。欧盟反恐法律内容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恐怖犯罪非政治化、反恐对象及其罪名、司法协助四个方面，东盟反恐法律内容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合作、刑事司法合作、人道主义、改造恐怖分子六个方面。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内容包括把恐怖主义行为界定为国际意义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刑事司法协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四个方面。南盟反恐法律内容包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刑事司法协助两个方面。东盟反恐法律内容包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国内化两个方面。伊合组织反恐法律内容包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两个方面。非盟反恐法律内容包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和排除事项两个方面。

在法律效力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是区域国际组织反恐法律机

制的基础，那么为何有的强调普遍管辖权、有的不强调呢？这是因为，区域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国情越接近越不强调，国情越类似越能达成一致；区域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国情越不接近越需要强调，国情越不一致越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就越有必要强调。在法律内容上，表现出了全部共有成分、部分共有成分和个体成分这三个递减缩小层面的特色。区域国际组织反恐法律的共有成分有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协助二项，界定恐怖主义犯罪较为复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伊合组织反恐法律进一步要求恐怖犯罪非政治化，非盟反恐法律进一步表述为排除事项，东盟反恐法律进一步要求恐怖犯罪规定的国内化，而欧盟反恐法律以进一步列出反恐对象及其罪名最为直接鲜明；司法协助较为明确具体，属于核心内容，东盟、美洲国家组织、南盟、东盟反恐法律表述为刑事司法合作，而东盟还扩大到了反恐合作。在部分共有成分上，东盟反恐法律提出了人道主义，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则直接提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个体成分上，欧盟反恐法律以明确提出反恐对象及其罪名为个性特色，不仅追究恐怖犯罪的自然人责任，而且追究资助恐怖犯罪的法人责任，表明了欧盟反恐法律内容的新发展。东盟反恐法律的个体特色为改造恐怖分子，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上首次规定改造恐怖分子。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的反恐法律机制各有所长，其中较为完善的是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和欧盟反恐法律机制。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确定恐怖主义组织和罪名、反恐合作及刑事司法合作、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是其基本的共有内容。其各自的特色是，联合国反恐法律机制的法治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公民权利救济原则，以及欧盟反恐法律机制的追究法人责任、东盟反恐法律机制的改造恐怖分子，这些方面都值得借鉴。“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种有效的反恐机构，对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尚存在不完善之处”<sup>①</sup>，其反恐法律机制仅仅停留在以上三个方面是不够的，存在明显空缺。

## （二）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的完善

---

<sup>①</sup> Ткаченко О.А.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терроризму в рамках ШОС. <http://istfak.org.ua/tendentsii-ozvytku-suchasnoi-systemy-mizhnarodnykh-vidnosyn-ta-svitovoho-politychnoho-pratsesu/183-protsepy-rehionalizatsii/581-protyvodeystvye-terroryzmu-v-ramkakh-shos>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的完善，需要借鉴国际社会反恐法律机制的长处。首先，针对的恐怖犯罪是一致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国家组织都把恐怖犯罪作为打击对象。其次，对恐怖犯罪所采取的法律措施是共同的，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国家组织都把法律作为打击恐怖犯罪的共同依据。再次，上合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区域国家组织之一，其反恐法律机制需要与联合国、各区域国家组织反恐法律机制保持协调。总之，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应与联合国、各区域国家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相协调，否则“各唱各的戏”甚至是“对台戏”，其结果可想而知。当然，上合组织反恐法律对国际社会反恐法律机制的借鉴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需要结合上合组织自身实际。上合组织成员国国情差异很大，要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作用，上合组织反恐法律就应力求内容规定完善，应补充相关内容，同时应考虑维护《上海公约》的稳定性。为避免“法律基础不足”<sup>①</sup>的缺陷，应补充“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恐怖犯罪人的改造”等内容。

第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刑事管辖权。规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刑事管辖权，是上合组织各国采取法律措施的前提和依据。面对恐怖主义犯罪问题，各国首先应持不支持的态度，在不支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联手打击。联手打击必须以本国也打击为前提，在上合组织内需要把打击恐怖主义确定为一项义务和责任，才能在区域甚至国际社会范围内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当然，就各国疆域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其主权范围内的刑事管辖权。上合组织内，确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刑事管辖权，意在强调各成员国反恐的共同任务，也便于与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相互配合。

第二，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恐怖犯罪的具体罪名，联合国一系列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均作了明确规定。恐怖主义犯罪是由恐怖主义组织成员实施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前提是要认定恐怖主义组织，上合组织应确定一致认可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尽管实践中，确定一致认可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比较困难，因为有的国家认可、有的国家不认可而难以达成一致。对此，

---

<sup>①</sup> Christina Eckes, “Judicial Review of European Anti-Terrorism Measures”, *European Law Journal*, January 2008, Vol.14, No.1.

可采取两个方案来解决：第一个方案，尽可能列出各国一致认可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如果由于意见分歧而达不成一致意见，那么就采取第二个方案，各国以备忘录的方式列出本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向其他国家通报情况，以便打击活动能获得有关国家的支持。例如，我国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了境内第一批认定的 4 个与东突有关的组织为恐怖组织，即“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东突厥解放组织”又称“东突民族党”、“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信息中心”。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在 2006 年 3 月在上合组织塔什干会议上初步确定了三股势力的清单。<sup>①</sup>

第三，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打击恐怖主义，需要采取种种措施，反恐措施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为特征，抑制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同时要求“平衡安全、自由和人权”<sup>②</sup>。因此，上合组织应要求各国实施反恐措施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法治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公民权利救济原则。上合组织的反恐措施应纳入法制轨道，不论是实体内容还是程序过程都应规定在公约内并要求各国遵守。反恐措施直接指向恐怖犯罪人或称恐怖犯罪嫌疑人，不论是逮捕、羁押、审判、执行刑罚，还是引渡恐怖犯罪人，各国都应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给予人道待遇。上合组织应倡导，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同时，注意保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遵循公民权利救济原则。如有学者提出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恐怖活动受害人的人权保护；二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三是对恐怖主义行为证人的保护。”<sup>③</sup>

第四，改造恐怖犯罪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要采取法律措施，对于恐怖犯罪人，要经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量刑，最终落实在执行刑罚上。因此，上合组织应明确规定执行刑罚惩罚改造恐怖犯罪人，倡导各国的国内法明确规定对恐怖犯罪人的行刑惩罚改造，尤其是监狱对恐怖犯罪人执行刑罚把去极端化作为重要任务，对于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具有积极作用。

---

① Васильев Леонид Евгеньевич.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терроризма. <http://cyberleninka.ru/article/n/rossiysko-kitayskoe-sotrudnichestvo-v-borbe-protiv-terrorizma>

② [美]布丽奇特·L·娜克丝：《反恐原理》，陈庆、郭刚毅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297 页。

③ 简基松：“完善上合组织法律机制之建言”，《法律科学》，2008 年第 4 期。

总之，“反恐立法工作始终是联合国以及许多国家反恐斗争的基础性的重点工作。”<sup>①</sup>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已初步形成，借鉴国际社会反恐法律机制，以法律机制应有的内容为标准，在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关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合作反恐、地区反恐机构”的现有内容基础上，应补充“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恐怖犯罪人的改造”等项内容。由此，从“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犯罪定性、“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从“合作反恐”到“地区反恐机构”，从“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到“恐怖犯罪人的改造”，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架构成反恐法律机制的有机整体并发挥反恐功能。恐怖主义的普遍管辖权，各国有了采取一致措施的法律依据；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犯罪定性，使各国有了一致认同；恐怖主义的具体组织，使各国明确了一致的反恐对象；合作反恐，使各国的反恐法律和措施尽可能相互连动；地区反恐机构，使得各国反恐尽可能相互协调一致具有组织保障；反恐措施的基本原则，使各国的反恐措施合情合理合法；恐怖犯罪人的改造，使各国反恐治本目的明确。

---

**【Abstract】** Terrorism crime has become a serious threat to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a global issue, the response and combating of terrorism requires concerted cooperation and joints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United Nation and various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pare no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mechanism in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safeguarding regional secur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s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terrorism legal mechanisms. Facing the new features of networking, loc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terrorism legal mechanism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needs to learn from mature experience of

---

<sup>①</sup> 梅建明：《反恐情报与危机管理》，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5月，第7页。

other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it by taking the region's reality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ti-terrorism, Legal Mechan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стала серьёзной угрозой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мира и являетс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ответ на терроризм и борьба с ним нуждаются в тес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данной целью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 различ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кладывают усилия по созданию механизмов прав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Борь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дач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 времён своего со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делала ряд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равов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борьбы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сталкиваясь с новыми условиями угроз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ете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и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заимствовать зрелый опыт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оздании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борьбы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с целью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соотнести его с мест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орь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правовой механизм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东北亚能源****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东北亚能源关系**

富景筠\*

**【内容提要】**有关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研究，不仅涉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家-企业关系演进，而且还包括由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冲击引发的俄罗斯在不同地区能源市场维度上的角色互动。我们在此试图构建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双层博弈”框架，即在强调俄罗斯国内政治行为对地区能源关系影响的同时，考察东北亚能源市场上各方利益博弈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实施的作用。其中，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危机对传统油气出口国的外部冲击，将被纳入对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动态分析。考虑到世界能源市场正在经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需求程度将越来越大于后者对前者的进口依赖。俄罗斯从资源民族主义转向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能源政策，将实质性地推进其与东北亚能源关系的提升与深化。

**【关键词】**国家-企业关系 双层博弈 资源民族主义 东北亚能源关系

**【中图分类号】**D751.2; F41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6-0185(20)

**一、问题的提出**

石油和天然气构成俄罗斯的经济核心和政治基石，同时也赋予其外交政策极大的能源权力。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润是俄罗斯制定能源政策的两大核

\* 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心目标。<sup>①</sup>就俄罗斯对外能源关系而言，学界目前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研究：

一是强调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决定能源问题的安全化，即一国为保证自身权力和安全，与伙伴国展开竞争性零和博弈。<sup>②</sup>在传统油气出口市场欧洲，俄罗斯具有将资源储备转化成地缘政治影响的能力，而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非对称依赖，则使其面临后者的能源安全威胁。<sup>③</sup>

二是认为能源的商品属性使得一国为获得来自贸易的收益需要进行合作性博弈。能源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一体化的因素，这意味着能源贸易具有对地区合作的整合潜力。在后苏联空间，由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讨好和迎合俄罗斯的帝国野心获取经济上的“巨额红利”，<sup>④</sup>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更愿意与成员国妥协并接受其要求，欧亚经济联盟共同能源市场建设终于逐步从理念构建过渡到具体实施。<sup>⑤</sup>

三是从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视角探讨企业行为如何塑造能源领域的国家利益并引起国际政治的结构变化。<sup>⑥</sup>国有能源企业显然已成为服务于俄罗斯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目标的工具，其市场行为具有推进外交政策目

---

①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合伙：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宋和坤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② [英]戴维·维克托、埃米·贾菲、马克·海斯编：《天然气地缘政治——从1970到2040》，王震、王鸿雁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③ Angela Stent, “An Energy Superpower? Russia and Europe”, in Kurt M. Campbell and Jonathon Price,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Energy*, Washington D. C.: The Aspen Institute, 2008, p.78; Tom Casier, “The Rise of Energy to the Top of the EU-Russia Agenda: From Interdependence to Dependence?”, *Geopolitics*, 2011, Vol.16, No.3, p.537.

④ Загладин Н.В. Конфликт вокруг Грузии—симптом кризиса системы миропорядка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0. №.5. С.9.

⑤ 根据共同能源市场构想，欧亚经济联盟将于2019年前建立统一电力能源市场，2025年前实现统一石油和石油产品及天然气市场。参见 О концеп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бщего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рынка, общего рынка газа и общих рынков нефти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ешение высш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от 8 мая 2015 г. №.12, 31 мая 2016 г. №.7 и №.8. [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energetikaiinfr/energ/Pages/default.aspx](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energetikaiinfr/energ/Pages/default.aspx).

⑥ Rawi Abdela, “The Profits of Power: Commerce and Realpolitik in Eur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2, Vol.20, No.3, pp.421-456.

标的浓厚色彩。<sup>①</sup>而俄罗斯能源贸易的政治化倾向无疑将增加地区关系的不确定性。<sup>②</sup>

就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而言，作为该地区唯一的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能源政策导向是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重要方向标。实际上，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能源扩张，首先是其国内不断变化的国家—资本关系对外延伸的结果。<sup>③</sup>俄罗斯加强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控制，使得国有能源企业取代私人企业和国际石油公司，成为该国对东北亚国家能源贸易的主导。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资源民族主义（resource nationalism）<sup>④</sup>的能源政策遭遇瓶颈，这促使俄罗斯重新定位自己的能源利益和战略诉求<sup>⑤</sup>。由欧洲主导的俄罗斯传统能源政策加速向欧亚主义能源政策转变。显然，有关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研究不仅涉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家—企业关系的演进，而且还包括由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冲击引发的俄罗斯在不同地区能源市场维度上的角色互动。<sup>⑥</sup>

俄罗斯加速能源战略东向将为东北亚能源市场、特别是中俄能源合作带来哪些契机？在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背景下，俄罗斯能否通过欧亚主义能源政策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全球能源体系变革下东北亚能源市场的自身特殊性对于俄罗斯能源战略东向的实施又将产生哪些影响？这里，我们试图构

---

① Igor Khripunov, Mary M. Matthews, "Russia's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 and Its Foreign Policy Agend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t*, 1998, Vol.43, No.3, pp.38-48; Karen Smith Stegen, "Deconstructing the 'Energy Weapon': Russia's Threat to Europe as Case Study", *Energy Policy*, 2011, Vol.39, p.6506.

② Catherine Locatelli,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ance: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vestment Strategies", *Energy Policy*, 2006, Vol.34, p.1075.

③ 张昕：“‘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外交’的迷思”，《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页。

④ 资源民族主义是指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或支配以及将此权力用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能力，其核心是政府为保护或提升其国家遗产和主权而干涉自然资源产业。参见 Reid Click, Robert Weiner, "Resource Nationalism Meets the Market: Political Risk and the Value of Petroleum Reserv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Vol.41, No.5, p.2.

⑤ James Henderson,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Eastern Oil Resources",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January 2011, Vol.41, p.2.

⑥ Miroslav Mares, 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the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2012, Vol.10, p.436.

建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双层博弈”框架<sup>①</sup>，即在强调俄罗斯国内政治行为对地区能源关系影响的同时，考察东北亚能源市场上各方利益博弈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实施的作用。其中，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危机对传统油气出口国的外部冲击，将被纳入对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动态分析。

## 二、俄罗斯资源民族主义与东北亚能源市场博弈

能源部门持续扮演整个经济体的贡献者角色，是俄罗斯能源政策的构建理念。同时，丰富的资源禀赋可被用来提升国家经济和政治地位。<sup>②</sup>2000年后，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油气产业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改变能源产业的规制方向，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产权控制。俄罗斯从“自由式”市场制度转向资源民族主义，导致东北亚能源贸易的政治化倾向。同时，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高企下东北亚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增长，导致了资源重商主义的地区扩散。<sup>③</sup>东北亚国家围绕俄罗斯能源的利益博弈不断加剧。

通过限制外国企业以产品分成协议（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sup>④</sup>方式参与资源开采，俄罗斯实现了国家对远东油气资源以及统一油气供给系统和对外出口的控制。<sup>⑤</sup>20世纪90年代，有关离岸萨哈林岛油气开采的两项

---

① 罗伯特·普特曼提出了有关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双层博弈的经典分析框架。在分析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根源时，他也阐释了国内政治如何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见 Robert D.Putman,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Vol.42, No.3, pp.427-460.

② Harley Balzer, “Vladimir Putin’s Academic Writings and Russian Natural Resource Polic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6, Vol.53, No.1, p.48.

③ Jeffrey D. Wilson, “Northeast Asian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in As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4, Vol.38, No.1, pp.29-30.

④ 作为投资者与资源国政府之间的商业合同，产品分成协议是俄罗斯最早用于能源开发领域的国际合作模式。在产品分成协议下，资源国政府拥有能源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但授予私人企业或机构一定时期内的租赁权，以此来换取一定比例的被开采能源。

⑤ Jae-Young Lee, Alexey Novitskiy, “Russia’s Energy Policy and Its Impacts on Northeast Asian Energy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 2010, Vol.13, No.1, p.50.

产品分成协议，奠定了国际石油公司在俄罗斯远东开展业务的基础。<sup>①</sup>一项是俄罗斯与五家外国石油公司于 1994 年签署的萨哈林 2 号产品分成协议。这项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萨哈林 2 号项目由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牵头，并得到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的资助。<sup>②</sup>第二项是 1996 年俄罗斯与埃克森美孚公司签署的萨哈林 1 号产品分成协议。<sup>③</sup>产品分成协议在俄罗斯一直饱受争议。尤科斯石油公司曾联合西伯利亚石油公司通过院外活动支持产品分成协议，但俄罗斯政府与议会间的政治斗争使得有关产品分成协议的议案被无限期推迟。<sup>④</sup>

尤科斯石油公司被迫解散及其资产被再次国有化，意味着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sup>⑤</sup>的到来。随着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俄气”）被提升至国家首要地位并被给予对国家油

---

① 俄罗斯曾签署 3 项有关离岸萨哈林岛油气开采的产品分成协议。除萨哈林 1 号和 2 号项目外，1993 年，俄罗斯与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签署了萨哈林 3 号产品分成协议。但 2004 年俄罗斯宣布该协议无效。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宣布对获取萨哈林 3 号油气田使用权感兴趣。萨哈林 4 号项目的开发由俄罗斯石油公司等负责。萨哈林 5 号项目由英国石油公司（占股 49%）、俄罗斯石油公司（占股 25.5%）和萨哈林海洋石油天然气公司（占股 25.5%）联合开发。

② 该项目于 1994 年 6 月签署、1999 年 1 月生效，总投资约为 100 亿美元。项目作业者萨哈林能源投资公司最初由马拉松石油公司（占股 30%）、麦克德莫特国际公司（占股 20%）、三井物产（占股 20%）、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占股 20%）和三菱商事（占股 10%）构成。当麦克德莫特国际公司和马拉松石油公司分别于 1997 和 2000 年卖出股份后，该项目的具体股比变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占 55%，三井物产占 25%，三菱商事占 20%。参见 Timothy Fenton Krysiak, “Agreements from Another Era: 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s in Putin’s Russia, 2000-2007”,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WP 34, November 2007, p.19.

③ 该项目于 1995 年 6 月签署、1999 年 1 月生效。埃克森美孚公司最初选择与萨哈林海洋石油天然气公司联手，后者被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目前，埃克森美孚公司占 30% 股份，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印度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各占 20% 股份，日本投资财团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SODECO）占 30% 股份。参见 Timothy Fenton Krysiak, “Agreements from Another Era: 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s in Putin’s Russia, 2000-2007”, p.13.

④ 刘锋：“关于俄罗斯产品分成协议问题的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 年第 1 期，第 16-17 页。

⑤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对战略性企业的整治与重组，实现国家对重要行业、命脉部门与重大企业的控制与垄断。见田春生：“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学动态》，2010 年第 7 期，第 126 页。

气储备的优先准入<sup>①</sup>，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开始展开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在石油方面，2003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购买英国—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拥有了万科（Vankor）油田<sup>②</sup>的开发许可证。同年，该公司还购买了萨哈林3号项目区韦宁油气田的开发许可证。俄罗斯石油公司及其子公司萨哈林海洋石油天然气公司持有萨哈林1号40%的股份。2005年，通过收购尤科斯石油公司主要资产及整合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sup>③</sup>，同时也成为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内石油企业。<sup>④</sup>

作为国家垄断的天然气工业巨头<sup>⑤</sup>，俄气掌控了俄罗斯65%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73%的天然气生产份额<sup>⑥</sup>，并垄断了国内全部的天然气管道以及整个天然气出口产业的输气权。<sup>⑦</sup>2006年，通过收购萨哈林2号参与公司所持股份，俄气成为该项目最大股东并控制了该项目石油和液化气的生产和出口。<sup>⑧</sup>俄气不仅收购萨哈林1号天然气来补充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

---

① Michael Bradshaw, “A New Energy Age in Pacific Russia: Lessons from the Sakhalin Oil and Gas Project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0, Vol.51, No.3, p.351.

② 万科油田于2009年8月正式投产，其原油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ESPO）的主要来源。参见 Miroslav Mares and 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the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2012, Vol.50, p.440.

③ Yelena Kalyuzhnova, Christian Nygaard, “State Governance Evolution in Resource-rich Transition Economies: An Application to Russia and Kazakhstan”, *Energy Policy*, 2008, Vol.36, p.1836.

④ James Henderson,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Eastern Oil Resources”, p.33.

⑤ 2005至2008年间，俄气进行了许多石油产业的收购活动。2005年，俄气以拖欠税款为由迫使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出售72.6%的股份，由此成为俄罗斯第5大石油生产企业的所有者。参见[美]迈克尔·克莱尔：《石油政治学》，孙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5页。2007年，俄气在其与雪佛龙联合企业北泰加油气公司（Северная тайга Нефтегаз）中的股份从30%增至75%。2008年，俄气从俄罗斯石油公司购买了托姆斯克石油公司50%的股份。

⑥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Russi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2015.

⑦ 根据2006年7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天然气出口法》，除俄气外的其他独立天然气开采商无权出口天然气。2013年底，俄罗斯允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诺瓦泰克公司出口液化气。但由于这两家公司的液化气项目尚未投产，俄气目前仍是俄罗斯唯一出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气的企业。

⑧ 2006年12月，俄气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达成协议，以74.5亿美元购得萨哈林2号项目51%的股份。由此，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股份从55%降至27.5%，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的股份分别从25%和20%降至12.5%和10%。

迪沃斯托克 (SKV) 管道, 而且封杀了埃克森美孚公司从萨哈林 1 号至中国的管道建设。<sup>①</sup>同时, 俄气也是东西伯利亚天然气资产的主要开发者和科维克金凝析气田<sup>②</sup>的新持有者, 而科维克金凝析气田则是俄罗斯对东北亚国家天然气合作的关键。由此, 俄气自然成为实施俄罗斯国家东部天然气政策的协调者, 并在对东北亚国家的天然气销售谈判中扮演主导角色。

资源民族主义下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贸易的策略, 是通过促进能源进口国之间的需求竞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 作为地区范围内对资源安全担忧加剧的共同反应, 东北亚国家的资源重商主义不断加强。由此, 围绕俄罗斯油气管道走向的东北亚国家博弈愈演愈烈。2000 年代初, 当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中国发展石油管道合作势头强劲。而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运输系统也成为俄日能源对话的首要问题。日本以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为利诱, 说服俄罗斯政府改变尤科斯石油公司最初围绕中国的管道设计方案。<sup>③</sup>它提出将管道终点设在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自此, 中国与日本分别就各自支持的“安大线”与“安纳线”展开激烈竞争。2004 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解体后, 该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被移交给了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Транснефть)。<sup>④</sup>俄罗斯随即提出对“安

---

① [瑞典] 斯蒂芬·赫德兰: “危机中的俄罗斯: 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第 47 页。

② 科维克金气田的开采许可证最初由俄罗斯露西亚石油公司持有, 韩国韩宝集团是该公司最大股东 (占 46.1% 股份)。1997 年韩宝集团破产后, 其股份被转售给西丹科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2003 年, 由秋明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合资创建的秋明英国石油公司 (TNK-BP) 持有露西亚石油公司 62.89% 的股份。2007 年 6 月, 在面临失去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 秋明英国石油公司被迫将科维克金气田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俄气。

③ 根据 2003 年 1 月日俄签署的能源合作计划, 日本承诺每天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100 万桶, 同时准备提供 50 亿美元贷款, 协助俄罗斯开发油田及修建输油管道。见 Носова И. А.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1. №4. С.46.

④ 继 1994 年 11 月尤科斯石油公司提出修建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石油管道 (即“安大线”) 的建议后, 2003 年 5 月, 尤科斯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石油”) 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定》。该协议规定“安大线”有 800 公里在中国境内建设, 建设费用约 8 亿美元, 俄方负责其境内 1600 公里的管道建设, 建设费用约 17 亿美元。参见 M.Olcott, N.Petrov, *Russia's Regions and Energy Policy in East Siberia*, Houston: James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2009, p.18.

大线”和“安纳线”的折中方案“泰纳线”，即将输油管道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定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和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该方案本质上是对日本“安纳线”建设方案的认可和支持。由于同时控制管道的出入口，该管道的贯通将助推俄罗斯对日本、朝鲜半岛及其他亚太国家的石油外交。

由上可见，俄罗斯资源民族主义的勃兴不仅引发了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油气田的产权结构变化，而且加剧了东北亚能源进口国围绕俄罗斯石油管道走向的利益博弈。一方面，通过彻底改造俄罗斯政府与外国能源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能源企业取代私人企业和国际石油公司，掌控了该地区的能源开采和对东北亚国家的油气出口，而后者则相应地被降为该地区主要能源项目的次要参与者。<sup>①</sup>同时，在世界能源卖方市场态势下，东北亚能源市场供求关系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俄罗斯具有利用能源进口国之争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契机。显然，通过建立统一的东北亚油气管道系统，俄罗斯力求成为整合被分割的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地区内纽带<sup>②</sup>，这无疑将有助于俄罗斯在领导新的能源联盟时获得一种选择权，并提升其在东北亚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和权力。<sup>③</sup>

###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能源政策与东北亚能源合作深化

国际能源格局的调整与变动是俄罗斯能源政策演变的重要外生变量。2000年前，俄罗斯能源政策总体上呈碎片化特征。<sup>④</sup>直至2003年5月通过《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sup>⑤</sup>后，俄罗斯能源政策中的亚洲维度才得以首

---

① 《石油政治学》，第98页。

② Elena Shadrina, “Russia’s Natural Gas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Rationales,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s”,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p.65.

③ Rafael Fernandez, Enrique Palazuelos,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Exports to East Asia: Feasibility and Market Implications”, *Futures*, 2011, Vol.43, Issue. 10, pp.1069-1072.

④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继1992年通过《俄罗斯在新经济条件下能源政策的基本构想》后，1995年，俄联邦政府相继批准通过了《2010年前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主要方向》和《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

⑤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и//[minenergo.gov.ru](http://minenergo.gov.ru)

次被阐释。<sup>①</sup>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后，亚洲维度在俄罗斯能源政策中的重要性迅速提升。<sup>②</sup>随着俄罗斯能源政策制定与实施中欧亚主义特征的最终凸显<sup>③</sup>，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能源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化。

俄欧能源关系走向对于俄罗斯推进东向能源战略的力度和决心具有直接影响。苏联解体后，加强对欧能源合作一直主导着俄罗斯能源政策的方向。而俄罗斯扩大与亚洲能源联系的基本定位，也仅是旨在提升国内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2004 年是俄欧能源关系发展的分水岭。随着原属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扩大”<sup>④</sup>，而 2004 年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更是与俄罗斯渐行渐远。2006 和 2007 年，俄乌、俄白天然气定价争端使得俄罗斯切断天然气管道供给，这严重损害了其作为欧洲值得信赖的天然气长期供给国的地位，并导致俄欧能源对话复杂化。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能源需求疲软限制了俄罗斯在欧洲市场能源出口的增长。而俄罗斯追求的长期市场准入和控制上游资源这一核心利益，与欧盟积极推进能源市场自由化和多边能源治理制度之间越来越不兼容。<sup>⑤</sup>显然，俄罗斯的能源武器外交与欧盟统一能源政策之间具

---

① 2003 年，俄联邦政府批准通过了《开展有前景国际项目条件下东西伯利亚与远东油气开发的基本方向》，该文件是《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内容在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具体化。参见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развития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 учетом реализац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материал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к заседани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13 марта 2003. [www.gasforum.ru/concept/me\\_atr\\_0303.shtml](http://www.gasforum.ru/concept/me_atr_0303.shtml).

② 根据 2003 年批准通过的《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至 2020 年，亚太地区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3% 升至 30%，其在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中的比重将升至 15%。根据 2009 年批准通过的《203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至 2030 年，亚太地区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的比重将从 6% 增至 20-25%，其在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中的比重将增至 19-20%。根据 2014 年发布的《2035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至 2034 年，俄罗斯所有能源出口中的 23% 将出口至亚太地区。

③ Miroslav Mares and 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2012, Vol. 50, p. 437.

④ 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78 页。

⑤ 高淑琴、彼得·邓肯：“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博弈：能源垄断、市场自由化与能源多边治理”，《世界经济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85 页。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而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更是阻碍了其在欧洲资源地理维度上的利益实现。<sup>①</sup>

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上的角色转变，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革。非常规天然气规模的扩大，不仅使俄美能源关系从互补性转变为竞争性，而且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的主导地位。<sup>②</sup>北美能源市场曾被视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最具前景的目标市场之一<sup>③</sup>，其中，西西伯利亚—巴伦支海石油输送管道项目，特别是施托克曼油气田，是俄美能源合作的主要方向。然而，自2009年起，美国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sup>④</sup>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扼杀了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天然气的可能性，俄气被迫推迟实施在巴伦支海的施托克曼气田项目。同时，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北非、卡塔尔等液化气产能开始转向欧洲市场。<sup>⑤</sup>此外，随着美国完全从天然气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来自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将因其距离近、可靠性和政治考虑，为欧洲提供替代能源。<sup>⑥</sup>显然，美国页岩气产量的扩大及向欧洲出口液化气的前景，将改变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供给结构，使液化天然气成为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重要替代。<sup>⑦</sup>而欧盟能源进口来源和结构的多元化，无疑将压缩俄罗斯对欧

---

① Pami Aalto, Tuomas Forberg, “The Structuration of Russia’s Geo-economy under Economic Sanctions”, *Asia European Journal*, 2016, Vol.14, p.223.

② Petr Ocelik, Jan Osicka, “The Framing of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the Foreign Energy Policy Discours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nergy Policy*, 2014, Vol.72, p.97.

③ [俄]A. M·马斯捷潘诺夫：《俄罗斯能源战略和国家油气综合体发展前景》（第一卷），章欣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④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2010, p.4.

⑤ 卡塔尔是欧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给国，阿尔及利亚是北非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利比亚和埃及具有大量的天然气储量。参见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2016, p.28.

⑥ Seksun Moryadee, Steven A. Gabriel and Hakob G. Avetisyan, “Investigating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U.S. LNG Exports on Global Natural Gas Markets”,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4, Vol.2, Issue 3-4, p.273.

⑦ 2008至2010年间，液化天然气在欧洲天然气总进口中的比重从12.8%升至19.8%，而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比重则从32.9%降至26.8%。见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2011*, 2009-2011, p.30. 据估计，至2030年，欧洲液化天然气与管道天然气的进口比例将升至1:1.93，即液化天然气在欧洲天然气总进口中的比重将达到34%。参见Uwe Remme, Markus Blesl and Ulrich Fahl, “Future European Gas Supply in the Resource Triangl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ern Africa”, *Energy Policy*, 2008, Vol.36, p.1636.

洲能源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和影响力。

受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俄罗斯保证自身能源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出路是推进能源东向战略，实现出口市场的地缘最优平衡。<sup>①</sup>市场和地缘政治的外部冲击，促使俄罗斯能源政策首次从地位、角色和行为模式上具有了真正的欧亚性质。<sup>②</sup>根据 2007 年俄气发布的《东部天然气规划》，俄罗斯将在萨哈（雅库特）开发新气田，并在东北亚地区建设新的管道运输网络。<sup>③</sup>随着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东部维度在资源出口地理结构中的权重不断扩大。<sup>④</sup>

就石油管道而言，中国和日本已经就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sup>⑤</sup>的建设次序展开争夺。由于日本在对俄能源合作问题上存在种种顾虑<sup>⑥</sup>，自 2006 年起，俄日能源问题的双边协调以及两国主要能源企业之间的接触出现停滞。当 2007 年俄罗斯开始建设科兹米诺港终端后，能源合作再次在日本对俄关系中占据关键地位。由于中俄于 2009 年签署了“贷款换石油”

---

① 富景筠、张中元：“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57 页。

② Elena Shadrina, “Russia’s Foreign Energy Policy: Paradigm Shifts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Europe, Central Eurasia and Northeast Asia”,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IFS Insights, November 2010, p.15.

③ Программа созда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единой системы добычи,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и газа и газоснабж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возможного экспорта газа на рынки Китая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www.alppp.ru/law/konstitucionnyj-stroj/federativnoe-ustrojstvo/5/programma-sozdaniya-v-vostochnoj-sibiri-i-nadalnem-vostoke-edinoj-sistemy-dobychi-transpo.html](http://www.alppp.ru/law/konstitucionnyj-stroj/federativnoe-ustrojstvo/5/programma-sozdaniya-v-vostochnoj-sibiri-i-nadalnem-vostoke-edinoj-sistemy-dobychi-transpo.html).

④ 《俄罗斯能源战略和国家油气综合体发展前景》（第一卷），第 71 页。

⑤ 该管道西起泰舍特、东至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科兹米诺港。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于 2009 和 2012 年正式投入运营。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于 2006 年 4 月开始修建，2009 年 10 月完成从泰舍特至斯科沃罗季诺的全长 2694 公里的第一阶段建设，12 月 28 日起开始从太平洋沿岸的科兹米诺港出口原油。

⑥ 日本方面的具体疑虑包括，俄罗斯对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走向的摇摆不定、资金问题以及俄乌能源冲突是否会在亚洲重现等。2004 年 12 月，当俄罗斯决定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亚太终端后，日本对俄能源谈判立场出现了实质性转变。日本对自己承诺的超过 120 亿美元贷款增加了附加条件，即对该项目提供政府担保和签署特殊政府间协议，其中包括规定俄罗斯石油供货期限、规模及用贷款采购日本设备等。参见 Носова И.А.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1. №4. С.43.

的合作协议<sup>①</sup>，俄罗斯决定先行建设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一期工程及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的中国支线。<sup>②</sup>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开通，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石油贸易规模，并提升了俄罗斯在东北亚能源市场上的地位。2009至2015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10.45%升至26.79%。其中，俄罗斯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从5.37%、2.37%和2.72%增至15.78%、5.96%和5.05%。（见表1）就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依赖而言，俄罗斯于2014年分别成为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第3大、第4大和第7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俄罗斯石油占该年三国石油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11%、8%和4%。<sup>③</sup>

表1 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比重及对东北亚国家的出口比重(2009-2015)

年份	石油					天然气				
	俄罗斯	中日韩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中日韩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9	12.87%	10.45%	5.37%	2.37%	2.72%	17.69%	2.89%	0.14%	2.02%	0.74%
2010	12.86%	13.67%	5.48%	3.89%	4.30%	18.35%	6.32%	0.26%	4.12%	1.95%
2011	12.93%	17.46%	9.73%	3.23%	4.50%	18.39%	6.31%	0.15%	4.41%	1.75%
2012	12.77%	16.24%	9.34%	3.17%	3.73%	17.61%	7.37%	0.26%	5.63%	1.49%
2013	12.86%	18.57%	9.73%	4.83%	4.00%	17.73%	6.28%	0.00%	5.17%	1.11%
2014	12.63%	23.56%	13.42%	5.30%	4.83%	16.80%	7.08%	0.09%	5.69%	1.31%
2015	12.40%	26.79%	15.78%	5.96%	5.05%	16.20%	6.85%	0.12%	5.04%	1.69%

数据来源及计算说明：俄罗斯一栏表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占世界石油和天

① 根据该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对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分别提供10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用于资助东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俄罗斯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2010年底前，俄罗斯将修建至中国大庆的一条石油管道。2011至2030年间，俄罗斯每年按1500万吨规模向中国供应3亿吨石油。

② 徐建伟、葛岳静：“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第61页。

③ 2014年，中国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为沙特阿拉伯（16%），安哥拉（13%），俄罗斯（11%），阿曼（10%），伊拉克（9%）和伊朗（9%）；日本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为沙特阿拉伯（34%），阿联酋（24%），卡塔尔（11%），俄罗斯（8%），科威特（7%）和伊朗（5%）；韩国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为沙特阿拉伯（34%），科威特（16%），阿联酋（11%），卡塔尔（10%），伊拉克（8%），伊朗（5%）和俄罗斯（4%）。参见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2015.

然气生产总量的比重，数据来自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6。其余各栏表示俄罗斯对该地区/国家石油/天然气出口量占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总出口量的比重。其中，石油数据来自 CEIC 数据库，天然气数据来自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2016。

随着 2009 年萨哈林 2 号项目下南萨哈林岛普里戈罗德诺耶开始出口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实现了对东北亚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至今，液化天然气仍是俄罗斯向东北亚国家供给天然气的唯一形式。<sup>①</sup>2009 至 2015 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的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从 2.89% 增至 6.85%，其中，对日本和韩国的天然气出口比重分别从 2.02% 和 0.74% 增至 5.04% 和 1.69%，而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比重则从 0.14% 降至 0.12%。（见表 1）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依赖而言，2016 年，俄罗斯分别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 4 大和第 5 大液化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俄罗斯液化气占该国两国液化气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 8.86% 和 8.03%。该年，俄罗斯液化气占中国液化气总进口的比重仅为 0.95%。<sup>②</sup>

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根据俄气的《东部天然气规划》，俄罗斯对中国的管道天然气出口将主要依靠萨哈（雅库特）恰扬金斯基—哈巴罗夫斯克的東西管道<sup>③</sup>和将西西伯利亚天然气经阿尔泰输入中国的西线管道。2014 年，俄气与中国石油相继签署《东线供气购销合同》<sup>④</sup>和《关于沿西线管道从俄罗

---

① Elena Shadrina, “Russia’s Natural Gas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Rationales,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s”,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p.58.

② 2016 年，日本主要液化气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21.76%），马来西亚（18.21%），卡塔尔（17.12%），俄罗斯（8.86%）和阿联酋（6.25%）；韩国主要液化气进口来源国为卡塔尔（37.39%），阿曼（11.85%），印尼（11.32%），马来西亚（11.04%）和俄罗斯（8.03%）。中国同时进口管道气和液化气，其主要液化气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27.62%），卡塔尔（24.82%），马来西亚（16.82%），印尼（14.89%）和新几内亚（8.15%）。参见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2016, p.28.

③ 2012 年 10 月，俄罗斯开始建设从恰扬金气田通往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道。该管道连接萨哈（雅库特）新气田后并入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管道。这一天然气版本的西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气管道被重新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参见 Masumi Motomura, “Japan’s Need for Russian Oil and Gas: A Shift in Energy Flows to the Far East”,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p.73.

④ 根据《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俄方从 2018 年起向中国供气，最终达到每年 380 亿立方米，合同期为 30 年。东线天然气管道的供气资源地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科维克金气田和萨哈共和国的恰扬金气田。

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sup>①</sup>，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马拉松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然而由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中俄两国尚未签署西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供气合同。俄气随后进一步提出从萨哈林向中国供应管道天然气的第三条路线，并于2015年9月与中国石油就从俄远东地区经管道对华输气项目签署谅解备忘录。<sup>②</sup>

在跨朝鲜半岛天然气管道方面，韩国正逐步成为俄罗斯在东北亚天然气管道建设中颇具影响力的谈判国。基于朝韩关系的改善，韩国曾于2000年提出经朝鲜至韩国的科维克金管道项目建设方案。2009年，俄气与韩国天然气公司签署了关于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管道<sup>③</sup>至韩国的天然气出口可能路线的联合研究协议。2011年，俄韩两国达成关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朝鲜至韩国的管道天然气项目路线图。<sup>④</sup>双方计划从2013年开始建设，并于2017年开始供气。从经济收益看，朝鲜每年将因天然气过境国地位获得1亿美元的过境费。俄罗斯将获得30年的稳定天然气市场、超过900亿美元的销售利润以及对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出口市场准入。韩国将获得低于液化天然气30-70%进口价格的稳定天然气供给。<sup>⑤</sup>尽管这是俄韩朝三方共赢的管道建设项目，但来自潜在过境国朝鲜方面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该项目的实现可能。韩国因担心朝鲜利用过境国地位实现政治目的，更倾向于发展绕过朝鲜的液化气进口项目。<sup>⑥</sup>

---

① 该协议规定未来供气规模为每年300亿立方米，供气期限为30年。西线天然气管道的供气资源地为俄罗斯西西伯利亚气田。

② 刘乾等：“俄罗斯天然气：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对外合作战略转型”，《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72页。

③ 2009年8月，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天然气管道正式修建并于2011年秋竣工。参见本村真澄：“俄罗斯2030年前能源战略——实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64页。

④ 该管道长1100公里，从萨哈林通过哈巴罗夫斯克再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后至朝鲜，其中700公里将穿越朝鲜。它的建设费用预计在160亿美元，其供气资源地是萨哈林3号项目和雅库茨克气田，年输气量近100亿立方米。参见 Miroslav Mares and 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the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2012, Vol.50, p.445.

⑤ Youn Seek Lee, “The Gas Pipeline Connecting South Korea, North Korea, and Russia: Effects, Points of Contention, and Tasks”, *KINU Policy Study 11-05*, 2011, p.1.

⑥ Miroslav Mares and 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2012, Vol.50, p.445.

通过引入管道天然气提升对液化天然气的价格竞争,是日本对俄罗斯开展天然气管道合作的重要目的。<sup>①</sup>萨哈林 1 号项目财团曾制定和规划建设穿越北部边界宗谷海峡至日本列岛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但因消费市场规模过小,被迫于 2004 年放弃。由于日本电力部门力求扩大核电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重,作为核电有力竞争对手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长期遭到忽视。2011 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天然气被日本认为是替代核能、克服能源危机的最可行方式。俄日天然气管道合作再度出现新态势。2012 年,日本同意与俄气就天然气管道的可行性展开共同研究。<sup>②</sup>但日本核电的继续发展将对日俄未来天然气管道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日本追随美国和欧盟对俄采取经济制裁,更导致日俄天然气合作陷入困境。

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维度的能源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能源外交的核心目标。全球能源体系变革下,俄罗斯与欧洲和美国的能源关系是其东北亚能源政策演变的重要外生变量。由于东北亚能源市场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sup>③</sup>,俄罗斯扩大对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出口将平衡因欧洲油气需求停滞或下降带来的出口市场萎缩。<sup>④</sup>目前,俄罗斯石油已经成为中日韩对中东石油进口的稳步替代。而俄罗斯向东北亚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则使其实现了天然气出口形式和地区的多元化。同时,与东北亚国家的地理接近,也使得俄罗斯可以直接进入东北亚能源市场,从而避免欧洲市场的能源过境问题。显然,通过改变地理优先对象、利用对多元化出口市场的直接准入,俄罗斯扩大对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仅将有助于降低因

---

① Masumi Motomura, "Japan's Need for Russian Oil and Gas: A Shift in Energy Flows to the Far East",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p.72.

② Ibid, p.75.

③ 在石油方面,自 2009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后,2014 年,中国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世界第三大和第五大石油净进口国。见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2015。在天然气方面,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二大液化气进口国,中国是增长迅速的液化气市场。见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2016, pp.18, 28.

④ Michael Bradshaw, "A New Energy Age in Pacific Russia: Lessons from the Sakhalin Oil and Gas Project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0, Vol.51, No.3, p.333.

过度依赖欧洲市场引发的负外部性<sup>①</sup>，而且将获得对外能源关系的更大灵活性和合作性收益。<sup>②</sup>

#### 四、东北亚能源市场的特殊性与俄罗斯能源东向战略的实施前景

东北亚能源市场由该地区唯一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和世界主要能源进口国中日韩组成。由于高度依赖外部能源供给，中日韩均将俄罗斯作为实现本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来源。俄罗斯油气供给不仅具有距离近、安全和灵活的优势，而且对于提升中日韩对其他油气供给国的议价地位具有积极作用。显然，俄罗斯能源东向战略与中日韩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诉求之间具有较强的利益契合点。

然而，与欧盟不同，东北亚目前尚未建立真正有效的地区能源合作机制。就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而言，1997年，中日韩俄蒙五国联合发起东北亚天然气和管道论坛（NAGPF）。该论坛目前是促进东北亚地区天然气利用和管网建设的非营利组织。<sup>③</sup>2005年，韩朝俄蒙四国在能源合作高官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东北亚能源合作的政府间合作机制（ICM-ECNEA）。然而，这一多边对话机制的缺陷，是尚未涵盖全部东北亚国家。其中，日本至今仅是该机制的观察员国。尽管建立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有助于东北亚国家应对资源民族主义下俄罗斯对能源资源的战略性使用<sup>④</sup>，但东北亚国家对能源资源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使得中日韩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不具有统一立场，而是寻求自行开展与俄罗斯的双边能源合作。<sup>⑤</sup>在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关系中，

---

① Elena Shadrina, “Russia’s Natural Gas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Rationales,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s”, p.55.

② [俄]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3页。

③ 参见东北亚天然气和管道论坛网站 [www.nagpf.info/index.htm](http://www.nagpf.info/index.htm)

④ 徐斌、黄少卿：“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54页。

⑤ Keun-Wook Paik, “Sino-Russian Oil and Gas Cooperation—The Reality and Implications”,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2012, p.506.

双边合作占据主导地位且机制化程度较低。<sup>①</sup>这意味着俄罗斯具有对中日韩能源贸易谈判的更大可操作空间，并能通过战略性地保持与东北亚国家的双边能源合作，提升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页岩气革命后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多元竞争与地缘政治特征越发凸显，这成为俄罗斯深化对东北亚能源关系的重要挑战。从市场层面看，美国从液化气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角色转变，将可能成为亚洲液化气定价和合约<sup>②</sup>的规则改变者。与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相伴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长，使得缺乏流动性的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变得更加灵活<sup>③</sup>，同时，北美和亚洲天然气的大幅价差意味着美国向亚洲出口天然气的潜力巨大。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廉价天然气目前已在管道天然气进口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自然成为俄罗斯对中国发展天然气管道合作的主要竞争者。<sup>④</sup>显然，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价格的竞争力对于东北亚天然气管道建设和液化天然气项目具有直接影响。只有通过提供商业上有吸引力的合约，俄罗斯才能在全球液化气交易规模最大和管道气发展前景广阔的东北亚天然气市场上占据重要一席。

就地缘政治而言，考虑到东北亚现有地缘政治关系对能源市场结构演变的作用，俄罗斯对东北亚的能源出口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和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影响。俄韩目前发展能源关系的唯一重要障碍是韩国的地理位置，这导致朝鲜的参与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 2008 年李明博出任总统后朝韩关系开始恶化并陷入困境，韩国天然气公司对与朝鲜开展能源合作不再寄予希望，转向积极研究对跨朝鲜半岛天然气管道的替代方案。

---

① Elena Shadrina, “Russia’s Foreign Energy Policy: Paradigm Shifts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Europe, Central Eurasia and Northeast Asia”,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IFS Insights, November 2010, p.4.

② 北美、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三大天然气市场，彼此价格互不关联。北美天然气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欧洲市场是净回值定价和油气挂钩两者兼有，亚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进口价格与日本进口原油综合价格（JCC）挂钩。

③ Elena Kropatcheva, “He who has the Pipeline Calls the Tune? Russia’s Energy Pow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ale ‘Revolutions’”, *Energy Policy*, 2014, Vol.66, p.4.

④ 目前，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的中哈油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以及海上液化天然气管道共同构成中国的能源进口格局。2016 年，中国进口的管道气和液化气总量分别为 336 亿立方米和 262 亿立方米，其管道气进口来源是土库曼斯坦（82.66%），缅甸（11.69%），乌兹别克斯坦（4.59%）和哈萨克斯坦（1.06%）。参见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2016, p.28.

显然，朝鲜半岛安全困境是导致俄韩油气合作迟滞的主要原因。俄日领土争端悬而未决，使得双边能源合作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美国有目的地阻止俄罗斯通过能源贸易加强日本对其能源依赖，美日同盟关系使得俄日两国发展管道天然气项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分别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为巩固和强化美日、美韩的盟友关系，美国通过签署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在对日、韩的传统安全贸易同盟关系中增加了能源安全版块。<sup>①</sup>显然，美国因素的掣肘必将导致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化。<sup>②</sup>

毋庸置疑，随着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供给国之间的全球竞争加剧以及欧洲天然气供给来源的多元化，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上的权力和地位正在减弱。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后，东北亚成为俄罗斯油气管道政治权力的唯一增量。以能源为纽带加强与东北亚能源进口国的合作，无疑是俄罗斯走出欧洲地缘政治困境的重要出路。

尽管从地理位置和能源供应多元化角度看，俄罗斯油气供给对中日韩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对于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东北亚而言，俄罗斯目前仅扮演着该地区能源供给国的平衡角色。<sup>③</sup>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开通，使得俄罗斯正在稳步成为中日韩对中东石油的进口替代来源。但俄罗斯目前与中日韩的天然气合作水平与其作为世界最大天然气出口国以及东北亚天然气消费市场规模极不相称。

页岩气革命后，资源生产国之间、常规与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国之间对市场和价格博弈主动权的争夺，无疑将增强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进口多元化趋势，并引发亚洲天然气市场定价机制的深刻变革。考虑到世界能源市场正在经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需求程度将

---

① 2012 和 2013 年，美国分别与韩国和日本签署了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2014 年，美国能源部宣布批准液化天然气对日本的出口计划。美国预计将从 2017 年起每年向日本供应 1200 万吨液化天然气、向韩国供应 570 万吨液化天然气。参见白桦等：“美国 LNG 出口前景分析”，《天然气技术与经济》，2014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② 富景筠：“东北亚天然气格局的演变逻辑——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分析”，《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4 期，第 67 页。

③ Vladimir I. Ivanov, “Russia and Regional Energy Links in Northeast Asia”,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2004, p.56.

越来越大于后者对前者的进口依赖。显然，作为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俄罗斯的能源权力已不能仅仅局限于凭借掌控能源资源和运输管道对伙伴国施加政治影响，而应具有应对市场冲击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技术和理念能力。<sup>①</sup>这自然需要俄罗斯从资源民族主义转向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能源政策。而俄罗斯这一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亦将实质性地推进其与东北亚能源关系的提升与深化。

---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ortheast Asia energy relations involve not only the evolution of state-enterprise relations at political levels in Russia domestically, but also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roles of Russia, greatly influenced by global energy system changes and geopolitical shoc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wo-level game”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Northeast Asia, that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thin Northeast Asian energy marke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ssian energy policies while 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s of Russian domestic political actions on regional energy relations. Among them,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changes and external shocks of geopolitical crisis towards traditional oil and gas exporting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evolution of Northeast Asian energy relations. Considering that the world energy market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sellers’ market to buyers’ market, Russia’s demands for Northeast Asian energy cooperation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latter’s dependence on the former. Russia’s energy relations with Northeast Asia will b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and deepened when Russia’s energy policies turn from resource nationalism to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ones.

**【Key Words】**State-Enterprise Relationship, Two-level Game, Nationalism in Energies, Energy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

<sup>①</sup> Elena Kropatcheva, “He who has the Pipeline Calls the Tune? Russia’s Energy Pow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ale ‘Revolutions’”, p.8.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волюци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вязано не только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нутривласт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на уров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о и также с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роле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рынках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ызванными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е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Мы пытаемся выстроить рамки «двойной игры» эволюци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ей, подчёркивая влияние внутривласт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сследуя роль игры интересов вовлечённых сторон 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рынке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реализаци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роме того, внешние потрясения дл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стран-экспортёров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из-за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ключены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зменени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ринимая во внимание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рынок переживает переход от рынка-продавца к рынку-покупателю, уровень спрос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будет всё больше зависеть от импорта последнего первому. 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и от ресурс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к более открытой и инклюзивн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реальности,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му улучшению и углублению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предприятия, двойная игра, ресурс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6年第6期**

(总第202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元